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曾国藩本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曾国藩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然而对他的评价却大毁大誉，差之天渊，正如章太炎所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

在改革开放的当今，又一次出现研究、评论、仿效曾国藩的热潮。不仅是史学界、文化界、士农工商无不关心死去百余年的曾国藩。有人称之为“曾国藩现象”。

曾国藩毕竟是历史人物，这本《曾国藩本传》旨在如实反映曾国藩的一生史实，帮助大家研究了解，或能透视“曾国藩现象”的本质。

总 序

从 90 年代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个研究、评论曾国藩的热潮。当前，这个热潮已波及到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并广泛影响到政界和工商界。被人们称之为“曾国藩热”或“曾国藩现象”。

对这一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有人作

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考察。认为其基本原因是：世界范围的儒学复兴热潮，为“曾国藩热”的产生准备了良好土壤；新形势下新道德重建的社会呼声，为“曾国藩热”创造了必要前提；领袖崇拜的自然延伸和向纵深发展，推动了“曾国藩热”的出现和形成；长篇小说作品《曾国藩》的出现，促使“曾国藩热”由学术热潮转为社会热潮，等等。

上述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进一步考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就不能不承认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冲破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之后，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和思想解放进一步深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个意义看，当前形成的“曾国藩热”、“曾国藩现象”，不仅关系到曾国藩及其家族的誉毁荣辱，也关系到学术研究、新道德重建、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问题。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一个人活着，生命没有完结，还要从事社会活动，因此，无法对他作出定评；只有在死去之后，才可能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定论。然而事实上，有些人死后也难以“盖棺论定”。这在中国历史上颇不乏人。曾国藩可算是一个典型。

曾国藩死后 120 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说褒贬异词，大毁大誉。有人推崇他是“中兴名臣”、“理学宗师”；有人指斥他是“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誉者奉为“完人”、“圣哲”，推崇备至；毁者切齿痛恨，口诛笔伐，全盘否定。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新体系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国藩主要是以“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而被载入史册的。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影射史学，把一部中国近代史歪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的继续，曾国藩除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几顶帽子外，又被列为近代大儒，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大加挞伐，真是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千万只脚。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历史学家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运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即使对同一个历史人物也会得出不同以致截然相反的论断。评价曾国藩出现的大毁大誉，就是由于论者出于阶级的、政治的目的和人为的需要，对曾国藩进行任意改塑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要求历史家分析、研究社会历史，不能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不能借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随意作历史类比，任意改塑历史人物。否则，便背离了科学地观察社会历史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本人就极力反对肤浅的历史类比，借古说今。波拿巴恢复帝制，建立独裁统治，当时有人把他比做古罗马的独裁者恺撒，遭到马克思的反对。他指出，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不同，由这些斗争产生的政治人物也就有很大区别，不能作简单的类比。他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讲现代史的讽刺著作，其中有巧妙的暗示，却没有任何历史类比。

把曾国藩的一生描绘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一生，其原意和出

发点是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对内屠杀、对外妥协照镜子，企图借古人曾国藩说今人蒋介石。这实际上恰恰犯了借古说今、历史类比的大忌而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当年清朝统治者及其文人推崇曾国藩为“中兴第一名臣”，把他美化、渲染成“圣哲”、“完人”，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人为改塑；同样，今天把曾国藩指斥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也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人为改塑。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此，当我们面临研究、评论曾国藩热潮之际，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要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排除“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既不应把历史公案全盘翻转，重新抬出这位“中兴名臣”的僵尸，顶礼膜拜；也不该继续把他当成“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应该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曾国藩。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研究考察他的思想言行，既要肯定他比前人提供那些新的东西，以便批判地借鉴和继承；又要分析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指出其不足、缺点和错误。不溢美，不苛求，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给以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还历史人物以本相。并以此为契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要达到上述目的，除了广大文化学术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外，无米难为炊，还须要有翔实、确凿的史料以资研究。有鉴于此，辽宁古籍出版社郑重推出了《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为研究、评论曾国藩提供一批新的史料，为“曾国藩热”添薪加温。

这套丛书由《曾国藩本传》、《曾纪泽本传》、《曾国藩家族》、《曾国藩家训》和《名人评曾公》五部书组成。

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把他推到时代暴风雨的风口浪尖上，造就了他复杂思想和性格。他一生活活动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至少有三个侧面：军旅生涯、开创洋务、治学立身。对曾国藩生平只有全方位、多视角进行考察，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强调某一侧面或抓住一点不计其余都不可能正确地评价曾国藩。

本丛书中马东玉教授所著《曾国藩本传》，在这方面作了较好的尝试。该书刻画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手握屠刀，嗜杀成性的“汉奸、刽子手”；也不是完美无瑕，高山仰止的“圣哲”。作者通过写实和白描的笔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曾国藩形象，这对读者正确认识历史上曾国藩的本相是有帮助的。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是曾氏家族中比较有作为、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开明人士。他虽盛年凋谢，但在短暂的一生中，为祖国、为民族作了不少好事，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他在祖国面临列强环伺、国将不国的危急形势下，应如何吸取和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以振兴中华，有清醒的认识。他以身作则，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外语，并加以推广，积极主张派人出国留学，为开通社会风气做了许多工作。

作为外交官他出使英、法、俄达八年之久，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尊严和荣誉，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与沙俄谈判收回伊犁的外交斗争中，他以“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大无畏精神，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以改订新约取代崇厚签订的条约，为祖国争回了

不少权益。在“弱国无外交”的半殖民地中国外交史上，像这种“虎口夺食”的斗争，并取得外交上的一定胜利和成功的是绝无仅有的。

本丛中张立真教授所著《曾纪泽传》，是建国40余年来第一部全面评述曾纪泽生平的专著。观点鲜明，史料翔实，既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是一部爱国主义教材。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

曾国藩一生奉行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极重视家庭教育，并形成系统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他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不仅对自家兄弟子侄的教育卓有成效，对中国近现代官僚士大夫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教育观虽然不可避免地有着深深的阶级时代烙印，但其中某些具体思想内容和方法，只要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取其辩证哲理的精华，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丛书根据曾国藩有关家训、家书等，史料，整理编译成《曾国藩家训》，既可供读者参考借鉴，也为研究、评论曾国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曾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曾国藩又特别重视家庭教育，不仅他的兄弟子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受到他的广泛影响，且优良家风，世代相传，影响深远，使曾氏后裔中不少人成为国家栋梁。《曾国藩家族》介绍了其中一些代表人物，这也是研究和评论曾国藩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人物之一。逝后自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丛书选录了从曾国藩逝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80年间约50位名人对曾氏的评论，辑成《名人评曾公》，为研究者提供一批基本参考资料。这些评论虽难免印上时代、阶级、政治等痕迹，但仍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成晓军教授近年来一直进行曾国藩研究。本丛书中由他撰著、编译或主编的。如前述，这三种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这套丛书是前所未有的规模适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它创意新颖、资料充实、内容丰富、装帧精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它的出版为万紫千红的学术百花园增添了一株绚丽的花朵，使学术园地更加烂漫繁荣。

在本丛书即将出版面世之际，作为主编之一，我要感谢另两位主编成晓军教授和高虹副教授，也要感谢为培植这株鲜花而付出艰辛劳动的有关人士。特别要指出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孙克复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高智慧的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们希望读者诸君会喜欢这套丛书。

徐彻

1996年12月10日
于辽宁古籍出版社

曾国藩本传

— “巨蟒转世”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都白杨坪，一株苍老巨大的白果树覆盖着一处不大的院落。

清晨，一位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迟疑地推开房门，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天空。漫天雾气，喷薄欲出的朝日把她的微曦透入层层晨雾，秋木瑟瑟，红叶满地。老人习惯地拿起扫帚，慢慢地打扫落叶。猛抬头，看见一条巨蛇从房子上蜿蜒进入院落。老人不禁一惊，但定神一看，原来是房后白果树旁的那株老藤，攀缘着白果树，将藤身盘过正房，进入了院落。一刹之间，老人想起醒前做的一梦：

云遮雾罩，阴霾满天。雾气之中，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呼地一下降至院子上空，盘旋一周，慢慢将巨大的蛇头进入房门。大蟒蛇双目闪光，浑身黝黑，嘴里吐出血红的信子，嘶嘶有声。老人吓得猛然醒来，却是一场惊梦，浑身冷汗，再无睡意。于是、披衣下床，听了听，金鸡唱晓。心里七上八下，打开房门，犹觉似梦非梦。适才藤影一晃，梦境与现实油然相连，更是心惊肉跳。

正在左右狐疑，西厢房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随之，呀地一声，房门开处，老伴颤悠悠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老人慌忙随老伴进入西屋。红烛光下，孙媳妇抱着初生的婴儿。婴儿头脸正大，双目似睡似醒，肤色光亮晶莹，在昏黄烛光里，犹似梦中的蟒身之光。老人浑身打个寒战：“这事怪了，此子莫非巨蟒转世！”于是，老人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心里直发虚，不知是福是祸。

原来，这位古稀老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新生的婴儿便是本书的传主曾国藩。

老人见子孙们个个狐疑不定，便欢天喜地地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梦见大蟒临门，郭子仪还不是成了唐朝兵马大元帅，成了大富大贵的名臣名将。今天蟒蛇进入我曾家门，崽伢子正好降生，这不分明是又一个郭子仪降生吗！我们曾家的发达，要应在此子身上了！”

老头子如醉如痴，曾家子孙又是极孝顺的，老爷子既然说是蟒蛇转世、郭子仪再生，自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加上此子出世，曾家四世同堂，当年曾祖竟希公70岁、祖父玉屏37岁。父亲麟书21岁。祖孙都还少壮。于是，全家欢天喜地，杀鸡炖米饭，热烈庆祝四世长孙的降生，盼望他为曾家耀祖光宗。

大家借着初升的秋阳，看着盘环在大白果树上的那株古藤，躯盘枝曲，仿佛真是一条左右蠕动的怪蟒。

此后，巨蟒降生曾家的传说纷纷扬扬，流传在那古老神秘的高嵛山麓，流传于湘乡、衡阳偏僻的山村中。

后来多种史书上记载，曾国藩屋后“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缠，树虽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故此，人称之为蟒蛇藤。还说，此藤随曾国藩之荣潦，亦见其荣枯：曾国藩登第、荣升、打仗得胜，藤则欣欣向荣，枝叶繁茂；曾国藩困顿之时，藤亦兀兀然

都：当时湖南地方俗称的行政区名，相当于乡、镇。

有欲槁之状；及曾国藩死，这株巨藤也叶落枝枯，遂即萎死。

曾国藩自幼即知这个蟒蛇的故事，知道房后那株古藤的故事。但他只当故事听，并没有把故事同自己连在一起；但他又朦胧觉得自己似乎不凡，将来能做大官，这多是从家里人和乡里人对他的另眼相看的目光中得来。

关于蟒蛇转世的传说，从别的故事中又可得到印证，那故事还很多。有一年，他入塾读书了。整天埋在“子曰”、“诗云”里，闷死了。正月十六到了，乡下出嫁女儿要回娘家，母亲带他去外婆家。一大早舅舅就划了船来接，如小鸟放出笼，他高兴极了！于是同母亲、妹妹上了小船，小船慢悠悠地在涓水上划行。天气好极了！初春的阳光照耀着湘东群山，竹树苍翠，山岩青黄斑驳。江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阳光照射，浮光耀金。曾国藩时而看着远去的山峦，数着峰顶；时而伏在船边，数着游鱼。水草青青，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突然，母亲一声尖叫：“蛇！”小船随着母亲的叫声一个歪斜，专注着江水的曾国藩“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母亲和舅舅大惊失色，急得要跳水救人，但是却见孩子抱着一根木头稳稳地浮在水上。舅舅把船轻轻划过去，伸过船桨把曾国藩拉到船上。母亲睁大眼睛说：“刚才明明是一条大蟒蛇游过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木棒！”

这件事传开，又成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根据。

还有，曾国藩长了一身蛇皮癣，初时尚无多大痛痒，35岁之后，癣疥一天天严重，奇痒无比。曾国藩或坐或卧，皆不断抓挠，煞像个猢猻。曾国藩终生有个围棋癖，他一边下棋，一边抓背挠腿，只见皮屑飞扬，一局下来，周围地上、棋盘桌案上到处是皮屑，像下了阵小雪。曾国藩的满身蛇皮癣疥，被人说成是蟒蛇的鳞片，也成为“蟒蛇转世”的根据。

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又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急令人拿走掸子，他仍是胆虚虚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音毁，毒蛇）闻气即死，蛟蜃（即龙蛇）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的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生死轮回，投胎转世，是宗教的说教，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不相信它。那么，如何认识关于曾国藩“巨蟒转世”的传说呢？

转世之说，在古老封建的国家里，太一般了！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金龙转世，受命于天。皇后、皇妃自然都说自己是凤凰转世了。文臣呢？都说是文曲星、太白星下界；武将就说是武曲星、白虎星下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一百零八个星宿下界。连平常百姓，男的说是牛郎星、女的则是织女星、是七仙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是人都是星，都是转世来的。这个虚幻的理论自然也适合、包括曾国藩，一点也不奇怪。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环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余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疥癣在旧中国里患者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疥癣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

会，蛇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犹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则吞之，如何惧怕？

涓水见蟒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了蟒蛇，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容易看走眼。

“巨蟒转世”之说对曾国藩这样的人极易流传。曾国藩官做得大，在当时与太平军作战，地位十分显赫。高官显宦，在一般人眼里都不是凡人，一定要找出个典故来传说。拥护他的人要神话他，南方多蛇，神话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曾国藩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忌。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反动军队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布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

综上所述，文人墨客、好事之人，捕捉奇闻异事，也就不加分析地猎取这个“巨蟒转世”的奇闻，记了下来。不仅野史、笔记，连史学家们也如此猎奇，如朱孔彰所写的史料价值很高的《中兴将帅别传》，首篇记述曾国藩，开笔便写了曾国藩“巨蟒盘旋入室”和宅后古藤的传说。其他的小说、传奇、轶史之类更争着记载、渲染，于是便有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故事。

二 八字家诀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秉性风格与他的家庭根基和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曾氏一族，远祖居于江西，清初迁至湖南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1798年）又迁居白杨坪。白杨坪界于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嵎山下，离湘乡县城120里，今属湖南双峰县。这一带丘陵起伏，山青水秀，竹树隐映，风景十分秀美，但是交通不便，山环水绕，消息闭塞，正如曾国藩所说，这里的山野是“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据曾国藩后来考证，曾家数百年世代务农，无功名者，是默默无闻的寒族。前文已述，曾国藩出生时，其曾祖父曾竟希年70、祖父曾玉屏37岁、父亲曾麟书21岁。当时，祖孙三代连个秀才也没一个，家庭经济状况也不佳，曾国藩出世的曾家真可谓是寒门冷籍了。

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搬来白杨坪，白手起家，克勤克俭、苦苦积攒点钱，盖了几幢茅屋，置了几亩田地，亦耕亦渔，勉强糊口。曾竟希为了脱去寒门冷籍，在家道渐苏的情况下，送子读书，以期“十载寒窗，一举成名”。

曾玉屏虽进了私塾，一则家境维艰，二则天资不丰，并未读熟几句书便辍学不读。不仅如此，而且染上酒食争逐、游手好闲的习惯。到了30多岁，父亲去世，家庭负担落在他的肩头，父亲生前的遗愿，孙子“巨蟒转世”的神话，都促他猛醒，痛改前非，做了一个“回头浪子”，踏踏实实地干起农业。

他起早贪黑，开荒辟林，种园养猪，捕鱼打柴，拼命地干。省吃俭用，开源节支，十几年后，曾家境况，大为好转，蒸蒸日上。曾玉屏的勤劳、刚正，成了白杨坪的中心人物，庄邻庄舍有了纷争、诉讼、红白喜事、天灾人祸，都自动找他拿主意，排难解忧。

曾玉屏主持的曾家，并没有史书上说的“大地主”的规模，他一生都是率领妻、子勤奋耕作，也极少有什么剥削行为，大收大割时，或许花钱请人抢收抢种是有的。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妻子王氏大他7岁，有子3人：长子麟书，字竹亭；老二早殇；老三曾骥云一生无子、以麟书子曾国华为继。全家务农，供子孙读书。玉屏创制一套家规，称做“八字家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早起，早起三朝，可当一工。

扫：扫除，清洁卫生，不可忽略。

考：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宝：睦邻，患难相顾，惟善为宝。

书：教育，读书明理，普及知识。

蔬：种菜，园有蔬菜，四季常新。

鱼：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

猪：养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

这八件事家里无论老幼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家庭成员禁

绝疏远六种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

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玉屏悔恨自己少年不努力读书，不惜代价，培养儿子读好书，高中功名。无奈曾麟书的天资也较差，终日苦读，先后参加过 17 次考试，耗去大半生精力和光阴，直到 40 多岁才补上个县学生员。就在曾麟书补上秀才那年，儿子曾国藩也随父应考，得了个备取贡生，第二年便考取了秀才。曾麟书熬上个秀才，就算到顶了，心力皆已瘁尽，而儿子中秀才的第二年便中了举人。自己明知远远赶不上儿子了，于是放弃再考，安心在家当了教书先生。

曾玉屏见到曾国藩比儿子要有出息，也应了死去父亲的“梦麟之兆”（即梦麟），加倍培养孙子，终于把曾国藩送上了科举之途的顶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曾氏的家庭教育、“八字家诀”，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家教家规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他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时刻用祖父的家诀教育子孙，要求属下。直到自己的兄弟成了地方大吏，仍旧要求曾氏子弟媳侄勤俭持家，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穿不尽的官服朝靴，但日常穿戴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衣、做鞋，以此要求子女、考查自家女儿和媳妇的女红。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时（曾国荃也成了浙江巡抚），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祖宗家法，牢记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不能丢“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功夫”。

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时常记述祖父组织的“耕织家庭”，认为那时家里虽贫苦些，但却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家庭成员间的友谊和敬爱。他说：这个家庭给他的是礼义廉耻，给他的是勤俭质朴，给他的是孝悌尊友，给他的是忠君爱国。

总之，正是湖南湘乡秀美的山水，曾家勤俭而严正的教育，加之封建的国度，偏僻的山村，传统而落后的文化习俗，造就了本书传主曾国藩复杂的性格，造就了这个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和屠杀农民起义的“曾屠户”，一个令世代评说、争议不休的历史人物。

三 少年得志

曾国藩出生后，由曾祖父为他取名宽一；道光九年（1829年）赴衡阳唐氏家塾读书时取名子城，取字居武；第二年又至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改号涤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后，改号伯涵，又取名国藩。

曾国藩6岁时，祖父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自知天分不高，自己的功名无大希望，于是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9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读到14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很有才名。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诗文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氏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16岁了，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考取了第七名。曾麟书同父亲商量，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让曾国藩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孩子的学业，不如让孩子另请名师。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赴衡阳读书，那年是19岁。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特为自己取了个“涤生”的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23岁，父亲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于是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长为他与订婚已9年的欧阳小姐成亲，23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成亲。

第二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入省城长沙岳麓书院读书。该书院是全国极负盛名的学府，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27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3000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这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湖南，独自一人赴京赶考。经过千辛万苦，到达北京，参加了礼部的会考，但杏花春榜一发，他名落孙山。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60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注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苦等一年。这一年曾国藩除去准备功课之外，却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

可惜这次恩科，又是榜上无名。只好收拾行李，搭乘运河的漕船南行，一年多来花费尽管节俭，身边余资已极少了。好在船过江苏睢宁，知县易作梅是同乡，借给他一百两白银，可以宽松地到达湖南了。谁知路过南京时，见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一问价钱，与自己身边所有余钱正好相当。他考虑再四，还是咬着牙把这套书买了下来。南京到湘乡的盘费，他典当了所有衣物，勉强到了家。

到家后，父亲见他囊空如洗，连衣服都卖光了，却带回来一套史书。问明原因，父亲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这几句话对曾国藩既是安慰，也是鼓励刺激，此后他闭门复习功课，每日必读几页那套二十三史，他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从此，曾国藩便养成了研究历史的兴趣。

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逢会试之期。曾氏又让儿子进京，曾家以农为业，本不富裕，偿还他借贷易氏的一百两白银，已无钱可供路费了，只好东挪西借。恰好离他15里远的桐木冲他的一个堂舅，称作南五舅江氏的主动送来了他家的所有现金12吊钱，家里又凑了20余吊，曾国藩拿上这30余吊钱上路了。到了北京，身上仅余3吊钱。曾国藩知道这是孤注一掷，如果再不中榜，可怎么回得去湖南！

真是幸运呀！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38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42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朝见皇帝之后，钦点了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

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龄才28岁。一般的幸运输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40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四 学宗朱子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这些称谓是否合适另当别论，曾国藩点上翰林之后，确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受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有一个偶然机遇。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似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便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合。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

唐鉴还自我介绍，一生读《朱子》，以之修身；所通一经为《易》。而修身检讨自己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记日记就是照自我，一定要诚实无欺，日记有假就是欺心，欺心就该诛心。连最丑的私心都要写出来，最丑的事更不能漏，对着圣贤天天检讨，慢慢就达到圣贤的境地了。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称圣贤了。

曾国藩之弟有四：二弟曾国潢，1820年生；三弟曾国华，1822年生；四弟曾国荃，1824年生；五弟曾国葆，1828年生。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求阙斋日记类钞》，上卷，第9页。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曾国藩于1840年庶吉士散馆，取为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定为七品翰林官，为闲曹，无实职。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12条规。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则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同倭仁认识之后，相与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自从庶吉士散馆之后，至咸丰二年（1852年）回乡创办团练，在京官任期12年之久。这十余年，因所任之官多为闲曹，正给他认真读书提供了好条件。这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是唐鉴和倭仁，因此理学的功夫也最深，被人称之为“理学大师”。此外，他的交往很广泛，兴趣也很多，并不是仅注于程朱理学。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考据学者汉阳刘传莹、有书法大家何绍基、有爱好古文的吴嘉宾，还有各有所长的邵懿辰、冯卓怀、龚璜等。在这些朋友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的古文、考据、史学、诗文、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称名称家，都不为过。例如：曾国藩崇拜韩昌黎，学习韩文的奇雄，使他的文章很有风格，他写的《原才》、《湘乡昭忠祠记》待文，为当代学者、文人吹捧、流传、模仿，认为可以和古文大家比美。

他在诗歌方面，崇拜杜甫、陶潜，既要工又要雅，还要趣味横生，内容丰富，反对无病呻吟。曾氏是中国近代“楹联”的创作大家，由于他喜爱写诗，从而创造了“对子”。他是楹联大家和圣手，无论是政治的、生活的、劝谏的、读书的、交友的、骂人的、自勉的，都喜欢以楹联出现，他的楹联多极了，官府衙门、书房、居室、亲友家中，处处都有他的楹联。如：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他曾在一个不眠之夜，一下子撰写出三幅名联：

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
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乐以终身，忧以终身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
人间那有空闲之光阴

五弟曾国葆战死南京城下，他作了几幅挽联悼念，其中有：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在他的影响下，湘淮文武官员，一代文人墨客，都竞相作联写对，成为雅风。好联好对甚多，篇幅有限，不能尽举。

曾国藩的一生，每天都要临帖写字，真、草、隶、魏，古之百家无不学习。终使他成为我国近代书法史上的名家。在他的影响下，弟曾国荃、子曾纪泽、孙曾广钧也都成为近代书法家（见祝嘉：《中国书学史》）。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五 十年七迁

曾国藩不仅少年得志，而且在京官的十几年中，升迁极快。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1849年迁礼部右侍郎，以后的4年兼任过兵部右侍郎（1849年）、工部左侍郎（1850年）、刑部左侍郎（1851年）、吏部左侍郎（1852年）。从官阶上看，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曾国藩十分得意，写信通告亲友，说自己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清朝官制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就是说一个官位上有从、正两级。这样算起来，曾国藩10年京官，由七品到正二品，的确是连跃了10级。他自己认为，环视左右，极少有升这么快的。给弟弟的信中说：“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曾国藩飞升之快，官运亨通之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他个人勤苦努力，要求自己极其严格，广泛结交京内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恳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普遍声望。他自己就说“在京颇著清望”。

其中主要原因是穆彰阿的援引和扶持。

穆彰阿是人们极熟悉的人物，人们所以知道他，因为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则徐，被骂为“道光年间的秦桧”。

穆彰阿（1782—1856年），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郭佳氏，翰林出身。穆是曹振鏞一类的人物，曹是“多磕头，少说话”处世哲学的创造者，穆彰阿奉之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极得道光宠信。穆为军机大臣20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自嘉庆至道光两朝，进士考试、殿试、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参与或主持。这是“衡文大权”，亦即选官大权。凡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最亲近、终生不改的“老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比学校中最亲近的真正的老师还要尊重。

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利用门生故旧，广树党羽，时称“穆党”。他炙手可热，凡穆彰阿想要推荐或打击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例如罗惇衍、何桂清、、芾是同年翰林，张、何散馆后都拜穆为“老师”，唯罗惇衍不拜。结果张何同得考差，惟罗因“年轻”未得考差。实则三人中罗惇衍年岁最长，在上谕待发时，穆彰阿恼罗不拜竟让皇帝收回成命。

曾国藩会考之时，总裁官即为穆彰阿。考试之后，曾国藩如式拜见了穆彰阿，穆对曾的文章、学问和行事都很赞赏。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试后，曾国藩又亲拜了穆氏，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给了穆彰阿，于是曾国藩又得了好成绩。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进见皇帝、升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植。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曾预先到穆彰阿处请教对答的内容。穆彰阿让一个干练的文员告诉曾国藩，以400两的酬金赠送某内监，可买得皇帝的诏对内容。曾国藩照此办理了，结果皇帝召见时，所问果然是400两白银买到的“历朝圣训”之内容。此后，曾国藩的官运就更加飞黄腾达了。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胡怀深：《清谈》，台湾影印本，第12—13页。

参见徐珂：《清稗类钞》，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1册，“荐举”，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亦非一般，穆彰阿被罢，曾每过穆宅，皆感慨唏嘘。20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时，又专程拜访穆氏的后人。此后，又让儿子曾纪泽访问了穆彰阿之子穆萨廉。

曾国藩的成功与穆彰阿的扶植固然有一定关系，但在10余年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一个原因，况且比较偶然。过去全盘否定曾国藩，把这种因素夸大其辞了，如皇帝召见一事；出自稗史。其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曾国藩个人的努力。曾国藩出身寒门，秉性淳朴，不善钻营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严厉地克制、革除，每每痛骂自己。

实际上曾国藩的10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养，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他或者成就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成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扰的官员。但他不会成为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要求自己太严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十二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简直就像个宗教徒，实则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来，不仅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连后来的许多伟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之评价都相当之高，把他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事的经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毒蛇，面对三军，也要“我虑则一”，毫不苟且；对自己的言行，要禁绝“巧语悦人”，对人对己都要坦坦荡荡，不自欺、不欺人，等等。曾国藩成为高官显贵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不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他成功，绝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

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达到了极深入的程度。请看他的一段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戒。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讲，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在日记中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真正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了，当今社会，大家若能这么要求自己，也是了不起的了！

六 为国藩篱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开始做京官那一年，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映。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看得是很清楚的。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加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把地方情况向他反映，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刘蓉是湖南湘乡人，同县的老乡。1834年曾国藩赴京会考，在长沙与他相识。1837年，刘蓉又把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湘阳人郭嵩焘介绍为好友。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作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剿平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蓐蓐繄袴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犄，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宽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0页。

《曾文正公诗集》，第1卷，第2页。

国泰民安。

1850年初，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抑郁死去。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见到为国出力的时机到来，便连上奏折，希图采纳，使咸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整顿，革除各种弊端。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5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还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5人，认为堪当大用。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骤发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皇帝“日就兢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

《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0页。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统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借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惟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文过饰非。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七 墨经出山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奔回原籍奔丧。这次回籍，开始了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生涯，由业绩平庸的文吏，成为咸同两朝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朵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多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养病的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团练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办团练。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

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就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他的忠贞，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他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作战，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的浪潮，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500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

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分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腾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悍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时，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作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作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立见真章，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3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恭亲王奕訢、内阁学士肃顺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了。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现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决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位、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

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应命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那天是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经 出山”，尽忠国家。

墨经：指居葬时穿的孝服，这里指守孝时。经（dié，音迭），古时丧服上的麻布带子。

八 初办团练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与郭嵩焘从家乡动身前往省城长沙，途经湘乡县城时，又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征调湘乡练勇1000名赴省城的扎令。正好这1000练勇由曾国藩带走，湘乡的岁泽南、刘蓉、王鑫、朱孙诒也随曾国藩而去。这些人便是曾国藩初办团练的班底。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年1月30日），曾国藩一行率带1000湘乡练勇赶至长沙。

未进城时，早有江忠源。左宗棠率带楚勇和乡绅及昔日岳麓书院的一班同学、同乡前来迎接。

来至巡抚衙门，张亮基在大开的中门外带领省署诸班官员大张旗鼓，迎接曾国藩一行的到来。从此，曾国藩以一文员侍郎之身分，开始了军伍生涯。

在欢迎曾国藩的宴会上，张亮基握着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仁兄，仗大才经纬。仁兄对湖南的挚爱、对小弟的挚爱，望施补天之术，使三湖之土早得安宁！”使曾国藩甚为感动。

第二天，曾国藩即向皇上呈递奏折，要求在长沙建大团，成一劲旅，以剿灭“洪杨发匪”。不久，便有五百里加急信马报达，咸丰亲批朱愉：“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随后即把带来的1000团丁编为两营，由罗泽南、王鑫各带一营；从中抽调80名精悍，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带。又组织一帮人马，10余名委员，在紧挨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瓚负责。

初来长沙，曾国藩对未来的发展并无多大成算。自己上报给皇帝的奏折，要在长沙成一劲旅，与太平军对抗。但实际上，皇帝的原旨是让他至省城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团练并非正规部队，其职守也只是“帮办”，归根结底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关键之时率带团练守卫地方。因此，初来长沙曾国藩的差使是对付地方的小股暴动。

因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本来就“不靖”的湖南，遍地是“匪类”起事。至长沙不久，道州便发生天地会何贱苟等首领宣布起义，围攻县城。曾国藩即派王鑫、刘长佑、李朝辅率湘乡团勇前往镇压。但队伍刚出发，忽接衡山草市刘积厚起事，杀死地方官，响应太平军，曾国藩又命王鑫转回头去镇压刘积厚。可是命令刚发出，又有攸县的黑红会、桂阳的半边钱会、安化的串子会、永州的一柱香会起事。尚有被太平军打散的清军，也混在造反队伍里，四处抢劫。几天里，呈报到“审案局”的急件就有一大堆。

做过十几年京官，终日同经书、诗文打交道文员，虽官至二品，那曾见过这般阵势？况且手中仅有那千把未经训练的军队，由几名书生率带，真是顾了东顾不得西，一时弄得这位衔命出山的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焦头烂额。

但是这位文吏出身的团练大臣却有他的办法和手段。他招集“审案局”委员及团丁，下令对地方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典，不论是盗贼、土匪、游勇，捉一个杀一个，谁捉一个，赏银5两。为了杀一儆百，他还命人制作一批木笼，类于囚车，把拿获的土匪枷于木笼游街。游罢街也不取出，直至游死、饿死为止。于是，没过多久，湖南百姓士子都知道长沙出了个残忍酷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委员也表示不再于这伤天害理之事了。

张亮基却极力支持曾国藩的行动，他认为“宁失之于严，不夫之于宽”。张亮基与曾国藩一个心眼，湖南地方对曾国藩的残酷杀人没地方告了，大家知道，因为“杀土匪”，告到咸丰那里也无济于事，皇帝恨的就是“土匪”太多。所以告曾国藩的状子没有了。于是，曾国藩每天主要的工作是命令杀人，凡捉到的都是“匪”，因此也用不着审问，只要“验明正身”，“杀！”非常痛快。于是，张亮基上折奏报咸丰，说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曾国藩见数月以来，以严刑酷法对待骚乱确有成效，于是变本加厉，拟定“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告示，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官铃，让团丁四处张贴，弄得长沙城及湖南全省一片恐怖。

曾国藩向咸丰帝奏报，他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之后，不满四个月由他直接领导的“审案局”就杀人137名；由他批示各县“就地处决”者更多，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之数又远不止此数。因此他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抨击，人们送给他“曾剃头”、“曾屠户”的混号，表示对他的愤恨。

曾国藩初办团练以杀人为营生，赚得个“曾剃头”的恶名。张亮基作湖南巡抚之时，处处让他放手去干，他还混得下去，但不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武汉失守，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张亮基调往武昌，接了湖广总督的空缺。湖南巡抚由布政使潘铨署理，不久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是徐有王，按察使是陶恩培、都新由外处调来。这三个人对曾国藩的做法不买帐，曾国藩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支持他的张亮基一走，新任巡抚和地方官便认为他是个多余了。地方大员对曾国藩不支持，文武官员也就更不配合，不久便发生了争端，几乎闹出了大事。

事情由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引起。

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所以干涉。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姓陶佳氏。初由火器营护军提升为二等侍卫，于咸丰元年（1851年）派往湖南任都司，在助守长沙之战时升为游击。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见塔齐布生性忠勇，剽悍骁健，无旗人和绿营军官中的腐败习气，很是看重他。乃聘他为教师，训练团勇。塔齐布对曾国藩唯命是从，认真做事，很得器重，二人交往愈加密切。

曾国藩训练团勇很严格，有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还要与绿营军一道会操，虽长沙盛夏酷暑之时，也不许停、止。曾国藩不许练勇停止会操，绿营兵也就得陪练勇训练，因绿营若不参加，何谈会操。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情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

一次会操时，曾国藩发出了会操的命令，只有塔齐布率领所部前往，其余驻长沙的绿营兵拒绝参加。还群起指责塔齐布谄事曾国藩。曾国藩大为恼火，以清德情于操练、临阵退却参劾之。清德不服，赴湖南提督鲍起豹处申

诉，反控曾国藩以炎热气候强令军队操练，虐待士兵，塔齐布令绿营与练勇会操是破坏营制。

鲍起豹护着清德，要对塔齐布进行惩处。绿营兵在鲍起豹的纵容下，更加嚣张，乃寻衅挑起纠纷，鸣号列队攻击塔齐布的军队。曾国藩出来干预，鲍起豹挑动军队包围塔齐布的营房，捣毁了营房、居室。并攻入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几乎击中了曾国藩。

曾国藩、塔齐布狼狈逃走，才免于被杀伤。曾国藩的公馆与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骆秉章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他才不得不同。他的处理结果，是向肇事者赔礼道歉，并不追究鲍起豹和清德的任何责任，也不对曾国藩加一语安慰之词。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皆言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曾国藩知道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 1853 年 9 月自动离开长沙，移驻衡州。

曾国藩的初办团练，其结果是很惨的。

九 发愤练勇

初办团练的受挫，给曾国藩的刺激很大，也使他有了初步的成算。离开长沙之前，原想给皇帝上疏，弹劾湖南巡抚、提督的纵兵闹事对他的排挤。后来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在与幕僚谈论此事时曾说：“我的起兵是被人反激而成的，初办团练之时，借人抚衙而居，令不得行，想杀几个不听令的士兵，全军鼓噪入吾居处，几为所戕。因是发愤练兵万人，居然成就了一支队伍，而有今日。”他是说，居人之室、借人之军，难以立足，必须发愤练成自己的一支军队，才有成功的本钱。这是他离开长沙，到衡州独辟山林的主意。

当年的衡州城，是湖南衡州府的知府衙门所在地，实际的名字是衡阳，即今天的衡阳市，地处湘水和蒸水的汇合处，是湖南省的名城，仅次于长沙。因为是知府重地，府称“衡州”，所以俗称衡州，而不叫衡阳。此城北临南岳衡山，控水陆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衡州曾是曾国藩的祖籍，曾妻欧阳氏是衡州人，衡州亲友多，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这是他来衡州的重要原因。

初来衡州，曾国藩接受了长沙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和地方官沟通好关系。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整整低了五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把由长沙带来的1000多名团丁安驻于此，罗泽南、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江忠济（江忠源之弟）、曾国葆等人算是他的手下大将了。

初来衡州，又是被人排挤而出，曾国藩的挫败之心很重，也知处境仍然尴尬，又怕给知府带来压力。所以，处处小心谨慎。

就说自己的“署衙”吧，到底取个什么名字？朝廷并未立定规矩，只说一个办团练，但团练大臣数十个，各自的品级并不一致，各地方也无“团练大臣”的衙门。几经商量，写个名称是：“钦命团练大臣曾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牌子写好之后，曾国藩感到不妥：皇帝诏书写的是“帮办团练大臣”，帮而办之，湖南主要办团练的角色还得是骆秉章；统辖湖南湘军就更不妥了，皇帝没给他这么个衔，也无统辖军队的权力。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

招牌不变，曾国藩的主意与在长沙时可大不一样了。他不再蛮干，不再仅做维持地方治安的刽子手。他要下决心练成一支劲旅，自做统帅，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

团丁安置好之后，他想的是先有一批可靠的军官。于是提笔在手，给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陈士杰等人各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前来共谋大计。这时郭嵩焘在湘阴募集练勇资金，刘蓉在曾国藩眼里是诸葛亮般的“卧龙”人物，在长沙时他一度随行，后因故返回湘乡。李元度是曾国藩的同窗，平江举人。陈士杰是自己的弟子，以拔贡上京朝考时，曾国藩是他的阅卷考官，

现在桂阳州原籍守制。

几封信发出去后，立即接到了江忠源的来信。江忠源是新任的湖北按察使，正带兵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江忠源的信是寄到长沙的，要他抓紧编练军队，练成一支劲旅开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绿营军在能征善战的太平军面前的确是不行了，一触即溃。

江忠源的来信解决了曾国藩久未想通的问题：皇帝给各地团练大臣的任务是“帮办”练团勇，并不是要他们编练到前方作战的正规部队，若是练成一支正规部队，实属越格。实际上，当时各省的团练，都不过控数百地主武装，湖南的 1000 余人，已是最多的了。这 1000 余人，在巡抚、提督眼里，也如丁如沙，他们的饷项、器械全靠自己解决，已属绝路，若真的编练大部队，更难以想象了。江忠源写信要他招募数千人马，奔赴前线，这正好让他作出新文章，即让江忠源代奏皇帝，批准他在衡州招募勇丁，编练成军，交他指挥。

实际上，未待朝廷批准，曾国藩便在衡州开始招募军队。

首先是李元度应邀到来，还带来了 500 名新募的平江勇。一个月后，李续宾、曾国葆、金松龄募来了湘乡 2500 余名湘丁。江忠济、邹寿璋从新宁、宝庆一带也招来 1000 多人。同原来的湘勇合在一起，共有 5000 余人。曾国藩把

这 5000 余人分为 10 营，开始训练。

这期间，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相继到来。郭嵩焘还募得湘阴军饷 20 万两，不日即可汇到，使曾国藩很是高兴。

他料到塔齐布在长沙不为鲍起豹所容，在军官缺乏之时，写

信向骆秉章报告了团丁安置等情况，请他随时派人来视察，顺便向他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员抚标军官，骆秉章一一同意。

曾国藩见文武齐备，同郭嵩焘、塔齐布、罗泽南、刘蓉、王鑫、李元度、陈士杰、杨载福、周凤山连续几天商量

了训练办法，制定了详细军事条例。10 营兵勇，分别由塔齐布，罗泽南、王鑫等人统带。

衡州知府陆传应见到曾国藩一下子招募了这么多人马，认为壮了衡州的声威，曾国藩又常和他商量练勇事宜，于是对曾国藩满投机缘，在初办之时，由府库存银取出 10 万两，挪为练勇之用，权作暂借，曾国藩自然喜悦。也算是出山以来遇上了真正支持他的人。

于是，衡州城外那块荒废多年的演武场上，突然炮声隆隆，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杀声阵阵，引得大人小孩前来围观，惊奇地看着这支从天而降的人马。

十 改革军制

曾国藩对绿营军的腐败认识是深刻的，它的将骄兵惰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在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仅靠八旗与绿营军是无法应付局面的。用他的话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所以，他这次编练军队，是要训练出一支不同于八旗与绿营的新军。

八旗、绿营是国家的正规部队，在曾国藩眼里都彻底腐败了，但地方的团练根本无法去前线与太平军作战，当时全国也没有多少团练。那么，曾国藩到底要练出什么样的军队来呢？实际上，他心里并无成算。一方面客观上逼着这么去做，在长沙时他并没有要独立练一支军队的思想，但是当居人之署，用人之兵，而被排挤出来，才被激而决定发愤募勇，练成一支他“自己”的军队，即成就了近代第一支军阀性质的军队——湘军。另一方面，在编练军队的过程中，一面编练、一面摸索，在实践过程中，使他知道要练成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再一个原因，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特质，必然造就出一支什么思想指导的军队来。

就说在编练实践中的摸索这一条吧。咸丰三年（1853年）夏天，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江忠源参与抵抗，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想把自己新练的军队派到前线进行实地作战，试试到底如何。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3000余人赴援。不久，战报到达，初战告捷，派去的各营均有战功，杀敌无算。然而，正当曾国藩自喜：“书生可用”之时，南昌城下却传来凶信：罗泽南一营冲锋在前，中了敌人的埋伏，死伤几十人，罗泽南手下的骨干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阵亡。部队撤回，曾国藩详细调查各营战斗情况，罗泽南手下的士兵一致反映：在罗泽南的前锋营遭到伏击时，后随部队见死不救，首先逃脱，才造成罗军的重大损失，后随部队便是金松龄。

查明情况后，曾国藩很生气，但从中也悟出了练兵的一个大道理，正如他愤恨地总结的那样：“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说的情况在清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中，随时发生，也的确是清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分析，绿营军所以会有这种积弊，是军队的将与兵之间、将与将之间、此军与彼军之间的统属性太差，没有形成“万人一心”的形势。绿营军本身就是“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太平军所以胜利，全在内部团结，誓同生死。所以，一定改变此种致命积弊，练就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酒杯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誓不相弃之死党”，这是曾国藩练兵与八旗、绿营根本不同的一个方面。

他认为，要练成这么一支军队，首先要改变过去的“兵为国有”而为“兵为将有”。绿营兵是“吃粮当兵”，当兵为吃粮，父子相继，以兵为业。曾国藩想根本改变这种局面，要“赤地立新”、“扫除陈迹”。他说：“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

《曾文正公书札》，第3卷，第1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4卷，第22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5页。

镇将。”为改变这种弊病，湘军的军官主要由读书士人充当，对其思想有严格要求，即：一会治军、二不怕死、三不急名利、四要能吃苦。要公、明、勤，有忠义血性。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不论出身高低贵贱，文化出身更高好，低一些只要会带兵，“有忠义血性”即可。

湘军的士兵挑选条件：不收绿营兵，不要集镇码头上的油滑之人，不要衙门当差的滑吏，最好的是山村朴实的农民。要求忠恳、质朴、身体健壮。

湘军要求统领由大帅选出，统领直接去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士兵，层层选拔。上下级一层一层绝对服从，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军官绝对服从大帅。

曾国藩规定：一营之兵，在一地选拔，利用同乡、亲友关系，加强宗亲友谊关系。应募者要取保具结，详细登记保甲、亲族、父母、子女，若有逃跑、犯禁者，以保人是问。

湘军内部关系的规定是：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皆属营官，统帅不加过问。官与官之间，全由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私人情感相维系。

训练要求极为严格，内容一为“训”、一为“练”。“训”重在政治思想教育，“练”重于军事、技艺的学习、锻炼。

“训”的内容，包括作人之道、儒家仁义方面的伦理教训，纪律方面的严格要求。每逢初三和初八，曾国藩要亲自给湘军上思想教育课。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对待军官、军官对士兵，都要以师长的态度，待士兵如待弟子，望其成仁、成义，要人人学好、人人成材，做忠臣孝子。即令其在家乡、在父母之手、在学堂读书，亦难学到在湘军的礼义和教育，要让士兵的父母妻子都感激湘军对他们的教育。

他要求湘军不染恶习。如严禁偷盗、奸淫、抢掠、吸鸦片、赌博、造谣、搬弄是非，尽量不要饮酒。他不厌其烦地教育，一讲就是一时数刻，想“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的教育，训练出一支儒家伦理精神指导的军队来。

曾国藩的军事训练包括操、演、巡、点四大类，即上操学习诸般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点名签到。黎明、傍晚各上操一次，中午和熄灯前点名一次。十天之中，逢三、六、九演习武艺、阵法；初一、四、七学射击、阵法；逢二、八学习跑跳。武艺中强调练精拳、棒、刀、矛和枪法；阵法上既学习古阵法，又要学会近代热武器的布阵、冲锋、埋伏和撤退。除打仗之外，每日都要坚持。在行军、扎营方面，认真研究择地、布局、跳沟、筑垒的近代方法。

湘军的编制以营为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起初人数仅数千，营以上不设官，由曾国藩直接统辖。后来人数增加，遂于营官之上设分统、统领。湘军成军后，水陆统领有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4人。咸丰末年，湘军人数大增，遂增加李续宜、多隆阿、鲍超、曾国荃等统领；又设蒋凝学、萧庆衍、成大吉、毛有铭、娄云庆，宋国永、彭毓橘、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易良虎等分统。每营人数，初为360人，后增为500人。

曾国藩为湘军规定的饷章与绿营军相差极大。他认为良将精兵是国家的命脉所寄，训练经费与军队的待遇都应优厚。但开始时国家不拨经费，他四

处挪借，也发给练勇高饷，后来国家正式承认了湘军，并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要部队，他制定的饷章也就更高。绿营军的待遇极低，守备部队每人每月只有一两银子，作战的军队是一两五钱银子，骑兵每月是2两银子，咸丰年间货币贬值，这点军饷已不足吃饭之用，军队经常靠离营做生意赚钱养家，所以战斗力就极低。而湘军的饷银士兵每月是6两，营官的月薪是每月260两，分统、统领月薪是400两至520两，统带万人以上者月薪650两，这个数字仅是规定，加上办公银、训练费等，实际上更要多，“将五百人者则岁入三千，统万人者岁入六万金，尤廉将也。”正因为湘军的待遇这么高，所以“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样一来，当时的穷苦农民、知识分子，甚至有功名的秀才、举人等看着湘军的待遇高，都争着投入湘军。清朝本来是重文轻武，武人武官待遇低，但湘军兴起之后，改变了这个局面，文人、文官往往踊跃投入湘军，使湘军的文化水平增高，兵源充足，部队的素质提高，战斗能力强，是湘军屡败屡起，最终打败太平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曾国藩改革军制对统治阶级是成功的，但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开端。

十一 湘军成军

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新式地主武装湘军产生了。按最初的计划，只想编练一只万人的部队，但因曾国藩的号召力很强，军饷发的也高，很快便超过这个数字。

陆师的编制是：塔齐布、罗泽南、邹寿章、周凤山、储玖躬、曾国葆、朱孙诒、邹士琦、杨名声、林源恩各领一营，每营500人，共是5000人。王鑫一人原领6营，约2400余人，曾国藩命其缩编为3营、1500人统带，王鑫不服，乃率军投湖南巡抚骆秉章而去。

水师的筹建稍晚于陆师。1852年底，太平军进攻益阳、岳州，得到大批船只，遂建水师。后由武汉攻南京，千船万舸，蔽江而下，控制了千里江面。迫于应付太平军的水师攻击，咸丰三年，清政府饬令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湖南巡抚骆秉章自认建水师困难，没有进行。而郭嵩焘亲见太平军的水上作战，往来迅捷，遂建议江忠源再度上书，要求清廷拨款、造船，实力编练水师。咸丰准奏，命令广东购置洋炮，两湖、四川造战船，建立水师，对抗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冬初，曾国藩奏请拨款4万两，在衡州建立造船厂，日夜赶造战船。他请来广西同知褚汝航、岳州守备成名标督造船只，从广西速购大批木材。到咸丰四年初，湘军水师成军，共有战船361号，有拖罟（g，音古，大纲）大船1号、快蟹40号、长龙50号、舢板150号、改装鱼船120号。船上共装大炮470门，新式洋炮320门。

水师成军之初，人数与陆师相等，亦编为10营，官管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彭玉麟、杨载福、龙献深、邹汉章、诸殿元10人担任。水营的招募从时间上看虽不太迟，但招募过程却很曲折。本来湖南之衡州、郴州、桂阳、永州一带多有习水性之人，也乐于应募，但曾国藩却不愿在那里招募，其原因一是陆师多在湘乡一带招募，水师也想在那里招募；另一原因是湘南一带多次发生起义，会党势力很大，曾国藩也不敢在那里招募。湘乡的壮丁多已参加了湘军和地方团练，又不习水性，所以不愿受招。但曾国藩利用各种关系，日夜说服动员，正好湘乡一带发生旱灾，百姓受灾生活困难，湘军的待遇又好，所以才纷纷投军，使水营也较快成军。

水师的营官招募也很困难，幸赖彭玉麟、杨载福出为营官，才使水师成军，而二人终成湘军名将。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外祖母有一养女小梅，与玉麟年龄相仿，舅父无子女，玉麟与小梅犹如亲兄妹，深受长辈的喜爱。玉麟与小梅虽辈份有别，玉麟称之为小姨，但全家上下只此一对小男女，并无辈份之别。玉麟与小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甚洽。玉麟每天上学，小梅都给他准备好文房四宝，送出门外；每天放学，小梅总去接他；晚上玉麟读书，小梅为他掌灯，添油；玉麟爱画画，小梅为他研墨、铺纸。

时间一天天过去，玉麟和小梅一天天长，纯真的情谊在这对小男女之间坚实地、一点一滴地滋长起来。他们虽都知道双方并无血缘关系，可是名份上的小姨与外甥怎好成亲呢？爱情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玉麟17岁那年，

衡阳传来凶信，祖母病故，他是长孙，必须回去尽孝。就在那苦苦分离之际，爱情之花抽蘖而出，小梅羞面如花，赠给玉麟一个鸳鸯荷包。玉麟紧握小梅的双手，吐出了藏在心里已久的爱慕之情，坚定地说：“等着，我来娶你！”

可是，彭玉麟回到衡阳，家境贫苦，母亲靠纺线供玉麟读书，无法拿出返回芜湖的川资，一别7年，直到外祖母病故才再次去芜湖时，这时小梅已经埋骨斗笠岭很久了。

彭玉麟在外祖母和小梅的坟前呼天抢地，悲痛欲绝。他以泪水和墨，写了悼念小梅的诗，其中一首是：“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由。斗笠岭上冬青树，一道土墙万古愁。”

此后，他誓不再娶，母亲每逼问，唯一语：“男儿功名未成，何谈婚事。”好在弟弟已成家，并生有儿女，母亲遂不再催问。但是，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来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此时，太平军先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在南京建都，5月出师北伐和西征。西征军沿江西进、攻占安庆、九江、汉口、汉阳，江忠源向皇帝奏报，请咸丰下旨让湘军出师作战。几次催促，曾国藩皆以水师未成，船炮不齐，编练未就而拒不出战。咸丰几度下旨催逼，曾国藩提出一个三江、两湖数省军队统一部署、联合行动的战略计划，遭到咸丰的斥责。原来，咸丰此时并不知曾国藩的长远谋略，亦不知湘军水陆的实际情况，催他作战，也只是以为湖南乡勇可用，让他配合绿营。岂料曾国藩不仅不出，反提出数省合防的战略计划，便以为他口出狂言，下旨斥责说：“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旨，既愤激，又惶恐。愤激者，以为二年前自己的犯颜直谏，

咸丰仍耿耿于怀，且不理解他编练军队的“血诚”；惶恐者，太平军势力浩大，绿营军三年的惨败，他若率师作战，是否能胜，确无把握，若一旦失败，就真的是貽笑天下了。

所以，越是这么想，皇帝越是催得紧，他越是不出战。

然而，不久自己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先后败死，内外压力和愧疚之心使他再也稳不下神了。

江忠源与曾国藩深交 10 余年，曾国藩赏识他，第一次向皇帝推荐人才就把他放在突出地位。江忠源自建楚勇，率勇参战，每战不遗余力。两三年间，就由知县升为安徽巡抚，职位高过了曾国藩。江忠源虽升为地方大员，但从未离战场。1853 年夏，太平军西征军围攻南昌，他据城顽抗，连番向皇帝保奏曾国藩，使湘军取得了皇帝的同意，合法扩军。同时要求曾国藩派兵催南昌，一再援促，曾国藩才派出两营，结果在城外中伏，不是江忠源冒险相救，两营军几全军覆灭。是年冬，太平军进攻安徽舒城。庐州（合肥），清廷升江忠源为安徽巡抚，防守庐州。12 月初，太平军包围庐州，该城是安徽临时省府，城池坚固，然太平军决心攻下。在紧急之时，江忠源多次向曾国藩求援，曾仍坚守“不出省作战”的初衷。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54 年 1 月 14 日），守卫一个多月的庐州终为太平军攻破，江忠源含恨投水自杀。

吴文镕是曾国藩考进士时的阅卷大臣，是他的恩师。先为贵州巡抚，太平天国进攻长江数省，调为湖广总督。西征军攻武昌，吴多次向曾国藩求援，亦向咸丰大力推举曾国藩的水陆师情况，曾竟不赴援。咸丰四年一月十五日（1854 年 2 月 12 日），吴领军在黄州堵城与太平军大战，军溃，吴文镕投水自杀。

吴文镕死前还给咸丰上疏，认为皖湘数省，只还有曾国藩一军可战；并写了一封遗书给曾国藩，让他好自为之。

十二 传檄出师

咸丰四年一月十九日（1854年2月16日），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围困武昌。同时分兵二路，一路由曾天养率领西进四川；另一路由石贞祥率领进攻湖南。

石贞祥一军2万余人，沿江而上，一月三十日（2月27日）克岳州（今岳阳），连下湘阴、靖港、宁乡，长驱直入，半月之内已进抵省城长沙仅60余华里，长沙城一片惊慌。

在太平军攻击岳州之时，曾国藩知此时再不出师，太平军亦必然打上门来。编练水陆军全为国之藩篱、家乡之安危，今日大敌当前，正是他效命之日了。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于衡州誓师，率湘军水陆1.7万人，开始与太平军作战。这天，湘军全军一色新装，聚集在衡州城西演武场上，什长以上的军官都骑在马上，等着出征的号炮。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旗下摆着一排桌子，桌上点燃千盏红烛。演武台上，满坐文武，衡州知府陆传应率府、县官员正等待为湘军献出征酒。

三声号炮响过，曾国藩在湘军营官的簇拥下登上点将台。曾国藩年当44岁（虚岁），中等身材，宽肩厚背，宽阔的前额钳着两道粗粗的扫帚眉，一对三角眼里闪着阴冷、锐利的光芒，鼻直口阔，一把长须浓浓地飘在颌下。因在母亲的丧期之中，穿一件黑布长棉袍。他神态稳重，面泛红光。走上点将台，合抱双拳，向地方官和远处围观的百姓致意。然后面向北方跪了下来，向苍天和皇帝各拜三拜，并接过部下送上的血酒，慢慢浇酒。

祭礼已罢，陆传应率文武官员走过来向曾国藩敬酒。随着一阵唢呐声响，一面大匾抬上点将台，匾额黑底金字：“国之于城，民之瞩望。”曾国藩连番抱拳，表示谢意。嘴里说的是什么，在锣鼓、军号、唢呐及人声沸腾的嘈杂声中，根本听不到。

礼成，曾国藩从怀中拿出一纸，擎在胸前，文武各官重新就位，鼓号皆停，他拖着重重湖南口音，朗声宣读《讨粤贼檄》。由于人马甚众，排下数里之遥，自然也难听见，好在预先已令人大量誊抄，使闹市僻壤，皆知其檄文大意。

这篇被诮为“胜过百万兵”的檄文，是曾国藩搅尽脑汁、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各方面情况而写成的，说它能顶百万兵也许是夸大了，但它对煽动各方面力量起来同太平军对抗，的确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这篇檄文除了像一般讨伐文告那样，列数对方罪行之外，又有它的独到之处。如：檄文利用三江两湖百姓不了解太平军的真情，极力描述“粤匪”的恐怖；同时借太平军内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之别，挑拨离间，煽动长江数省人民对“粤匪”的仇恨，挑起太平天国内部南北军队的分裂。说太平军起义是两广人的起义，而“胁”“两湖三江之人曾犬象牛马之不若”。这种挑拨，的确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曾国藩把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说成是“外夷”的代表者，他要做中华民族讨伐洪杨等外国侵略者的代表者，这种立足点和眼光都是相当高明的。拜上帝在中国没有根基，外国侵略者通过武装和宗教入侵中国，引起中国、尤其是南方数省人民的反感和仇视，太平天国对侵略者一时也未认清实

质。他们的弱点为曾国藩所深知，在檄文中抓住宗教问题大力攻击。

以卫道面目出现，争取封建士人，更是这篇檄文的着墨之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源远流长，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尊崇孔孟，而太平天国极力反孔，捣毁孔庙、孔像，焚毁儒家经典，这就等于挫辱和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檄文》夸大其辞，号召知识分子起来“以卫吾道”，自然也是抓得很准的。太平天国在这方面的失误确实很严重，是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檄文》说：“粤匪”使“农不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以此攻击洪秀全假托“天帝”要把天下之田地、货物夺归已有，剥夺了农民的耕种纳赋权和商人的买卖取息权。当时太平天国发布的空想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物物归上主”的内容本就不清楚，《檄文》煽风点火，为洪杨等起义号召制造了更大的障碍。

《檄文》引证太平天国上自王臣，下至兵卒皆以兄弟姊妹相称，是违背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伦常秩序，这当然是曾国藩别有用心。但他宣称洪杨不让人有父母兄弟之别，有上下尊卑之叙，对孤立太平军却起到很大作用。

《檄文》抓住太平天国独尊天主上帝，反对崇拜其他偶像，反对鬼神迷信的事实，大加渲染歪曲，说他们已是“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

总之，曾国藩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一心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檄文》中却不在此立论，而是以维护孔孟之道、宗法礼教、私有财产、合法劳动立论；本来是清政府卖国投降，他在《檄文》中却反诬太平军是“外夷”的代理人。因此，号召天下“仁人”、“志士”，响应他的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讨“粤匪”。

誓师毕，曾国藩下令全军出师。他与水师将领跳上一只最大的拖署大船（曾国藩命名“座船”）之上，顺流北去，慢慢远离了衡州。

曾国藩自长沙被排挤而至衡州，短短半年，便率领水陆两军 1.7 万人之众，返回湖南省城。

湖南巡抚骆秉章一是急需军队防守；二是曾国藩也奉旨“东征”，亲自率省城的文武官员迎到城外。

在省城停歇了两天，接到皇帝允准他的奏请，以塔齐布为长沙绿营副将，取代了清德的地位，这也算是对鲍起豹等骄将的一次惩罚和回击，抒发了半年前受辱之愤。

出师前后，曾国藩还向清廷保荐了胡林翼。

胡林翼其人在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中，其地位和影响十分重要，时人往往以“曾胡”并称，说明他的作用及名声与曾国藩是并列的。曾胡二人关系密切、配合也好，其契机便是在曾国藩出师的当口。

胡林翼（1812—1861 年），字岷（kuàng，音况，赠送之意）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翰林出身。任京官期间，与曾国藩有交情，胡曾赠其岳父陶澍所著《陶文毅全集》给曾国藩，曾读之甚熟。胡因丁忧回籍（1841 年父病死）守制，满期后以知府衔分发贵州试用，先后在云贵总督林则徐及吴文镠、程矦采、罗绕典属下任职，很受器重。时贵州反抗运动大炽，胡先后任贵州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镇压反抗极是卖力，手段强硬，因杀人甚多，有“胡屠户”之恶名。但清政府对他极为赏识，很快升为实任道员。1854 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打湖北，湖广总督吴文镠调他援武汉。胡林翼率黔勇来湖北，行至中途闻吴文镠在黄州败死，太平军正沿江西进，急忙退至

岳州暂避，这时曾国藩在衡州正待出师。

曾国藩知道胡林翼是一个“干吏”，立即起草了奏章，向皇帝推荐他。在奏稿中极力赞扬胡林翼“胆识绝人”、“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胡某才胜臣十倍”。在上谕批复之前，曾国藩率湘军到了长沙，向骆秉章建议将胡留在湖南。骆秉章同意了曾国藩的建议，把胡林翼留在了湖南，湘军出师同太平军作战，胡林翼率所部随征。此后，以功授四川按察使，不久又调任湖北，升为湖北巡抚，一直协同湘军作战。湖北、安徽等地的重大战役，皆配合湘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曾、胡二人的私交，湘军和胡林翼部的配合，都极为密切，这种关系，便是从曾国藩率湘军出师之际开始的。

十三 湘军初战

当湘军自衡州入长沙之时，太平天国西征军将领石祚祥（翼王石达开从兄，国宗、提督军务衔）不知湘军底细，仅在宁乡与湘军前锋储玖躬小战，即主动放弃岳州、宁乡、湘阴，退向湖北。退军不久，即遇林绍璋部援军到来，遂又合军重返，攻占咸宁、蒲圻。

当太平军后撤之时，曾国藩即派胡林翼、塔齐布、林源恩由陆路进攻通城，并约定与骆秉章派出的王鑫部会攻蒲圻，自率大军由水陆向岳州进发。

王鑫率 3000 军队行至羊楼峒，突与太平军遭遇，大败而回，急忙进入刚为太平军放弃的岳州城。太平军尾追而至，把岳州城包围。此时曾国藩行至南津，闻前军失利，王鑫被围，遂急催炮船援岳州。攻至岳州城下，向太平军猛烈猛击，太平军稍退，王鑫趁击突围走，千余人被歼。太平军攻入岳州，并乘胜前进，再占靖港、湘阴、宁乡、湘潭，重对长沙形成钳制形势。

曾国藩初战不利，退回长沙。他把水师安置于水陆洲周围，陆师扎于城郊，曾国藩住于座船之上，不入长沙城。

湘军这次初与太平军接触，实际上并未展开战斗，顿挫而回。长沙城里的官绅们便议论纷纷，多说曾国藩是文员带兵，定无出路，少数人提出解散湘军。骆秉章自然无权解散湘军，因为湘军的编练与出师咸丰帝都在上谕中认可；长江无兵守卫，他也正急需军队防守。但是，他对曾国藩态度也甚为冷淡，后来曾国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湘军初离长沙，不利而回，自己不便进入长沙城，住在座船里，湘抚骆秉章不来见他，到他的邻船上去拜客，也有意不移步到他的座船之上。然而，在当时的“群疑众谤”的困境里，曾国藩咬定牙根，气恼而不灰心，他整顿队伍，准备与太平军真正较量一番，看看自己的湘军是否“可战”。

于是，他召集众将，议定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向大家分析说：“湘军出师受挫，并未见出胜败来，“粤匪”气势虽盛，但他们的军队兵力分散，一支军队窜扰两湖、四川、江西、安徽数省。进攻湖南的“粤匪”，株守湘潭、靖港、湘阴、宁乡等地，后继无援。尤其湘潭一军，孤军深入，实为用兵大忌。我军应聚而攻其孤军，必可胜之。”

曾国藩的分析，得到诸将的一致认同，当即确定了集中兵力，攻击湘潭的计划：陆师派塔齐布为前锋；水军全部出动，彭玉麟、杨载福等 5 营先行，曾国藩率其余大部殿后。

湘潭太平军只有林绍璋一部，林忠勇有余，才智不足，一战被湘军打败，丢了湘潭，失去战机，是太平军西征军由胜转败的转折点。

但是，当湘军前部水师、陆师出发以后，曾国藩本人却因听信了不准确的军事消息，打消了随军攻湘潭的行动，在靖港吃了一个败仗。

曾国藩分派水陆出师后，打算第二天凌晨继后出发。但正巧在夜半，忽有靖港民团前来报告，那里的“长毛”仅有 500 余人，毫无作战戒备，若派军往攻，必然胜利。并且说靖港的民团已作好内应的一切准备。曾国藩闻信，核对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得知民团来人与湘军内部确有朋友关系，不会有假。

由于出师受挫，曾国藩多么希望能打个胜仗，那怕是个小胜仗，也能扭

转一下受挫之辱。何况靖港也是湘江上的水陆要冲，打下靖港，割断太平军进攻长沙的路线，孤立湘潭，也不失为一次好仗。况且，以湘军大营的水陆军队，足可以很快吃掉靖港的 500 太平军。

思虑至此，他决定先攻下靖港，再回师进攻湘潭。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4 月 27 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号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李续宾、王鑫等人想督军迎战，谁也不听指挥。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战。然而，他心知不能一败再败，必须誓死抵抗。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他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军旗插在江边，自己执剑立于旗下，高声断喝：“过旗者斩！”

溃兵涌来，曾国藩大吼一声，挥剑砍翻一个，余者呆立瞬刻，绕过军旗，继续狂奔。后面的败兵如排山倒海，曾国藩一把长剑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皇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绥，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得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一片败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吼！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麟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麟一面大叫，一面由舢板上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解劝，狼狈退回长沙。

十四 湘潭之胜

如果说岳州之战湘军尚未与太平军见真章，而靖港之战由曾国藩指挥，中计大败，要算湘军成军出师的第一次大败了。许多史书却说湘军被“全歼”，这是夸大其辞的，那次曾国藩只带了湘军的大部作战，而中坚力量被彭玉麟、塔齐布率攻湘潭，进攻靖港的湘军也仅被消灭部分而已。那次作战，曾国藩究竟带去多少人马，被歼多少，走失多少，由于湘军对此讳莫如深，至今也没搞清楚。就说曾国藩的自杀吧，他活着时谁也没敢实说，直至曾国藩死后，亲自救他的章寿麟作了个《铜官感旧图》，请《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作诗配之，李元度和左宗棠分别写了序。章寿麟所“感”就是曾国藩当年在靖港败后，船行至铜官渡投水寻死的情景。此后，世人才知靖港大败，曾氏自杀的事情真相。曾国藩二败返回长沙，城里的官绅对他的攻击比第一次更加猛烈了。以布政使徐有壬为首，幸灾乐祸，煽风点火，齐拥至巡抚衙门，要求起草奏折，状告湘军的惨败，曾国藩的无能，要求解散湘军，惩办曾国藩。湖南提督鲍起豹更是放声大骂曾国藩，说湘军劳民伤财，把“粤匪”引到了湖南，是“引狼入室”，下令关闭长沙城门，不让曾国藩及湘军一人进城。

曾国藩二度返回长沙，情绪极为低落，他不吃不喝，不洗不理，蓬头跣足，万念俱灰，还想寻死。他叫来弟弟曾国葆，让他去做一口棺材，曾国葆不干，苦苦相劝。曾国藩大声命令：“这是军令，不听者斩！”曾国葆只好派人去买来一口黑漆棺材，停放在江边。

曾国藩还给咸丰写了遗折，说明自带湘军进攻靖港，开战不久，全师溃败，难酬当初为国报效之愿，决心一死报主恩，以谢丧师败北之罪。并推荐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让他们继续率部征讨“粤匪”。同时又写了一个遗嘱，让曾国葆立即送其柩回家，不可在外开吊，费用自理，不可花公家的一分钱，湘军所余之资，概交粮台。

正当曾国藩选择着如何自杀的方法时，一直防护他的曾国葆推舱而入：“大哥！湘潭水陆大胜，湘潭大胜！”

“真的？”正徘徊于生死路口的曾国藩，那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真的！长毛全军覆没，贼首林绍璋只身逃脱。这是塔齐布的亲笔信。”

曾国藩双手颤抖，好不容易打开了塔齐布的信，读着读着，激动之情难以控制，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湘潭之战是一场大仗，也是一场硬仗。

原来，林绍璋率军占领湘潭，目的在由南北两路夹攻长沙。但当湘军自长沙出师后，他自知后援断绝，成了孤军。

由于他的战斗经验较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诸将意见也不一致，相互争吵，乃至殴斗。正在太平军内部混乱之际，湘军前锋塔齐布攻至城外。林绍璋派兵在城北堵击塔齐布，自己退入城中。随后，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褚汝航也兵临城下，与太平军水师在城外湘江中大战。湘军之火力远胜太平军，湘军炮船用英、美洋炮轰击太平军木船，木船起火，焚烧甚惨。湘军初战胜利，于是展开水陆大战，陆师攻城，水师以利炮助战。在湘军凌厉的攻势下，太平军大败弃城而逃，临逃之前，“老兄弟”开枪痛击“新兄弟”，“潭城分党哄斗，自相戮者，约计数百之多”。

湘潭之战自四月初一日（4月27日）至四月初五日（5月1日）。经过6天激战，湘军十战十捷，太平军阵亡万余人，逃溃亦近万人，船只被烧被夺2000余只。是太平军自广西出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自然也是湘军出师了不起的一次胜仗，成为双方军事的一个转折点。太平军西征军自此由胜转败；湘军的士气、声望则大振而起。

湘潭之战的胜利消息传到京师，引起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真正重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几乎每战必败，像湘军在湘潭之战上的胜利，实在太罕见了。自此之后，清政府对湘军刮目相看了。黎庶昌《拙尊园丛稿》记载：“湘军初练，某大学士言于朝，以为曾氏回籍自练军队，一呼数万，志不在小，非朝廷之福。而湘潭战后，皇帝特召编修袁方英（湘潭人）问所破贼状，皇帝听了大悦，当日授袁为松江知府，曾国藩之志方得以明。”遂后，咸丰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潭大捷。同时下旨严责鲍超豹失城丧土之咎，革职拿办；培齐布被任命为湖南水陆提督。尤让曾国藩感到高兴的是，准他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视军务需要皆有权调遣。

这些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对他百般赞誉，硬是把曾国藩请入轿内，住进省抚衙门。曾国藩再三推辞，带着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一班参谋住进原来的湖南审案局里。骂他最凶的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主动提出湘军在衡州向陆知府借的十万两白银，由省库拨还，还答应湘军以后的粮饷，“鄙人尽力筹措”。

曾国藩脚跟站稳后，立即着手总结岳州、靖港、湘潭三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他认为一年来编练的湘军，到实战之中有的敢战、有的一触即溃，要在湘军中树立“不怕死”的精神，现在正是该严厉整顿的时候。经过调查，三次战斗，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所率之营能战能防，临败不溃，于是嘉奖了这些有功的官兵。而那些溃败之营，尤其是靖港之战不听指挥，拼命逃跑的官兵，上自营官，下至伍卒，一律裁撤。第一个拿来开刀的是曾国葆的一营，在靖港战役中最先逃跑，除去最后跟着曾国藩撤退的一些官兵外，一律撤去不用。曾国葆本人也被撤去营官，开缺回籍。曾国葆哭着找曾国藩要求留下，曾国藩认为正人必先正己，军令已出，不能再行收回，让他回家告诉曾国荃与曾国华，在籍各招500壮丁，用心操练，储备待用。

曾国葆先被撤职，其他各营整顿顺利，共裁团丁3000余人。塔、彭、罗、杨四部则大量增募，仅塔齐布一军即达7000人，罗泽南部增至1000余人。整顿后的湘军共有陆师20营、水师20营。水陆师各设统领2人，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充任；水师由彭玉麟、杨载福充任。将战斗中表现勇敢的两员猛将，鲍超和申名标，提拔为营官。

这次整顿，在湘军史上称为“长沙整军”，是极重要的一次事件。湘军以后的能战，同这次整军有极大关系。

每天清晨，长沙城外的演武场上，陆师在塔、罗的指挥下认真训练；水陆洲畔的江面上，彭、杨指挥水师演练攻守。曾国藩每天穿戴整齐，亲临检视、训话。还亲自编写了《得胜歌》，请人谱曲，让官兵每天演唱，鼓舞士气。

十五 夺取武昌

长沙整军后，曾国藩信心十足，准备向新败的太平军西征军发动攻击。西征军曾天养部闻湘潭大败，恐湘军乘机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沿江诸城，乃由宜昌东进，经澄澧、安福，收集湘潭溃军。林绍璋败后，经靖港、岳州，亦收罗残军，向西进的曾天养靠拢。行至常德，闻曾天养已东进来援，遂留驻常德。不久，两军会合，一起转回岳州，高垒深壕，准备与湘军决战。

曾国藩闻知太平军在岳州加强了防务，先命塔齐布 7000 人马迅速赶至岳州城下，让罗泽南、周凤山率军为后援。咸丰四年六月三十日（7 月 24 日），两军会战，太平军失利，连夜弃岳州退守城陵矶。

城陵矶是长江通洞庭的一个极险的军事要塞，易守难攻。太平军占领城陵矶，湘军几攻未下。七月十六日（8 月 9 日），湘军水师褚汝航、夏銮、清军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游击沙镇邦等飞舟顺水乘风攻至城陵矶，江风呼啸，清军水师突入太平军的防守圈内。太平军奋勇冲杀，湘军水师指挥失灵，进退两难，被动挨打。结果，湘军惨败，褚汝航、陈辉龙、沙镇邦、夏銮 4 人皆被打死，水师丧失大半，战船数十只或沉或降。后队杨载福赶来，水师已溃不能战，只得退回岳州。

七月十八日（8 月 11 日），湘军陆师塔齐布进攻城陵矶，曾天养率军抵抗，两军展开前所未有的恶战。塔齐布与曾天养都是两军中的善战拔尖人物，他们指挥的军队都不怕死，两军殊死冲杀，各不相让。恶战之中，曾天养与塔齐布突然相遇，他拍马挺枪与之交战，塔齐布毫不示弱，二人马去枪还，犹如古战场上的两员猛将，杀得两边兵将直了眼。

曾天养在太平军中，威名赫赫，他是广西壮族人，参军时已 50 余岁，骁勇异常，屡战皆捷，被誉为“飞将军”。所部称“虎头军”，因功封为秋官正丞相，为太平军西征军主要将领。西征以来，率兵攻克江西南昌、丰城、瑞州、饶州、乐平、景德，安徽东流、建德、集贤、桐城、舒城，在庐州击毙江忠源；转战湖北，克黄州，破吴文镕部，又连克汉口、汉阳，取孝感、云梦、德安、随州、安陆、宜昌；继援湖南，克澧州、常德。曾天养有勇有谋，虽年已 60，但每战必身先士卒，武艺精湛，无人能敌。

然而，城陵矶之战，遇上塔齐布，也算碰上了强敌。塔齐布是湘军第一员猛将，善于骑战，精于马术，他是满洲镶黄旗人，依然保持着入关时那种强悍的气质。

二人激战多时不分胜败。曾天养怒睁豹眼，越战越勇，突然一矛刺中塔齐布战马，一个颠扑，塔齐布几乎摔下马来。塔之亲兵在同一瞬间，从曾天养背后猛刺一枪，曾天养猛一回马，其坐骑即被刺中，马蹶人倒，被塔齐布挺矛刺中，壮烈牺牲。

曾天养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西征军闻知皆痛哭失声，为之“茹斋六日”，洪秀全追封他为烈王。城陵矶主将牺牲，顿失斗志，只好败退武昌。

城陵矶战后，曾国藩指挥水陆并进。水师连陷嘉鱼、金口，湘军将士扬眉吐气，逢阵皆露立船头，不披甲冑，不避枪弹，一路杀来，直达武昌城南数十里下泊。陆师从岳州出发，经蒲圻、咸宁、山坡、纸坊，直达洪山一带。

水师达金口时，曾国藩召集众将，议攻城之策。罗泽南提出，陆路分兵两路，一路攻洪山；一路攻花园。他说，花园的太平军有精兵两万，设有三

座大营，若攻其洪山，花园太平军必起而援助，罗泽南自任前锋，先攻花园，余兵扼堵洪山，协其攻克花园，武昌即成为孤城。曾国藩同意了他的计划。

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54年10月12日），罗泽南挥军进攻花园，太平军凭借临时搭起的木城，架炮轰击，罗军伏地前进，待攻至木城前，太平军竟溃乱而逃。罗军乘势夺取了数十条大船，连续攻克了三座大营，两万太平军几乎不战而溃，第二天，继攻鲰鱼套，经过小战，也轻易取得。花园太平军溃败，塔齐布率军攻洪山，洪山守军坚决抵抗。得知花园溃败，此路太平军知不能守，也纷纷退避。塔齐布下令攻击，太平军多跳湖奔逃，降者千余，洪山亦克。

湘军兵临武昌城下。

太平军武昌守将为黄再兴、石凤魁、韦以德等人，或则文员、或则国宗，皆不习战事。当曾天养牺牲，拥军水陆北上达金口时，国宗韦以德首先逃离武昌。太平军在武昌城的守卫部队尚有千余战船，陆师万人以上。但黄、石等人无指挥之才、官兵也悲观失望，在太平军失陷花园、洪山的第二天夜里，便弃城逃走。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重镇武汉，就这样轻易地丢给了湘军。

石凤魁等人是在少量守护部队的保护下私逃的，汉水里的大批船只、数千水军及城里的守卫部队皆未得到撤退的消息。天一亮时，湘军攻城，城里的守将早已逃跑，守军大乱。湘军登上城墙，打开城门，一涌而入。

凶猛的湘军逢人便杀，太平军尸横满街，血水成河。被禁闭在汉水里的船队遭到湘军的猛烈射击，或被射杀，或被赶入水中淹死，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曾国藩于当日在诸将官的拥护下进入文昌门，见到这湖广第一名城已为自己收复，心里感慨万端。

武昌被攻占的第七天，湖广总督杨霨向咸丰报捷。又过了6天，曾国藩才详细地向咸丰奏报了湘军进攻花园、洪山及攻克武昌的战况。

咸丰闻报，高兴得比曾国藩还要厉害。他简直不敢相信曾国藩一个文员，率领编练不足一年的湘军，竟把武汉攻克，收复两湖大部失地。看过奏报，立即下旨，任命曾国藩为署湖北巡抚。他兴高采烈地向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还在谕旨中表示：“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随后，又下旨封赏湘军将领。胡林翼升为湖北按察使，罗泽南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擢常德协副将，鲍超升为参将，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人都有升迁。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喜庆荣升之时，又一道上谕弄得众人懵头转向：在收到授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第七天，曾国藩跪听的又一个上谕是：“曾国藩著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之前，湖北巡抚着杨霨兼署。曾国藩、塔齐布立即整师东下，不得延误。”咸丰帝还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还怪曾国藩的奏折不署加封的官衔（即署湖北巡抚衔），故说是“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

《曾文正公奏稿》，第3卷，第62页。

《曾文正公奏稿》，第3卷，第79页。

上谕改变了初衷，收回署理湖北巡抚的旨意。曾国藩本来就是侍郎，上谕又说“赏给”，纯是空头人情，曾国藩的官职丁点未动，还落得个“严行申饬”。更让曾国藩恼怒的是，署理湖广总督杨需未有寸功，却因武昌收复而实授总督，一直与曾国藩作对、反对编练湘军的原湖南按察使、新授江苏布政使陶恩培竟实授了湖北巡抚之职。

是何原因？上谕解释，因曾国藩立即要率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然而，当时清军、湘军中的授衔，那个不是“空有其名”呢？所以，还是令人费解。究其原因，咸丰帝是在遵奉大清祖训，即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兵权的汉人控制。此后，曾国藩率军艰苦奋斗，仗越打越大，声名越来越高，清政府对他也越来越不放心。使他在若干年内，处于客军虚悬之地；以后虽授以地方大员之位，仍是不断发生龃龉，对他游移不定，甚或加以打击，使曾国藩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甚是尴尬。

十六 田镇再胜

曾国藩攻取武昌后向咸丰皇帝奏报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即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方略，先经营湖北，再以两湖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步步逼向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南京。眼前需要休整部队、补充兵员、调集粮饷，作好再度战斗准备。曾国藩提出，太平军的主要兵力部署于长江两岸，实力并未根本丧失，湘军虽取得武昌城，若全军东下，失去后方供应，必然陷入困境，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但是，咸丰皇帝却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正确意见，下旨令湘军立即东下，曾国藩不敢违旨，只得提兵东下，果然陷入了军事困境，几乎全军覆没。只是在东进的第一仗——田家镇一战再次取得胜利。

当武昌失守消息传至天京（即南京），使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等甚为震动，遂下令锁拿黄再兴、石凤魁，押回天京。令燕王秦日纲前往田家镇布防，迎击湘军的东进。

秦日纲率领3万人马西上，行至湖北蕪州，召集各地的军队和自武昌败退的军队。不久，石祥祯、韦俊、林绍璋、石镇仑、周国虞等部皆到达蕪州。武昌败退的军队，也陆续到达万余人。秦日纲在蕪州召开军事会议，商量战守事宜。大家都认为，湘军占武昌，势必东进，犯天京。但湘军水陆充其量不过3万人，而且连连战斗，未得休整；太平军目前集于蕪州者已过5万；从蕪州至武穴，关隘甚多，充分加以利用，正是歼灭湘军的大好时机。

韦俊、周国虞等进一步提出：蕪州、武穴之间有一险镇名曰田家镇，位于长江北岸，隔江相对的是半壁山。此处江流湍急，地势险要，在此布置人马，是歼击湘军的好去处。最后，秦日纲决定让检点陈玉成率军驻守蕪州，其他诸军全部驻守田家镇，准备在此全歼湘军。

正如太平军诸将所分析的那样，田家镇的确是武昌以东的军事重镇。该镇是一个有5000人口的大集镇，商贾繁盛。对岸的半壁山，孤峰雄立在大江南岸。山下一条大道，通往瑞昌；山南麓有一条发源于幕阜山，流经通山、兴国的富水，在此注入长江。入江之处是富池镇，下走30里，便是武穴。咸丰三年一月（1853年2月），太平军在此大败两江总督陆建瀛，如今主客易位，太平军要在此阻击湘军。

秦日纲率领4万人马赶至田家镇，侦察之后分兵两处。秦日纲、石祥祯率2万人马驻守田家镇，韦俊、石镇仑、周国虞等率2万人马守卫半壁山。

韦俊等来至半壁山，对防守进行了精心安排。韦俊、周国虞等将领皆非泛泛之辈，韦俊是北王韦昌辉之弟，又名韦志俊、韦十二，年方28岁。太平军起义初，随兄起义。他虽是国宗，但学问、见识都很高，打起仗来也颇英勇、果敢。自起义以来，参加了许多次恶战，表现突出，战功卓著。湘军成军后，与之进行了几次战斗，知湘军非绿营军可比；曾国藩等将领也非一般清朝官吏，对他们不能掉以轻心。这次作战，他是半壁山2万兵马的主将。他让石镇仑率军8000人至半壁山脚安营，林绍璋率5000人驻守富池镇，周国虞率6000水军扼守江面，自己率其余兵马扎营半山腰，总领半壁山战场。他向部队下了死命令：掐死湘军水陆去路，绝不许后退。

韦俊、周国虞等还怕挡不住湘军水师，提出可在江面上设一道拦江铁锁，以阻湘军的战船。他们也知当年东吴阻挡晋军、后晋阻挡后汉，都用过铁锁

挡江之法。然而，铁锁如何架法？为什么当年吴、晋的铁锁又未锁住大江？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悼念当年吴国在田家镇的上游黄石设拦江铁锁，还是被晋国大将王浚打破，落得“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最后大家认为，战守之具全在运用，设置拦江铁锁，用以阻挡湘军水师，绝不会出现“金陵王气黯然收”的那种下场。

太平军里有的是铁匠、木匠，周国虞等人找他们来一同商量。大家七嘴八舌做出了决定：做成6根大铁锁，南拴半壁山，北系田家镇，横截大江江面。锁下每隔10丈安一只大船，首尾以大锚固定，铁锁也固定在船上。每隔3只大船再设一个大木排，承受铁锁的压力。按此计议，周国虞布置铁匠打锁、木工造排，10天以后半壁山6道拦江大锁造成，像6根玉带，捆住了滔滔大江。

北岸田家镇的布防与南岸半壁山大体一致。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湘军水陆从武汉出发，分兵3路东进。湖北军在固原提督桂明的率领下，沿江北岸推进，为第一路；湘军水师顺流而下为第二路；湘军陆师沿南岸前进为第三路。湘军陆师离开武汉后又分为两支：塔齐布一军经武昌县进攻大冶，罗泽南一军经金牛堡进攻兴国，两地取胜后，合军进攻半壁山。

曾国藩亲自指挥水师沿江东下，经葛店、黄州，于第三天到达道士袱。接到前军探马报告：前站是蕪州，有太平军陈玉成守卫，水陆号称万人，主要是陆师，仅少量水师。湘军前锋塔齐布现达金牛镇，听候进军命令。

曾国藩与彭玉麟、杨载福、刘蓉、郭嵩焘等研究之后，下令塔齐布与罗泽南分别进攻大冶和兴国，引诱陈玉成援救，水师趁机冲过蕪州。

塔、罗两军接到战令，立即向大冶和兴国发动进攻。陈玉成果然亲率4000人马援救兴国与大冶，而塔、罗兵进神速，不待陈玉成赶到，已分别攻下两地、合军向半壁山前进。

曾国藩知陈玉成率兵援救兴国与大冶而去，先是企图一举攻下蕪州城，结果进攻几次皆未成功，遂改变策略，采取越寨攻敌之策，舍弃蕪州而不攻，顺流直驶田家镇。杨载福的先锋营首先到达田家镇，猛然看到江面上有黑黝黝的6根大铁锁拦在江面上，铁锁后面布置着太平军的水师。杨载福明知铁锁难过，急令后撤，太平军水师大炮齐轰，几条战船被打伤，许多湘军士兵落入江中。

曾国藩也无过锁之策。他发出命令，先让陆师进攻半壁山，或能夺得半壁山，从岸上除掉铁锁，水军开炮，为陆军助战。

罗、塔两军依令分别攻打半壁山和富池阵。太平军依险顽强抵抗，湘军先有武昌之胜，打起仗来也格外勇敢。经一天激战，双方死伤很重，罗军方攻下山脚的营盘，太平军退回山上。塔军经两天激战，攻下富池镇。第二天，秦日纲、韦俊亲自指挥，反攻湘军，血战竟日，太平军大败，退回对面的田家镇，半壁山战斗结束，这天是十月初七日（11月26日）。

这时，湘军水师也部署了破坏江上铁索的计划。彭玉麟、杨载福指挥战船，集中火力轰击太平军的江面水师，同时轰击铁锁下的船只和木排。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湘军驶出一队船只，分别驶至铁锁之下，以巨锅盛满油脂，置于船上，将大铁锁烧红，用巨斧砍断。

太平军见湘军欲断铁锁，水陆两军同时出战，拼命阻挡。战斗在江面和两岸同时进行，异常激烈。烧锁的湘军船只多次被炮火击中，巨锅里的沸油

烧着了战船，另一只燃油的战船再冲上去，继续烧锁。

此时，占领半壁山的湘军，利用山上大炮轰击江面上的太平军水师。

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拦江铁锁被焚断，湘军水师攻过田家镇，沿江焚烧太平军的战船，被毁达4500余只，长江江面，一片火海。太平军西征的战船不下万艘，经湘潭、岳州、武汉、田家镇几战，九江以上的战船荡然无存，水师大体瓦解。

田家镇一战，太平军水陆大败，伤亡巨大。于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退向黄梅。十四日（4日），蕲州守军也败退广济。湘军陆师尾追至黄梅与广济之间的双城驿，两军再次交锋，太平军再败，退向九江。

湘军在田家镇战役中虽然取得胜利，但伤亡也很重。战后，曾国藩集中部队在田家镇休整，向咸丰报捷，为部下讨封赏，为阵亡官兵请恤。曾国藩深知优恤死者，可以激励生者，在田家镇建立“昭忠祠堂”，供奉哨官以上的军官，牺牲勇丁，也都刻碑纪念。八个纪念石碑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牺牲者的姓名。祠堂落成，曾国藩率全体军官，向死者亡灵行祭；曾国藩为死者亲题挽联：“巨石咽江声，长鸣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左右燃起纸香，曾国藩诵读祭文，先是呜咽，再是泣涕，最后竟放声大哭。他充满感情地哭诉：“自军兴以来，从未有此次丧师之惨者！”湘军水陆全体将官皆为之感泣落泪。

十七 九江鏖战

田家镇失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杨秀清急令在皖南作战的翼王石达开、在江西饶州的冬官正丞相罗大纲星夜轻骑赴援。

石达开是威震敌胆的太平军名将，文武兼备。他闻田家镇失利，立即率5000劲旅，日夜兼程，赶赴增援，成为太平军西征军的主帅。

罗大纲也是太平天国著名骁将，手工工人出身，10年前就是广西天地会首领之一，长期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太平天国起义时，率天地会加入起义队伍，从广西到南京的征战中，一直是先锋营指挥官，率军首先攻入永安州、全州、岳州等城镇，功劳卓著。定都之后，与吴如孝一军联合攻占镇江。太平天国西征，命为主将之一，率军转战皖南、江西一带。他的部队敢打敢拼、军纪严明，在太平军中威信极高。这次赴援，率领万余精锐赶往前线。

当他们在九江会师时，黄梅已失守，大批太平军正在溃败后撤。湘军仍在溃军之后穷追。罗大纲首先率军拦住溃军，在孔垅驿一带与追兵激战，阻住了湘军的攻势。而后退军九江、湖口两城。

湘军陆师随后追杀，于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855年1月3日）攻占小池口，十一月二十一日（1月9日）渡长江，二十五日（13日）扎营九江大东门外的四里坡。湘军水师也顺流攻到九江之侧的江面上，与陆师合围九江城。湖广清军由副将王国才率领4000人马驻扎黄梅，按察使胡林翼率军2000人由咸宁东出瑞州，进攻九江之背。诸军合在一起约26000余人，统归曾国藩指挥。

守卫九江的将领也是太平天国著名骁将林启荣，他30余岁，是金田起义的老兄弟，在东王杨秀清的直属部队先锋营。作战英勇顽强，勇冠三军。西征开始，他也是杨秀清亲点的主将之一。

石达开一进九江城，即招集罗大纲、林启荣等诸将研究如何对付湘军的攻击。林启荣占领九江已两年，他对九江的防卫很有信心，提出太平军合军5万，对付远道而来的湘军2万多人，可采取以守为攻，以逸待劳的办法。待湘军兵疲师老，可合军歼之，不可立即决战。石达开同意林启荣以守为攻的战略，但他强调要守中有攻，不断利用机会，打击来犯的骄兵骄将。石达开命令：林启荣以守九江城为主，罗大纲守卫湖口西岸的梅花洲，自己守湖口城，三军互为犄角，配合作战。

正如石达开等人估计的那样，湘军连战连胜，尤其是武昌、田家镇之战后，太平军节节败退，势如溃堤，更平增了湘军的轻敌思想。湘军水陆攻至九江城下，曾国藩在座船上召开会议，研究进攻方案。他对九江的地形及林启荣、石达开的军势能力是有一定了解的。会上他提出，九江北枕大江，南控鄱阳湖，周围山水纵横，形势险要，各要地皆有“长毛”水陆把守。林启荣在此经营两年，决非泛泛之城可比。现在又有翼王石达开坐阵，此人据说文武兼备，是“粤匪”中的顶尖人物，非寻常草寇可比。但是，塔、罗、彭、杨等人皆认为绿营军与“长毛”作战，不是失败于敌人多么厉害，而是败在自己的腐败无能。自与湘军作战以来，未见“长毛”有多么厉害。所以，都磨拳擦掌，打算一鼓作气，攻下九江。于是决定塔齐布、罗泽南、鲍超、李续宾、彭玉麟、杨载福、李孟群等各领水陆大队，分兵攻打九江的四门，一举攻克。

然而，当四路人马向九江城前进时，却不见城上有太平军一兵一卒。当

湘军挨近城边，“则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太平军凭借林启荣两年来修建的堡垒和配置的火力，怀着满腔复仇的怒火，向湘军猛烈轰击，杀得湘军人仰马翻，卷旗逃命。塔、罗等将企图制止湘勇败退，但看到城上火力甚猛，白白伤亡人马，只得带着溃兵回至营地。

曾国藩、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与石达开、林启荣经过这次交战：方知石、林确非泛泛之将，知硬拼硬打不能奏效，乃另谋善策。他们决定先在九江上游的竹林店休整，之后由塔齐布率军继续攻城，牵制九江兵力，由罗泽南率军绕过九江，攻取湖口，彭玉麟与胡林翼合力进攻梅家洲。如此分兵攻击，使太平军穷于应付，若有一处得胜，则可打开一个突破口。

石达开与罗大纲等立于九江城头，见湘军退走，几天不再进攻，料定曾国藩必然另有所图，遂命各军密切注意。他估计湘军攻不下九江，将会转攻其他要地，便亲率小股部队，到上游各要处查看防卫情况。先乘夜至九江下游 50 里的湖口视察，接着又到了对面江心的梅家洲。

视察之后，便命令罗大纲率领 1 万人马开赴梅家洲，并立即在洲上筑垒架炮，封锁江面，准备迎击湘军的水师进攻。让林启荣加强九江城防，坚守城垒，不要出城作战，利用枪炮火器打击攻城的湘军。自己亲率 1 万陆师和数百战船，赶赴湖口。

太平军分兵防守布置完毕，湘军分兵攻击的计划也开始实施。他们没有料到，九江城里的石达开与罗大纲已经在湖口和梅家洲张网等着捕鱼了。罗泽南求胜心切，催兵赶至湖口，湖口县城一片寂静。湘军贸然冲向城厢，大军到了护城濠畔时，城头上万枪齐发，打得湘军像秋风扫落叶，一片片倒下，余者伏地还击，战斗不到半个时辰，便不支溃退下来。罗泽南心急如焚，催马督军再战，石达开命令大开城门，出动两支人马，迎击罗部。湘军自出师以来，第一次碰上太平军如此猛烈的进攻，一触即溃，退至江边。

进攻梅家洲的彭玉麟水师，也陷入了罗大纲布置的火力网中。洲头有战船架炮拦击，洲上是数百门大炮封锁，湘军水师一下子被打得队形散乱，船翻人亡。自率军以来，彭玉麟没打过败仗，这次梅家洲的失败却是极惨。他的水师前进不能，后退又遭洲尾巨炮的堵击，首尾难顾，进退两难。经过左冲右突，丢下大批船只武器，付出很大代价，才突出封锁，逃离战场。

攻击九江城的塔齐布一军自然更是无能为力了，只能丢下大量尸体，无功而退。

十八 兵败湖口

石达开打击了湘军的锐气之后，进而谋划破敌良策。他向众将分析：我们以险阻击湘军，已收成效，但要想破敌，就得出击，而打出城池与曾妖硬拼并无把握。湘军水师强大，我军战船数量不多，装备也远逊于彼。欲破湘军，必先败其水师；而破其水师，只能智取。

诸将向石达开询问智取之计。石达开说，曾妖头的水师船只有长龙、快蟹、舢板三种，长龙与快蟹都是大船，行动缓慢，不利于前锋战斗，而利于指挥。运兵、运械；舢板行动轻捷，利于战斗。二者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过去的几仗，皆仗大小船只的配合而取胜。今天我们用计让二者分开，使其分则两败，才是破敌良策。

诸将又问如何方能使之大小战船分开。石达开说，用计之事，我来布置。但自此之后，九江、湖口、梅家洲各军只许坚守，湘军来攻，一概置之不理，听我用计安排。

曾国藩几番进攻，皆遭挫败。休整了两日，不见敌军动静。于是，再令各路出击。诸军因有前番的教训，只是远远地开枪开炮，不敢再涉险境。即使如此，九江等城，亦不见太平军的任何反映，连冷枪也不打一发。各路军马折腾了两天，疲惫地返回营地。入夜正要休息，湘军水师的宿营江面，突然枪炮齐鸣，并有无数小船冲入江中，把火箭、火球射向湘军水师船上。湘军水师欲战无从战、欲睡无法睡。连续几夜，弄得湘军惊恐不安，将帅们心焦气躁。

石达开见时机成熟，便开始用计。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一串40余只的太平军船队突然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情况被湘军斥侯看在眼里，报告给曾国藩。曾国藩立即与诸将商量对策，按照常规，湘军水师远胜太平军水师多倍，他们不敢出动40余船在长江上行动，既然行动，必有原因，曾国藩本应小心对付。但逢湘军既骄又躁之时，也不做深入推想，反正明明是石达开的船队，出来了就得打。曾国藩也认为再无攻敌良策，不能失此机会，便命萧捷三等率舢板120余只攻击太平军船队。

萧捷三又气又急，想冲上敌船消除连日的躁气，命令湘勇快速追赶。太平军的船队都是轻便小船，见湘军大队来攻，也拼命前驶。双方你逃我赶，比赛速度，转眼划至湖口。眼看就要追上，萧捷三正准备命令前锋开炮，只见太平军船队向右一转，一齐向鄱阳湖驶去。萧捷三仗着自己的船多，不加思索，也指挥水师进了鄱阳湖。谁知湖口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500里湖水的进出口，口子极窄，如同一个大肚口袋的袋口。

双方船队进入鄱阳湖后，太平军立即封住湖口水卡，修上工事，安装大炮，将其死死地锁在湖内。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留在长江水面的全是长龙和快蟹大船，失去快船的护卫，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曾国藩等到傍晚不见萧捷三的消息，正在焦急，突然有大队太平军船只向湘军水师攻来。湘军的大船离开了舢板，犹如鹰隼失去了翅膀，在敌船的进攻中，只能笨拙地移动。太平军轻便的小船在湘军的大船夹缝中，穿梭般划来划去，投出串串火把、火球，不一时便烧毁湘军大号船9号、中号船30余只。曾国藩、彭玉麟仗着大船炮火猛烈，打得太平军快船无法靠近，才免

遭灭顶之灾。

太平军船队胜利撤走后，曾国藩急忙调回在武穴养病的杨载福，又调回罗泽南、胡林翼各部，集中力量，再攻九江。就在罗泽南回九江的当天夜里，即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日）夜间，太平军对湘军水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石达开命数十只小船满载各种火器进入江内，钻入湘军船队中间放火延烧。当夜月黑风高，咫尺难辨敌我，太平军小船夹在湘军大船之间，大船的炮火完全失去效用。大火燃起，湘军战船纷纷向上游逃跑，后面剩下曾国藩的大座船行动不便，太平军认得这是湘军统帅的座船，便高呼：“活捉曾妖头！”纷纷跳上指挥船，与曾国藩的亲兵展开了白刃格斗。太平军蜂拥而上，亲兵死伤越来越多。曾国藩眼看着船上的厮杀，自己无能为力，心胆俱裂，四肢痉挛，知道此次必死无疑。突然，他见到一名高大的太平军战士向他冲过来，便猛地推开舱门，跳入黑沉沉的大江之中。幸好一名贴身警卫发现了他，也飞身跳下，将他拖出水面，送到正要逃跑的一条小船上，划向江边。

大家七手八脚为曾国藩换衣服，搓手脚，使他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睁开眼睛，遥望江面滚滚的烟雾和响着的枪炮声，看到自己精心建起的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被击毁的船只歪歪斜斜散在江边，情景甚是凄凉。他深感大势已去，再难收拾，全身发冷，胜过沉在冰冷的江水里。眼前浮现湖南官绅对自己的冷酷嘲笑嘴脸，浮现出咸丰皇帝对自己的怒斥。

这时，罗泽南、刘蓉等将领都围着曾国藩，看着他呆呆痴痴的神情，不知他有何想法，也不知如何劝起。突然，曾国藩站了起来，大声说：“给我一匹马！”大家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曾国藩平日是不骑马的，自湘军水师建起后，他更不骑马了，总是坐在最大的指挥船上。他这时刚从江里捞出，身体虚弱，如何能骑马呢？“大人！抬您回营吧！”亲兵以为他的座船被俘获，要乘马回营了。

“牵马过来！”曾国藩又一次高声命令。

亲兵不敢违命，给曾国藩牵过一匹马。曾国藩让人把自己扶上了马。他跨上马背，突然一挺腰，双腿用力一夹，战马纵身奔驰而出。罗泽南、彭玉麟同时跳起，抓住马缰，怒马长啸一声，扬起前蹄，停了下来。

“曾大人，千万想开！”彭玉麟几乎是哀求了。

原来曾国藩是学春秋晋国大将先轸的样子，骑马跑进敌营，让太平军把他杀死。大家扶起从马上摔下来的曾国藩，苦苦地劝慰，方才使他打消再次自杀的念头。

湘军水师遭到致命打击，留在鄱阳湖内的快船无法出湖作战，陆师也屡受挫败，太平军取得了长江上游的重大胜利。湖口战后便乘胜反攻，水陆沿江而上，势如破竹，连下黄梅、广济、蕲州、黄州，咸丰五年正月初七日（1855年2月23日）重占汉阳城。清政府闻讯急令曾国藩回师武汉，曾接到严旨，只得派胡林翼、王国才两部及彭玉麟、李孟群水师援救武汉。然而太平军对武汉包围甚紧，湘军力量单薄，加之新败，因此未能救得武汉。二月十七日（4月3日）武昌终被太平军攻克，湖北巡抚陶恩培被打死，湖广总督杨霨逃走。至此，湘军苦战攻克的长江重镇全部为太平军重新夺取，曾国藩进退两难，被咸丰下旨痛骂了一顿，仍命他克日攻下九江，东下取南京。曾国藩只好照办。

十九 再度整军

湖口之战使湘军元气大伤，尤其是水师几溃不成军。要想继续与太平军作战，必须重整旗鼓。

水师是湘军的命脉，在长江流域作战，攻克南京，扑灭太平军，没有强大的水师根本是梦想。所以，曾国藩首先要重振水师。外江水师已被派往援救武汉，留在鄱阳湖内的 120 多只快船处境十分困难，曾国藩先要救活湖内水师。他专程跑到南昌，求助于江西巡抚陈启迈，请求为湖内水师增造长龙大船 30 号，就地招募水勇、供给饷械。然后又为重整江上水师努力奔走，他上奏咸丰，请他下旨地方，让湖南省为他添造战船，招募水勇。自己派员到湖北新堤、湖南岳州大力修造战船。到咸丰五年四月（1855 年 5 月），湖南的新船百余号首先造好，运至金口；九江江面上损坏的战船亦告修复。六月，杨载福在岳州也造成大批战船，开赴金口。其规模较原来的大船队伍还要整齐，力量也大得多。

这期间，江内水师也增加了战船、解决了供应和军饷。开赴湖口，攻击湖卡。七月，湖内水师统领萧捷三在湖口战死，曾国藩调彭玉麟从湖北赶往江西。彭玉麟此时正在湖南省亲，闻命启程，扮作商人穿越太平军控制的地区，步行数百里赶到江西南康府接任水师统领任。自此以后，湘军水师正式分为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分别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统带，成了湘军水师的定制。

太平军为适应湘军的水战，也在九江设立船厂，制造战船。至咸丰六年三月（1856 年 5 月），制造战船数百条。曾国藩深怕太平军水师强大，命令杨载福伺机歼灭之。太平军水师难抵湘军外江水师的力量，避而不战。杨选 300 死士冲入太平军水师营中，把他们的船只全部烧毁，长江水域又全部为湘军水师控制，曾国藩的努力终于没有徒劳。

曾国藩恢复陆师的努力就不像整顿水师那么容易了。

湘军的陆师主要是塔齐布、罗泽南、李元度几部。塔部力量最强，增达万余人，罗泽南部约是塔部的一半。李元度的力量最弱，只有 4 营 2000 余人马，李是曾国藩的幕僚，一身文人习气，治军不严，训练无方，战斗力很差。所以，湘军陆师劲旅，主要是塔齐布、罗泽南两部。

湖口战后，咸丰帝仍逼令曾国藩围攻九江，曾国藩便集中塔、罗两部日夜进攻。岂料林启荣对九江的守卫十分坚忍，无论曾国藩如何攻打，九江仍坚如磐石，巍然不动。湘军士卒损伤惨重，一无进展。当此困难之时，罗泽南向曾国藩提出了放弃九江、争夺武汉的战略计划。他认为长江沿岸数城，武汉为首，九江只是腰部，只有占据武汉，控制其首，才是夺取长江流域的正确方案。坚持围攻九江，即使攻取，武汉在太平军之手，敌人顺流而下，终难坚守。

曾国藩认为罗泽南的提议是十分正确的，去年湘军攻下武汉，咸丰帝令他离武汉而攻下游九江等城，他给咸丰的奏折中也是这个意见。可惜咸丰帝不听他的主意，造成武汉丢失，进攻九江无功的被动局面。然而，实际上，他的湘军只有塔、罗两军，两军合起来尚攻不下九江，若罗泽南再离他而去了武汉，湘军的力量就更孤单了，所以曾国藩没有放罗泽南去武汉。但是，曾国藩反复考虑，罗泽南的战略计划的确重要，罗泽南又反复申请、说明，终于使曾国藩同意他率兵去武汉的请求。正在这时，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

劳累、忧愤于七月十八日（8月30日）呕血而死。曾国藩太伤心了！这是一个知恩图报，忠心追随他的一个一心一意为湘军建设建功立业的大将，他是湘军大将中唯一的满员，正可以作为满汉联合，以消除朝野猜忌的典型代表。如今，竟牺牲在战场上，等于湘军损折了一个通梁大柱，等于曾国藩折断了一条大腿。曾国藩怎能不伤心胆裂！他几天寝食俱废，在塔齐布的灵前饮泣不止。他为塔齐布写一挽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章曾荐郭汾阳。”本来曾国藩建设湘军，自比郭子仪，匡复清朝，现在他把塔齐布比作郭子仪了。他向咸丰奏明塔齐布的功勋，咸丰亲旨悼念，照将军例赐恤，予谥忠武。

塔齐布死后，曾国藩把他的军队拨出1500人交罗泽南率领去了武汉。其余部队遵照塔齐布的遗嘱，交由周凤山指挥。此后，周凤山的队部成了湘军主力，仍继续围攻九江城。

罗泽南则于咸丰五年九月（1855年10月）从江西南昌府义宁州出发，连下通城、崇阳、蒲圻、咸宁，十一月初攻抵武昌城下。罗泽南的援救武昌，使清政府在武昌的攻战形势发生了变化。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后，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巡抚，这个职位曾授于曾国藩而又被咸丰收回，这次又授给胡林翼，胡也是汉人，说明咸丰帝在危急之时不得不放权。

胡林翼见湘军主力罗泽南到来，自然如得救星。他主动与罗配合，从不以属下相待，军政事务皆与罗诚心相商。即使对罗的部将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也同样相敬如宾。罗军到达后，胡林翼把湖北绿营淘汰，以罗军为骨架，大量向湖南募军，按曾国藩湘军的军事制度进行编练，成为长江上游的一支极为强大的部队。

经过此番调整，湘军的实力更加雄厚了。水师力量的加强是明显的，陆师力量留在江西由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比原来减弱了一些，但罗泽南部开赴湖北，胡林翼以这支湘军为主体不断扩充，使这支部队的力量不亚于曾国藩亲自指挥的陆师。胡林翼原为曾国藩的部下，他的军队主力是曾国藩的部队，他与曾国藩关系密切，在“中兴名将”中地位与曾国藩相埒，被人称之为“曾胡”。他们的部队一在长江上游，一在长江中游，相互照应，互为犄角，成为太平军的两个死对头。在以后鄂、皖、赣、湘数省的作战中，曾、胡两军相应契合，是太平军的主要敌人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十 苦战江西

自罗泽南率军赴鄂、塔齐布战死之后，曾国藩久攻九江不下，是他成军作战以后最困难的日子。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这一段情景时说：“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曾国藩给咸丰帝上奏中有语：“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但是，由于他的坚忍奋斗，居然扭转了困局。

他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

石达开留韦俊在武昌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开展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局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新淦。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堵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由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100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便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3500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2000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战斗力却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

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被太平军枪击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任彭玉麟、杨载福、王鑫等人，尤其要起用左宗棠。并进一步介绍胡林翼的大度，一定要同他合为一军，方能定两湖大局。遗嘱自己死后，其部湘军由李继宾统带，等等。

曾国藩的求援信落到胡林翼手中，恰在此时，曾国华也带着曾麟书的请求让胡援助曾国藩。于是，胡林翼便分兵 5000 让曾国华统带，急驰江西。此时，骆秉章也派出刘长佑。萧启江 5000 人马由萍乡、万载入江西，增援曾国藩。曾国荃、王鑫又各率数千人马驰援。这样一来，江西的湘军和绿营军一下子增到数万人。这些军队在江西四处进攻，先后占领瑞州、袁州、临江、安福等地，湘军在江西的形势好转了。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顿不止是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尾大不掉。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落得个可悲下场。

正因为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 年 9 月），曾国藩丁忧服阕，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认为是额外负担，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 80 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端，终生念念不忘。

尤其令曾国藩气愤的是，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又与曾国藩同做翰林官。湘军在江西作战，为陈守土，他应该同舟共济。但是，他却处处作对，不仅不合作，不输饷，连用地方一人也不许。例如：当时江西万载举人彭寿颐，在地方自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曾国藩欲调此人入湘军，陈启迈不仅没接受曾国藩的请求，还借口彭寿颐曾不受地方官约束，至衙门闹事，把他捕拿，投入监狱。

曾国藩甚为恼怒，将陈启迈的行事为人写成奏折，狠狠地向咸丰告了一状。咸丰对江西巡抚本来就不满意，因为江西一省疆土，被太平军几乎占光。如今曾国藩告他，便准其所奏，罢了陈启迈的官。

陈启迈虽去官，继任的文俊对曾国藩的排挤更甚。不仅不给供饷，还使他的一支湘军全军覆没，害死了他的一员猛将毕金科。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培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带。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饷项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 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作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糈，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 4 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为撰写碑文，痛悼当年牺牲的这个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曾想要撒手不干了，他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

杨震是东汉著名学者，后来官拜太尉，但朝中权贵排挤他，无立足之处，心情苦闷，自杀于洛阳城西的夕阳亭。曾国藩以“夕阳亭事”自况。

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被逼自杀就是好几次了。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二十一 军饷问题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派郭嵩焘回籍筹借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 10 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10 万借款才由湖南藩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曾国藩是了解其中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祀。而有人反映，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时任职詹事府，熟知此事，曾为杨家而不耻。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规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沾很大的包。可是，为了军饷所逼，曾国藩竟同意为杨键写了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 5 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旁观，一下子捐了 10 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

咸丰四年八月（1854 年 10 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徐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是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不小的胜利，但湘军损失很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净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又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饷，咸丰下旨说让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 14 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 8 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好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就在这时，郭嵩焘提出江北大营在扬州仙女庙抽厘金助军饷的事，请求曾国藩也仿效办理，在军过之处向商贾抽厘，以助湘军作战。当时曾国藩不知抽厘的办法，郭嵩焘说：“江北大营也缺军饷，有左都御史雷以诚到扬州助军，想出了一个筹饷的办法：仿照汉朝算缗之法，对商贾征厘税，值百抽一，称作“厘金”，居然顺利抽得大量银两，解决了江北大营的军饷。

到底湘军办不办厘金？曾国藩令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刘蓉说，听说苏北办的厘金，到处设关，关卡林立；处处抽厘，各为百金抽一，连续勒抽，往往抽之过半，弄得商民怨声载道。湖南、湖北、江西连年征战，百姓已被敲骨吸髓，若再强抽厘金，就没有活路了。

但郭嵩焘认为苏北办理不善，是混进了坏人，我们可以作为借鉴，认真办理。

其他人意见不一致，但用恼急迫，对抽厘之事坚决反对的却不多。曾国藩见众人的意见趋于一致了，便让郭嵩焘去湖南与骆秉章商量，利用“东征局”的名誉，先在长江、湘潭、益阳、岳州、常德、衡州6处试行。若是可行，就认真实行，颗颗铜子都要有交待，莫对不起三湘父老；若不可行，立即停止。

湖南的厘金尚未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所料不及的大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师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得到，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战，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国藩想错了，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造其谣，他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财，湘乡、平江、新宁肥的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没有买的，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我们那得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谣言十分气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极赞扬湘军的抗敌义举和曾大人您的行为，他若出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之处，以大人之德，向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

曾国藩赞扬彭寿颐的行为，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10万两，彭寿颐竟也募来3万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曾国藩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彭是江西地方人，江西巡抚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动地方，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查到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陈启迈告状，双方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批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事情闹得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调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同年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查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已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败仗可以说打了胜仗，逃将可以说成功臣。只要不出大漏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

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 8 府 54 州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然而，如前文所述，去了陈启迈，来了文俊，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仍未解决。为了军饷，使他的一军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死了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讨饭”维持。多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被困垮而已。

二十二 委军家居

正在曾国藩极度困难和苦恼之时，突然接到其父曾麟书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1857年2月27日）死去的讣告。闻此噩耗，曾国藩反而感到是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立即向咸丰帝陈报丁忧，并要求开缺守制。他不等谕旨允准，便与弟弟曾国华自江西奔丧返乡。在陈情奏折中，除以孝道为由，坚决要求开缺外，还说此时返乡守制并不影响大局，因为自咸丰六年（1856年）秋，太平军内部发生内讧，使整个战局发生了逆转。在江西方面，湘军逐步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广大地区，武汉也被胡林翼和李续宾攻克，湖北绿林军和李续宾湘军联合东下，长江上游沿江城镇又被夺了回来，大军来到江西，与曾国藩湘军一部又包围了九江，江西的吉安、瑞州等要地虽还在太平军手中，但也被湘军包围了。所以，曾国藩说，此时返乡，把军队交待给部下，同自己未离去是一回事。

曾国藩到家多日才收到从江西转来的皇帝的批复：只准他3个月假，不允开缺。3个月假满之前，咸丰下旨命他立即返回江西军营。曾国藩再次上奏，要求给假3年，在这个奏折中，他向咸丰表白了不愿再回军营的理由。他说：自古带兵者从未有他的困难大，领兵打仗却没有军权，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湘军虽负担了两湖、江西的抗敌重任，但却没被国家和地方承认，领兵人员都没得到武官的实缺，自己要为湘军将领申请个奖赏，必得地方官同意，由地方官上奏。还说：湘军无军饷，行军作战，奖功恤死，都得向地方官讨钱，而地方掌握了政权与财权，视湘军为累赘，打击、排挤、陷害者有之，就是无人给军饷。又说：自己担起了出省作战的命令，并无出省作战的资格，地方官也没接到皇帝给的接待湘军的旨意，军中连个正式印信都没有，湘军在别的省客位虚悬，处处受刁难。他明确表示：在江西带兵，不给个巡抚实职或钦差头衔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就让江西巡抚和提督、将军去带兵作战好了，他不会再回去了，就让他留在家里尽孝道好了。

咸丰看了曾国藩的奏折，见他直接伸手向皇帝要实权，考虑再三，最后认为太平军的势力一天天衰落下去，不一定非要曾国藩才能打赢太平军；让曾国藩又有军权，又有督抚大权也太危险。遂顺水推舟，批准让他在籍守制3年的请求。这样，曾国藩便离开了湘军，开始了乡居的生活。

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八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先后家居一年半时间。

这一年半时间，名曰“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曾国藩经乡居之后，为人处世简直判若两人。

首先，如前文所述，他是遭受了极大的折辱，很不情愿地乡居的。所以，回到家里心情十分苦闷，怨天尤人。他不明白，自己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忠心，“打掉牙活血吞”，在战场上拼命，但是结果处处碰壁，连皇帝都不买他的帐，甚至根本就不信任他，“卸磨杀驴吃”，现在磨还没推完，就要杀驴。多少人看他的笑话！他越想越气，“心殊忧郁”。忧郁无处发泄，整日生闷气，动辄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咬

喝。曾国荃等人开始还劝他，后来劝不了只好不理他，再过些日子就返回了战场。弟弟们走了，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什么话都骂得出来，语言粗俗，根本不像个道学家了，弟媳们也都躲着他。头一年夏天，儿媳（曾纪泽之妻）难产死掉了，两个月后，曾国荃的妻子熊氏又临产，怕被儿媳的魂缠住也难产，于是闹着请神汉进府做道场。曾国藩知道了大骂一顿，骂她们装神弄鬼，骂得道场做不了。

曾国藩不被皇帝信任，吃了极大一颗软钉子回到家里。但不少朋友认为他是言不由衷，是背叛前誓，前线正吃紧，跑回家呆着，是要挟皇帝。于是，有的批评，有的规劝，还有的干脆大骂他。骂得最凶的是左宗棠，骂他是假仁假义假道学，在湖南抚衙里拍着桌子骂，骂他临阵脱逃，自私无能；骂他不该伸手要官，要不来就躲回家。左宗棠一骂，长沙的大小官都附和着骂。骂得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饭难下咽，夜不成寐，从此“得不寐之疾”。当时他深恨左宗棠，认为别人可以骂他，左宗棠不该骂，他们是同门同道，相互也看得起，尤其在与太平军对抗，捍卫儒家道统方面，他应该是知己的。如今我曾国藩被上下整到这步田地，你左宗棠不同情，反而带头怒骂，太不懂事了！所以，他又开始在家里咒骂左宗棠。

盛夏袭击了湘中，火热的南风像从巨大的火炉中喷射而出，午夜之后，仍有令人心焦的蝉鸣，蝓蝓也无休无止地叫着，好像有意给彻夜不眠的曾国藩过不去。他时而躺在床上，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辗转反侧，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入世救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据说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曾想要走入空门。然而，深厚的儒家根基使他终于拔不出尘世间的双腿。但因为他要遁入佛门，使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把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下处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过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

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 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作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指咸丰七年、八年（1857年、1858年）。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曾文正公书札》，第10卷，第17页。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三 再度出山

曾国藩家居的一年多时间里，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5月底）分裂革命队伍，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方面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如果战争马上结束，自己也就太吃亏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绝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石达开率20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遂于五月二十一日（7月1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命令。

曾国藩六月三日（7月13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7月17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他首先奔赴长沙，去见骆秉章与左宗棠，商量出师计划。左宗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的，去年左骂得他最厉害，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怒。但认真想想，左宗棠骂得也不错，自己的确不该在那时负气离开湘军，向皇帝伸手要官的行为既不符自己的初衷，也徒取其辱，所以，自己一定要以老子的“大柔非柔”，以屈求伸的态度处理好左宗棠及诸文武官员的关系。此时，47岁的左宗棠还是以举人的身分在骆秉章的幕府中襄理军务，虽然如此，他的名声却很高。早在3年前，左宗棠在家自办团练之时，其名声已誉

满江湘，御史宗稷辰向朝廷推荐人才，他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咸丰打听了左宗棠的情况，便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咸丰帝接见郭嵩焘，君臣又议论了左宗棠，当皇帝知道左宗棠常以未中进士感到自憾时，便宽慰他：“不必非要以文章功名建功，而要在国家用人之际立业。”

曾国藩到了长沙，在骆秉章的预先传话之后，去见了左宗棠。曾国藩以无比真挚的态度与左宗棠交谈，毫无掩饰之情，使左宗棠很是感动，也不免纳闷：自己骂得他那么厉害，对方却屈驾造访，一下子消解了左宗棠心里的疑块，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于是又和好如初了。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从用兵谈到做人，从做人谈到学问。左宗棠那气冲斗牛的气派，以天下苍生为已任的凛然正气，也不时感染着曾国藩。但，此时的曾国藩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曾国藩了，那种儒道溶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连左宗棠也感到曾国藩的再次出山，已非昔日可比了。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都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 4000 余人、萧启江部 4000 余人、吴国佐部 1500 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 50 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止。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的南甯，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言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带，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 1000 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 年 9 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一路风顺，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因此，他计划一年之内全歼太平军。不料，迅猛发展的军事形势，再次打破了

他的美梦。

二十四 三河丧师

在曾国藩再度出山，奔赴湖南、湖北、江西，协调湘军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从新调整湘军阵容，计划攻皖援浙的战略行动之时，太平天国也在调整天京变乱、石达开出走之后的政治与军事关系。

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对他作了大量争取的工作。洪秀全认识到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决心振发一番，以扭转危局。他罢免了不得人心的两个兄长（仁发、仁达）的职务，任命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为前、后、左、右军主将，并启用林绍璋、蒙得恩一起管理朝政。尤其是对陈玉成几位年轻主将的任用，大大加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量。林绍璋、蒙得恩等人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当然远远赶不上杨秀清等前期领导人，但他们的被任用，一度稳定了天京变乱以来的上层领导的混乱局面，对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创造了一个好的起点。

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在洪秀全同意下，李秀成、陈玉成等高级将领在安徽枞阳召集各路将领的军事会议，研究共解天京之国的对策。

会后，陈玉成、李秀成各部联合作战，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胜保的军队，歼敌5000；八月，又进军浦口，歼敌万余，再破江北大营。九月，太平军横扫苏北的清军，连克扬州、六合，太平天国在江浦一带建立了天浦省，成为天京的畿辅重地。

前文已述，湘军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其军事重心放在安徽省。当李秀成、陈玉成在苏北出击之时，李续宾等部湘军挺进皖南，连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进逼安徽临时省会庐州的咽喉三河镇。

三河镇城池坚固，是太平军的存粮之处，因而有重兵守卫。李续宾挥师屡攻不下，屯兵坚城之下，寸步难行。陈玉成闻湘军重兵进攻三河镇，意在再破庐州，急忙自六合、江浦率兵回援，并奏请天王令李秀成随后赶到，共救安徽。陈玉成率兵赶到庐州城南的白石山、金牛镇一带，分兵一支先切断李续宾部的后路，并阻击舒城湘军的增援，而后会合随后赶到的李秀成部，对围攻三河镇的湘军进行了反包围。

在屡攻三河不下，探与报告陈玉成、李秀成联军攻陷江北大营，回援庐州时，李续宾也感到自己连年苦战未得休整，这次又悬军突进，犯了兵家大忌，若遇大敌，将会陷入困境。于是，赶紧派人请求湖北发兵增援。然而，这时胡林翼也回籍治丧，不在武昌；湖广总督官文接到求救文书，一不发兵援助；二不令其退兵，使李续宾陷入被歼的死路中。

被太平军包围在三河城外的湘军仅有李续宾、曾国华等部17000余人，李续宾部尚屯兵黄岗、唐训方部还在英山。若在李续宾求援时尚可赶至，但当李秀成、陈玉成大兵赶到三河镇后，湘军其他部队想来援救也来不及了。李续宾、曾国华等人既攻不下三河镇，又无意冲出太平军的包围圈，只是默默地等待着一场厮杀，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咸丰八年十月初十日（11月15日）清晨，深秋的大雾笼罩着三河镇，对面不辨人影。陈玉成、李秀成开始向湘军发动攻击。陈玉成挥军自金牛镇大道向湘军大营正面发动进攻，李秀成则督军由白石山侧翼包抄湘军，三河镇守将吴定规也由城内带兵杀出，庐州太平军守将吴如孝也会合捻军由北路杀奔三河镇。四路人马一齐杀向湘军，浓雾之中，枪炮、喊杀之声振荡四野，吓得湘军心惊胆裂。

李续宾听着四面惊涛般的喊杀之声，知道难逃全军覆灭之下场，起初还指挥亲兵督部冲杀了一阵，然而大营四周黑雾茫茫，冲出去的湘勇，如秋风扫荡的落叶纷纷倒地，他只得龟缩在营垒内听天由命。被团团包围的湘军凭借营垒顽强抵抗着，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枪声逐渐稀疏了，秋风萧萧，硝烟滚滚。大获全胜的太平军在打扫战场，在寻找李续宾等湘军大将的尸身。最终，在一株歪脖子树杈下，发现了李续宾冰冷的尸体。7000 湘军，除极少落荒逃散者之外，全部被歼。

李续宾、曾国华全军覆没，对曾国藩、胡林翼是个沉重打击。李续宾是湘军当时的第一员大将，多年追随曾国藩，是曾氏的心腹，曾国华是曾国藩的胞弟，被歼的 7000 湘军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的骨干和班底，其中被皇帝加封的文武官员就有 400 余人之多。丁忧在籍的胡林翼闻此消息“大恸仆地，呕血不得起”，醒后哭着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调伤殆尽。”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大营闻讯，也惊得几乎昏死过去。他认为三河镇的兵败，同当年湖口、九江的兵败差不多，而李续宾、曾国华的被难，众多文武官员和 7000 精锐的被歼，较之湖口兵败损失还要大。

建昌大营闻讯后上下一片哀泣之声，各营各哨处处焚纸烧香，招魂祭鬼，因为三河阵亡者与湘军老营的关系太密切了。致于湘乡一带闻讯后就几乎“处处招魂”了。

三河战役改变了湘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攻守形势。陈玉成歼灭三河镇李续宾对安徽的进攻部队后，乘胜分兵挺进，绕舒城，由孔城进攻桐城，十月十九日（11 月 24 日）击败桐城湘军总兵赵克彰，夺占该城。再率师南下，迫使清江宁将军都兴阿撤安庆之围，败退宿松。李秀成也率部进攻庐江、界河、潜山、太湖，连战皆捷。

曾国藩、胡林翼见安徽局势危急，决定回援安徽。胡林翼草草结束丧守，立即赶赴武昌，集中部队，待机行动。曾国藩已动身回皖，打算去南昌坐船，经湖口进入皖南。刚要行动时，江西巡抚突然告急，说太平军杨辅清部由福建转攻江西景德镇，江西无兵可援，求救于曾国藩。

解救景德镇是燃眉之急，曾国藩只得派张运兰急赴景德镇，命萧启江监视石达开。他原打算击败杨辅清后立即北援安徽，岂料景德镇久攻不下，曾国藩也只得暂时放弃援皖，继续留驻江西建昌府。咸丰九年（1859 年）初，曾国藩命朱品隆回湖南招兵，以助张运兰攻城；四月，曾国荃也到达江西，助攻景德镇。六月，杨辅清因被围日久，军粮断绝，乃弃城走皖南，湘军遂占景德镇。至此，曾国藩也结束了江西的军务，开始安徽方面的作战了。

二十五 李二献策

原来曾国藩离江西有一个直接原因：石达开于咸丰九年初自福建入湖南围攻宝庆府，因久攻不下，决定率兵入川。骆秉章、胡林翼得知此军情，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入奏，令湘军入川防守。胡林翼的意思是让曾国藩入川，可以得到四川总督的位子，曾国藩亦知此意。再者，四川井盐的税收很丰富，靠川盐厘金为饷，湘军的供应也就更充裕了。所以，曾国藩离江西是要去四川的。

恰在此时，李鸿章来到了建昌军营。

李鸿章早年是曾国藩的学生。当时李鸿章应顺天府恩科乡试去北京，曾国藩为翰林院侍读，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当年李鸿章取中举人，继续留京准备参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恩科会试，便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学习诗文，准备应试。这一年，曾国藩正好出任本科会试考官，李鸿章虽然没被选中，但他的卷子由曾国藩阅过，大为赞赏，“知其才可大用。”。认为他早晚必成大器，此后，李鸿章每日跟曾国藩受业，学习理义经世之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再次应试，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入馆学习。从道光二十四年直至咸丰二年曾国藩离京，这八九年时间，李鸿章皆以弟子身分向曾国藩问业，关系极为密切。曾国藩一生门生很多，而真正收在门下的，却仅李鸿章一人。曾国藩离京的第二年（1853年），李鸿章也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合肥原籍举办团练，对抗捻军。同年年末，吕贤基被捻军打死，李鸿章投入安徽巡抚福济幕，多次参与镇压捻军和太平军的战斗，因功先后晋为按察使、记各道员等官衔（皆为虚职）。但是，他自咸丰三年（1853年）回籍办团练，并非如曾国藩那样独树一帜，皆依靠他人征战；又因安徽省的太平军、捻军力量雄厚，李鸿章参与的战斗，多数是失败的。当他的第二个靠山福济因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而于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被免职以后，李鸿章的父亲死于合肥军次，其家也被太平军全部焚毁，他在安徽几无立足之地，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言：“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膺（通乘）此身”，“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在他走投无路之时，他的哥哥李瀚章把他引荐给分别数年的老师曾国藩。李瀚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朝考出曾氏门下。曾国藩回籍办湘军。李瀚章为湖南善化知县，被招为湘军办粮饷，他把曾国藩当作十足的靠山，将老母亲也接进曾国藩的驻军大营中。李鸿章在安徽没有了栖身之所，哥哥要他来投奔曾国藩，他便以探望老母的名誉来到了江西建昌府，同时拜访、投奔了曾国藩。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到来从心里是乐意接受的，他了解这位多年拜师门下的弟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伟器”，但对他这么多年在安徽依靠别人与起义军作战而不来投奔自己，心里又不免有些气恼。据说，李鸿章来到建昌，住在馆舍里曾国藩十余日后才同他见面。见面后，曾国藩还当面奚落他，说他在安徽能做高官，何必来江西找事做。李鸿章向老师诉说了苦衷，说自己东奔西走许多年，冷眼观察许久，东南半壁河山，真正的兴邦洛世、中流砥柱“实只恩师一人”。又说，父亲临终前遗

年家子：李鸿章父李文安是曾国藩 1838 年的同年进士，李鸿章则为曾氏的年家子。

《曾文正公书札》，第 3 卷，第 35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第 6 卷，第 4 页。

言，让他务必投奔恩师，以便为国出力，光宗耀祖。李鸿章真挚而动情的言辞，自然很快又恢复了师生之间的情谊，曾国藩留他在大营中做掌书记。

李鸿章的书记文案工作做得很出色，军中写材料、书牍、信件、上通下达的文告他都搞得心手相应。曾国藩对他的工作极为满意，赞扬说：“少荃（李鸿章字）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但是，李鸿章的生活习气、作风却为曾国藩大不容。曾国藩率带的湘军，军事生活严酷，天未亮就要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洗漱、早餐都须在天明前搞好。有仗打时打仗，无仗则进行操练。曾国藩以身作则，幕府文案也不例外，早晨和士兵一道吃饭，饭桌上说古论今，谈笑风声，湘军战士都喜欢与曾国藩一起吃饭，只有这时才可以看到这位严肃认真的统帅随和、自然的笑脸。

可是李鸿章随军多年，却未改文人的随随便便、睡懒觉等习气。平日里只要不在战场上，总是日上梢头才懒洋洋地起床，而团练们却早已操练、早饭了。李鸿章来至湘军营中，照样沿袭着他的老习惯，曾国藩观察了数日，决心治好他的老毛病。

于是，当伙头军做好饭后，曾国藩命令亲兵敲开了他的房门。李鸿章老大不高兴，埋怨亲兵多事，仍赖在床上不起。亲兵却说：“曾大人等你吃饭！”李鸿章却回答：“让大人先吃。”亲兵又说：“曾大人说，你不到，湘军全体不许吃饭！”李鸿章听到此言才知道问题的严重，赶紧披衣，踉踉跄跄奔进饭堂。曾国藩见他这付模样，面色冷峻，一言不发。吃罢饭曾国藩说：“你投奔了我，就得遵守我的规矩，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弄得李鸿章呆坐在板凳上，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经过此番不快，李鸿章认真揣摩恩师所带的湘军，军纪肃整，与自己过去带的团练却有云泥之别，才晓得统帅的模范作用之大，从此也发愤改去文人积习，养成勤奋、规则的好习惯。李鸿章后来回忆，恩师所待既深情又严厉，从道德规范，到生活习气对自己要求都严，受益极深，终生不忘。

不久，便发生了胡林翼奏请皇帝令湘军入川之事。李鸿章为此事向曾国藩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是投奔曾国藩后第一个关系战略和前途的创设性策略。

他坚定地说：“四川决不可去！”

曾国藩见他说话如此坚决，因此，问其理由。李鸿章说，目今“长毛”的势力唯有苏南、皖中两地，而皖中之地更是他们的后方所在，李秀成、陈玉成所以拼命争夺皖中，恩师应该是早已洞见了。现在，由于湘军的奋战，已经把“长毛”逼到了这两块地方，将来的战斗方向一定要咬住这两地莫放。而恩师却要应命入川，四川为偏远之区，石达开不过是一支流寇，早晚必败，歼灭“长毛”，克复江宁，非恩师和湘军莫属。请恩师细想，若把歼敌的主力调往四川去与流寇周旋，放弃了江宁、皖中的“长毛”而不问，孰重孰轻，以恩师之才略，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李鸿章的一番分析，使曾国藩心里赞赏不已。心说：“李二比他的哥哥瀚章可强多了！果然是个大将之才呀！”于是曾国藩反问：现在皇帝已令入川，如何可以违命？李鸿章不加思索地继续说，只要向皇上讲明了其中利害，入皖比入川要重要十倍。而石达开流寇只须四川的兵力便可轻而易举的制

薛福成：《庸庵笔记》，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第1卷，第9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4卷，第109页。

服，甚至不战也可以等待这股流寇的军心混乱、自消自灭的。

李鸿章又说：恩师可致书官文、胡林翼，令其一同上疏皇帝，恩师若率军入川，两湖、安徽也便失去了可恃之师，你想官帅、胡帅会舍恩师而不保两湖吗？李鸿章还建议：可率师做出入川的姿态，这是应命之举，估计走到中途，皇帝令湘军入皖的谕旨就会到达。

曾国藩按李鸿章的建议，给官文、胡林翼修书，让他们代奏。同时尽起湘军水陆人马，踏上入川的征途。

果不出李鸿章所料：官、胡迅速而果决地给咸丰上疏，恳请留湘军在湖北，待机入皖。当湘军行至武昌附近的阳逻镇时，便接到了咸丰令曾国藩暂缓入川，驻扎湖北，与官文、胡林翼熟商进剿皖省之计而上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献策和料事深感佩服，认为这位弟子之才的确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了。事实上，曾国藩的留鄂而未入川，成为他一生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改变了在江西、湖南的不利局面，他留在湖北，受到胡林翼的器重和帮助，处处得手，事事顺利。他一生多次回忆、记述李鸿章的那次献策的功劳，回忆咸丰九年留在湖北决策的至当，说以前处处滞碍，而自咸丰九年与湖北合军后，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

。

二十六 进兵安徽

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进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的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确实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

三路军的作战任务是：第一路为主力军，攻占安庆；第二路切断庐州与安庆的联系，阻止太平军援安庆；第三路阻止太平军西进，攻取湘军的后方，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59年11月18日），曾国藩从巴河出发，率第一路军万余人马经黄梅进驻宿松，派李榕、朱品隆率兵进攻太湖的太平军。此时，第二路军多隆阿、鲍超、唐训方、蒋凝各部2万余人马已进驻太湖城外。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大军增援太湖。扎营70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不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二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胡林翼知道太湖的这一仗是关系重大的战役，必须有正确的指挥，于是让多隆阿担任太湖战役的总指挥。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福州副都统。曾参加堵击太平军北伐军的战役，作战勇敢，强悍而又傲慢，对汉官、汉军尤为轻视。这次会攻安徽，曾国藩虽是统帅，但他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多隆阿担任进攻太湖诸军的总统，湘军诸将也不乐意配合。

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鲍超。鲍超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震。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10余岁时到四川峨

峨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来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于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时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了广西，与姓韦的女子结了婚。伤好之后，他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结果没有追上向荣，却遇上曾国藩招兵。当时，鲍超身无分文，携着妻子走头无路，几乎走上自杀的绝途中。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未识一字，却有一身莽力和武艺，乃留下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入塔齐布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多次战斗，功劳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3000，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农民起义军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他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6000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打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他的部队死伤过半，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战不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鲍超坚守20余日，直至胡林翼派金国琛、余际昌率领万余援军赶到，鲍超率军从堡垒中尽数杀出，里应外合，打败了陈玉成的数万军队。陈军的大批粮草、储备被夺被焚，败走天京。湘军趁势夺占太湖，近围安庆。

由于鲍超的苦战，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大部队。

这时，曾国荃、李续宜也率军由湖南赶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藩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壩，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和湖北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攻陷为止，一直处于敌人包围的困境中。

二十七 身膺江督

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曾国藩终被清政府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自创办湘军，对抗太平军，艰苦转战7年多，清政府一直不把地方政府的大权放给他。只是在迫不得已之时，才不得不向他放权，曾国藩终于成了坐镇东南的封疆大吏。清政府之所以授曾国藩官为两江总督，是由于太平军再度打破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同时，挥军东指，挺进苏杭。

江南大营是清政府建于天京城外的营垒。早在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建都南京时，钦差大臣向荣即在城外孝陵卫建立大营，围攻天京。咸丰六年（1856年）曾被太平军打破，向荣败死。咸丰八年（1858年），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攻抵天京城下，再建江南大营，于城东、西、南三面筑垒挖壕，长达百余里，包围天京，给太平天国以巨大威胁。同时，清政府依靠江南、江北大营（1859年被太平军攻破，南北大营皆由和春节制）对抗太平军，清廷有军可恃，才不给湘军统帅曾国藩重要官职。

天京外围咫尺之地便是清军的大营，太平军始终在进行着破营战争。江北大营被攻破之后，又决心攻破江南大营，粉碎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咸丰九年（1859年）春，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军师，总理朝政。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在各路将领共商破营之策时，洪仁玕献“围魏救赵”之策：发兵进攻杭州，攻敌必救，等到江南大营分兵救杭州时，再回军进攻江南大营，必可破敌而解天京之围。

洪秀全采纳了此计，于咸丰十年二月（1860年3月）派李秀成猛攻杭州城，打死浙江巡抚罗遵殿，江南大营果然分兵救杭州。敌人中计之后，李秀成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打破了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占苏南广大地区和苏、常各城。和春、张国梁、浙江巡抚徐有壬皆败死。

建立7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攻破，清政府在江南再也无力组织起威胁天京的军队。在惊恐之下，无计可施，只好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和湘军身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湘军集团人物都把江南大营的存在看作是湘军取得政治地位的障碍；也估计到江南大营的覆灭，是清政府放弃依靠绿营军，转而依靠湘军镇压起义的开端。因此，当江南大营溃败之后，曾国藩心里最清楚这个原由，但并不现于言表。而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却幸灾乐祸，喜形于色，额手称庆。左宗棠说：“这真是天意呀！江南大营的庸将弱兵如何能担起扫平贼氛的重任，今日被洗荡，正是后来者立功的大好机会。”胡林翼断定：“江南大营覆灭，朝廷必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之事可以措手了。”可见，江南大营被打破，表面上是太平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实际上却为湘军走上政治舞台扫清了障碍，其潜在的危机较表面的胜利大得多了。

当李秀成提兵进攻杭州时，清政府就急令曾国藩缓攻安徽，东下救苏、常。由于李秀成的进兵迅速，曾国藩未及东援，太平军已攻破江南大营，又连克苏州和常州等地。在清政府看来，苏、常等处的丢失，远比攻占安庆要重要，故而强令曾国藩东进。而曾国藩咬住安庆不动摇，清政府见曾国藩不应命，只得于五月间授以兵部尚书、署两江总督之职。清政府以为给了他封疆大权，就一定会率兵东进了。结果，曾氏仍未应命，在上奏咸丰的拜折中，强调攻占安庆的重要性。认为平定江南，必先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方能成

功。他说，向荣、和春等人所以失败，非败自军，而败在势。他们原想自下就近围攻金陵，结果战守错乱，屡进屡挫，既攻不下金陵，反丢了苏常之地。他重申以前的军事方略，坚持自上而下，先外而内，稳扎稳打，步步近逼，最终可以攻克金陵，歼灭太平军。若弃安徽东进，必重蹈向荣、和春之覆辙。

但为了略尽臣子和江督之责，曾国藩答应派出部分兵力东下，但战略重心仍放在安徽。清政府批准了他的战略计划，两个月后就实授他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职。

史书沿记，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是清廷内部斗争的结果。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政府的统治地位风雨飘摇，八旗、绿林皆腐朽不能用，旗人对大规模的起义力量早已失却了应付的力量。肃顺为首的满员对此尤为清醒，当时他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深得咸丰信任。他极力反对当朝廷袭过去不信任汉官的习俗，认为要拯救大清王朝，不用汉员已无可救药，乃向咸丰极力推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依靠他们镇压起义。

据说，当江南大营被攻破后，两江总督何桂清请临敌逃走，咸丰急得寝食俱废，与肃顺商量选人取代何桂清做江督。肃顺先提出选用汉员充任，咸丰提出让胡林翼担任，肃顺进言：“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挪动。”咸丰说，可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顶替胡林翼，将胡林翼调去两江。肃顺说：6年前曾经让曾国藩做湖北巡抚，几天后又撤消了任命；如今再次任命，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直接以曾国藩为江督，曾、胡二人感情甚洽，二人合作，东南的事一定可以做好。咸丰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曾国藩遂得到了他盼望多年的封疆之职。

肃顺的建议不仅见诸于史书、笔记，据传，肃顺还曾写信给胡林翼，做胡的工作，让他不要为未做江督而介意，与曾国藩团结合作，共图大业。胡林翼又将此信转给曾国藩看，曾氏自然对肃顺非常感激。但他认为肃顺不该在上谕未达时给胡林翼写信，这不仅违反朝廷定制，泄露了皇朝绝密，也是肃顺在拉山头。本来汉人做地方大员就犯清朝之忌，皇族中一定会有不少权臣反对，而肃顺敢于任用汉人自是明智之举，却拉拢汉官做依附，这实在非国家之福。所以，他明知肃顺在暗送秋波，但假装不见而未与他有私下的往还。

令曾国藩心里更加怨愤的是：6年前皇帝就曾授他湖北巡抚，以后这个职务换了几任，最终给了他的朋友，实则做过他部下的胡林翼。他率领湘军又冲杀了6年，成了东南的中流砥柱，在四顾无人之时，皇帝仍不愿放权给他，宁愿把两江总督授给胡林翼。皇帝太不信任、不放心他曾国藩了！对他未免过于寡恩了！然而，两江总督，这个地方大员中地位显著的职位毕竟授给他了，这意味着他今后要担当起镇压太平军的全部职责，是长江两岸、东南数省军队的最高统帅。想至此，他打起精神，思考着未来的作战方略。

参见《曾文正公奏稿》，第11卷，第44页。

参见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第10页。

二十八 “左都御史”

曾国藩受领两江总督之时，清政府同时赏给左宗棠一个四品卿衔，令他帮办曾国藩军务。从此，曾国藩又添了一个十分得力的助手，曾、胡之外，又崛起一个“中兴名臣”。

前文提到，左宗棠以举人身分一直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充任僚属，骆秉章才力平庸，每遇巡抚政务，莫不向左宗棠请问方略。久而久之，巡抚衙门诸官往往先向左宗棠问计，而将巡抚丢在一边。骆秉章信任左宗棠，称之为“左师爷”，而别人则称之为“左都御史”，意味左的才气、学问和实权大过了骆秉章。

左宗棠在湖南省署历时很久，虽无仕名，而实则做着巡抚的工作。湖南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出左宗棠计划之中，有人当时即评说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骆秉章明知湖南省出了“左都御史”，名声远超过自己，但心中并无忌意，始终依为靠背，每遇公事则说：“问季高（左宗棠字）先生，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左宗棠对曾国藩和湘军更有着特殊价值。左氏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深仇大恨，决心镇压之，尽管自己长期不仕，也心甘情愿地为镇压起义而效力。他见曾国藩编练湘军与太平军死战到底，便利用自己可以驾驭湖南一省的力量，努力为湘军提供饱项和兵源。当时两湖也是两军交兵的要冲，经济、财政都很困难，左宗棠瞄准为湘军供饱的目标，开源节流、整顿吏治、改革税收、裁汰冗吏、打击中饱、收加厘金，把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衣物，源源供给湘军，曾国藩知湘军能在前方支撑局面，与湖南左宗棠的努力有极大关系，故极力保奏左宗棠，希望他能出仕，直接帮助自己办湘军。

恰在此时，左宗棠却遇上一庄案子，差一点丢了脑袋，幸赖曾、胡、骆等人维护，方免于难。原来永城镇总兵樊燮，一日晋见骆秉章，左宗棠在坐。左宗棠素知此人为官贪墨，在整顿吏治时风闻他的贪污行为，只是国家正在用兵之际，没有查处他。现在见到了樊燮，以左宗棠的为人，自然面有不悦之色。而樊燮一武人，见左宗棠板着面孔对他不热情，于是也不向这位“左师爷”问候，只向骆秉章行礼。左宗棠本来有底火，见他竟不理采自己，于是质问道：

“樊将军进门不理采，出门也不告别，是何道理！”樊燮见左宗棠对他板着脸，心里也有气，认为一个无品无位的师爷，竟这般大的架子。现在，他竟质问自己为何不向他行礼。于是火气一撞也大声回答：

“朝廷体制，那一条有命官见师爷非要行礼的？”

左宗棠最恨别人笑他是幕僚而多年没混上个真衔实职。一听樊燮之言，气得火冒三丈，瞪着环眼冲向了樊燮，挥拳打了过去。此时骆秉章一声大喝，止住了左宗棠举在半空中的拳头，同时将樊燮让了出去。

樊燮受了左宗棠的喝斥，咽不下这口气，便到武昌官文那里告了左宗棠的状。以湖南布政使文格为首的一批官员，对左宗棠的一些改革做法不满，也趁机煽动。于是，官文罗列了左宗棠的罪状上奏给咸丰皇帝，说左宗棠把持湖南，无视朝廷命官，独断专行，无恶不作，是东南数省出了名的“劣幕”。

咸丰皇帝虽了解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毕竟所见不实，现在湖广总督具折告发他这么多罪行，认为如果不是实情，也不会惊动官文，更不会因为一个幕僚而告到朝廷这里来。于是便亲批此案，并让在武昌主持乡试的考官钱宝青查办，如果确有官文奏折上的实情，即把左宗棠就地正法。

谕旨颁到武昌，胡林翼赶忙通知曾国藩、骆秉章，设法拯救左宗棠。于是，他们一面写保折，一面请王闳运、郭嵩焘在京活动。这时，王闳运正在肃顺家里做家庭教师，郭嵩焘正在南书房供职。王闳运向肃顺求情，并说官文所言皆非事实，左宗棠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肃顺对左宗棠的情况很熟悉，也有意提拔他，但碍着官文的面子，皇帝已发了谕旨，不能直接过问。肃顺示意王闳运：让人向皇帝保奏左宗棠，他从中说情。

于是，保奏左宗棠的折子犹如深秋里的落叶，片片飞向京师，落入皇帝之手。奏折中最生动的一句话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帝接到两湖纷纷寄来的奏折，知道此事不那么简单；加上肃顺的从中说情，才没治左宗棠之罪。

左宗棠起初听到因樊燮之故而引发案子，心里很是气恼，提出辞去湖南巡抚幕僚。骆秉章百般劝说也没起作用。咸丰九年底（1860年1月），左氏辞去骆秉章幕，启程入京，参加当年的会试。骆秉章、胡林翼生怕他入京闹出乱子，派人送信给安襄郢荆道毛鸿宾，让他派员专候左宗棠，阻止他入京。左氏行至襄阳，见到了胡林翼的亲笔信，只好到英山大营去见胡林翼。同年四月，从英山赴宿松，会见曾国藩。曾、胡经过会商，让左宗棠回湖南募勇，独成一军，去景德镇一带作战。左宗棠走后，咸丰帝令左宗棠以四品卿衔襄办湘军军务的谕旨才下达。在曾、胡及两湖官员上奏援救左宗棠的众多奏折中，咸丰帝进一步了解到左宗棠对镇压农民起义的重要性，打算重用。左宗棠去湖南很快募勇6000，名曰“楚军”，转战赣、浙等地，未及一年即被授予浙江巡抚，成了与曾、胡齐名的封疆大吏。左宗棠被重用，樊燮则以“贪劣无能”而被革职。

二十九 二李见背

曾国藩授两江总督后，为照顾下游的战事，曾拟派兵援江、浙的计划，以符江督之职。于是，他于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1860年6月21日）上奏，自宿松提兵由皖南祁门下攻溧阳。实际上，他与李鸿章等人商议，选中祁门为驻营之地，认为祁门地连赣、浙、苏三省，可以同时照顾。

但是，李鸿章当即表示反对，提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让曾国藩驻营于此。

祁门是个县城，位于皖南的群山环抱之中，一条大路贯通该县，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的景德镇，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交界之处。曾国藩看到该地四周有大山环绕，地点是三省交会，远可贯通三省全局，近可以大山护蔽营盘。而李鸿章则看到的是该地四周环山，进退皆有不便。于是，两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议论许久不决。

曾国藩最终坚持己见，决心进驻祁门。他把自率的部队，留下曾国荃一支，继续围攻安庆，抽出鲍超的6000人、朱品隆、唐义训2000人、杨琪魁1000人及张运兰的4000人，共计1.3万人，随他渡江南下，进驻祁门。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1860年7月3日），从宿松动身，先坐船至东流，再陆行至祁门，六月初一日（7月18日）到达祁门。

一到祁门，曾国藩就后悔不该早早把驻军此处的决定上报皇帝。这里果如李鸿章所言，是一块“绝地”：四周山势陡峭，与外界可通者只有一条大道，人烟稀少，土地贫薄，东西方向的大道若被堵住，这里便成了死地。

李鸿章随曾国藩看了祁门的地形，再次进言：“祁门确属兵家忌地，万不可驻，不如及早改驻东流，傍江依山，攻守进退自如，万无一失。”曾国藩心里思忖，出发前议论多日而终究决定驻军于此，行军半个多月，刚到这里又要改向东流，他这位统帅如何能这么轻率？所以，只是沉吟不语。李鸿章以为老师下不了决心，又说：“若长毛闻讯提兵来攻，只须数千人马就可把出路堵死，我们将被束手就擒！”

曾国藩听了此言老羞成怒，厉声责问：“你们如此厌恶祁门，是不是害怕了？若胆怯，可各散去！”自此，李鸿章虽不再劝他移营东流，但心里却积了老大一个疙瘩。况且，李鸿章也的确害怕太平军前来进攻，使祁门陷入绝地，自己也难逃活命。因此，开始考虑自己去留的问题了。

不久，又发生了李元度的问题。

当曾、胡集中兵力进攻安徽，围攻安庆之时，太平军将领集会于天京，商讨如何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他们用“围魏救赵”之策，取得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胜利。之后，再一次运用这个策略，打算分兵两路合取武汉，攻湘军必救，从而解安庆之围。咸丰十年三月（1860年4月），天京军事会议决定这个战略计划由陈玉成、李秀成去完成：陈玉成由江北进军，李秀成由江南进军，于第二年三月在武汉聚齐，合攻武汉。这个计划是相当高明的，当时湘军、湖北军皆集中于安庆一带，湖北省自黄州以上无湘军一兵一卒，武汉仅有官文率少数绿营驻防，若攻下武汉，湘军在安庆的战略攻击将失去意义，必然不攻自解。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第9页。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第12页~13页。

曾国藩见太平军大举西进，也赶忙分兵防守长江两岸的城池。派湖南提督周天受守宁国、李元度守徽州、左宗棠守景德镇、吴坤修守九江、鲍超和张运兰守休宁。

诸守军中，曾国藩对李元度最不放心，其原因是，李元度对曾国藩虽忠心不二，但他的军事能力很差，用人唯亲，放纵部队，战斗力很低。徽州离祁门大营不远，若徽州失守，祁门也就危急了。因此，在派兵之日，他再三告诫，要李元度遇太平军攻城，只可困守，不可出城迎战。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太平天国西征军（史称第二次西征）南路杨辅清、李世贤、黄文金、刘官芳、古隆贤等著名大将率部进入皖南。八月六日（9月20日）攻克宁国，打死湖南提督周天受。八月二十五日（10月9日）进攻徽州城。李元度仰仗自己有6000军队，轻易开城与李世贤大军决战。其部不堪一击，他见形势危急，首先逃命而去。造成全军溃败，徽州失守。

李元度逃至浙、赣边境徘徊游荡，经久不归。及至返回祁门大营，也不自责自悔，竟擅自取走饷银，私自溜回湖南。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举动十分气愤，但对他的处置却犹豫不决。李元度自编练湖军之初就追随曾国藩，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岁月，都始终不渝，曾国藩说他是自己的“辛苦久从之将”，是“生死情谊交厚之将”，明知他的领兵才能很差，也始终信任他。虽然丢了徽州，造成祁门大营的万分危急。但对这位生死与共多年的朋友，终于不忍制裁。然而，李元度竟然不反省丢城之责，反而不辞而逃，曾国藩再不能容忍，便决定具疏劾之，以申军纪。

曾国藩的做法完全正确，但却遭到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李鸿章怒冲冲地率一幕人找到曾国藩声言：“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则说：“我自己属稿。”李鸿章大声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用手一指门外：“听君之便！”

曾国藩拟定奏稿，把李元度弹劾去职。李鸿章见于祁门大营的奇险万状，借着与曾国藩的翻脸，愤然辞去。

后来，胡林翼从中说合。曾国藩生气地说：“此君难与共患难！”

李鸿章背离曾国藩，离开祁门，在南昌等地逗留多时，后经胡林翼、沈葆楨、郭嵩焘等人反复规劝，曾、李二人又归和好，咸丰十一年六月（1861年7月），李鸿章再次投奔曾国藩。这时，曾国藩已按他先前的建议，从祁门移大营于东流了。

李元度回至湖南后，又通过关系投到了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门下。由王有龄保奏撤消了革职处分，升任浙江按察使。并募勇8000人，名曰“安越军”，追随王有龄。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背弃行为既痛心又气愤，发誓说：“自己与李元度‘公私并绝，无缘再合。’”后来，他再次弹劾李元度，加上其他人的参劾，终于使李元度革职、充军，受到了严惩。

在曾国藩极其困难之际，李元度叛逃，李鸿章溜掉。二李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和唯一的真正弟子，他们的行为对曾国藩内心的打击也是很大的。他百思不解，李元度与自己患难与共六七年，在自己屡遭困厄之时，连郭嵩焘、刘蓉那样的朋友都曾置自己于不顾，而李元度却始终忠诚地支持自己。李元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第12页。

汪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度对自己有过“三不忘”之谊，即在靖港之败时，李元度对他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这使他一生不忘；九江败后，李元度特立一军，专志保护湘军水师。护卫根本，这使他第二不能忘；当樟树镇败后，曾国藩大营中没有军队了，而李元度犹艰苦支撑着，直等到援军到来，救了曾国藩，这使他第三个不能忘。他经常想到李元度的情谊，庄子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李元度对自己的恩情是“无涯”的，是终生难忘的。他表示，自己的朋友很多，而唯李元度与彭玉麟二人最为知己，交情最厚。但是，这个交情最厚，使自己有“无涯之感”的朋友竟背他而去了，他如何不痛心疾首呢！

参见《曾文正公家书》，第6卷，第15页。

三十 拒绝“勤王”

正当李元度丢失徽州城，祁门大营陷入太平军兵锋之下时，忽然又接到皇帝谕令，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严饬曾国藩派兵驰援京畿。这对曾国藩来说，简直太不可想象了，真是雪上加霜呀！

自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时战时停，先后延续了4年。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8月）扩大战争，将战火燃至京、津。八月（9月），接连打败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逼至北京城下。咸丰帝惊慌失措，留下恭亲王奕诉在京应付局面，自己则率带嫔妃宫监和亲信大臣仓皇逃往热河。同时接受了胜保的建议，在逃跑途中发布谕令，让各地督抚派兵“勤王”。

第一道谕令就是发给曾国藩的，点名要湘军骁将鲍超率军入京，由胜保指挥。这个命令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送到曾国藩手中，正是徽州被太平军攻克第二天。宁国、徽州接连被太平军攻陷，强敌步步近逼祁门大营。祁门虽名之曰“大营”，实际上异常空虚，大部队都派出去守卫各要镇了，身边只有朱品隆的3000军队。徽州落入敌手，这3000军队都如惊弓之鸟，若敌军来攻，恐怕连一时一刻都抵挡不住。

在这自身难保的时刻，皇帝又下严令要自己发兵“勤王”，他既无兵可发，也无发兵增援北京的心思：曾国藩自己的处境怕比皇帝和京城危险十倍！但是，这毕竟是圣旨呀，他有胆量抗旨吗？

曾国藩又想，胜保也太损，湘军的大将不少，为什么就单单向皇帝推荐鲍超？而且事也凑巧，自太湖之战鲍超立了功，皇帝升了他的官，成了一省的最高武官提督，又放了他的假，直至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即徽州就攻陷的前3天才从四川老家回至祁门。曾国藩看到在这危急时刻，鲍超探亲不归，心里十分气恼，但鲍超毕竟又来到了自己身边，使自己多少又有了依靠，可鲍超到祁门才4天，皇帝就点名要他去北京“勤王”。

此时此地，曾国藩尤其不愿放鲍超和他的5000“霆军”去北京，“霆军”是他的救命之军。自三河战役后，湘军将领没有几个敢与陈玉成硬碰，而打败过陈玉成的只有鲍超和多隆阿。多隆阿设营挂车河，远在桐城与安庆之间，为的是阻击陈玉成自桐城援安庆。多军再也不能调动，况且多隆阿也不听曾国藩的调遣，这是一支不把湘军放在眼里的“皇家军队”。所以，眼下能守祁门大营的只有鲍超一军了。

曾国藩对谕旨点名要鲍超，要“霆军”归胜保指挥，认为是胜保借天子之名，包藏险恶的阴谋。他了解胜保其人，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叵测的家伙。胜保在直隶侥幸打败了太平军北伐军林凤祥的残军，竟得到了钦差大臣的头衔；后来又围李开芳于高唐，数月不克，遂惹怒了皇帝，削了他的职，发遣新疆。咸丰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胜保虽有野心，但手中却无军队。所以，到处抓军队，甚至不惜招降纳叛，收买皖北捻军叛徒李昭寿，结纳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企图把他们的军队拉为己有。曾国藩一到安徽便看穿了胜保的阴谋。如今，胜保又借皇帝的威力，想统带鲍超5000“霆军”，这是把他的野心使到湘军上面来了！

他心想：绝不能让胜保的野心得逞。然而，怎样才能拒绝“勤王”？当此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秋，湘军出师为的是保土保皇上，现在皇上蒙难，湘军不“勤王”，还要湘军何用？曾国藩左右为难。他向胡林翼、左宗

棠讨主意，胡、左的回答也和他一样，江南的形势危急，正赖湘军做中流砥柱，不可派兵北援；但若拒派勤王之师，如何能逃脱抗旨之罪，又如何能免于社会舆论的抨击？胡林翼的回信提醒曾国藩：“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曾国藩在曾、胡之处讨不来好主意，几日坐卧不安，辗转不宁。甚至于“泣涕旁皇，不知所为计”。

曾国藩实在无计可施，决定广泛征求幕僚的意见，就应不应当派兵北援，让幕僚们每人写一个条陈。曾国藩看完了一大堆条陈后，心里更加失望，众人的那么多条陈，等于一条也没有，谁也拿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正在这时，李鸿章推门进来，给曾国藩出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他的意思是说：进京“勤王”一事本是空话，对皇帝没有一点好处。现在外国人已经打到了京城，如果他們要捉拿或加害皇帝，就一定会追到热河，几天之内便可到达。现在上谕发到数千里之外的安徽，怕是等不到湘军出发去“勤王”，事情早已见分晓了。曾国藩听到李鸿章的一席话，感到新鲜、入门，这是僚属们从未言及的。于是让他继续说下去。

李鸿章接着说，洋人进攻京师，决没有占据京城和加害皇帝的意思，他们不过是借战争给皇帝施加压力，多占中国的便宜罢了。三国连衡，不过要的是金帛子女，断无他变。

李鸿章的分析，让曾国藩信服，心里透亮了。“但是，皇帝下旨要湘军北援，我们总不能不理吧？”曾国藩向李鸿章讨问处置之法。李鸿章说：皇帝留恭王在京与洋人讲和，恭王的办事能力极强，应付外人绰绰有余，不会出大乱子。所以，只能“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李鸿章的意思是，立即给皇帝回奏，说“勤王”事关重大，一个鲍超不足应命，是否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之中选一个带兵入京。这自然是表面应付皇帝的拖词，等到奏折再送到北京，结果早就见出分晓了，也就不会再让湘军“勤王”了。

曾国藩与胡林翼协商之后，就按李鸿章的主意于九月五日（10月8日）向皇帝送出奏折。当然，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保准皇帝不让他再行北援，也做了一番北援的准备。如：他准备一旦非要北援，就亲自率兵1万前往，饷项由胡林翼负责供给。如果皇帝下令让胡林翼带兵北援，大兵就退湖北，暂不进攻安徽。但是，无论是谁前往，安庆之围都不能撤。等了差不多一个月，直到九月二十四日（11月6日）忽然接到廷寄，说和议已成，毋庸北援。

曾国藩接到这份廷寄，压在他心头上的石头总算减轻了一些，他又可以专力对付太平军了。

《胡文忠公遗集》，第77卷，第24页。

李鸿章当时尚未离开。

《曾文正公书札》，第13卷；第17页。

三十一 安庆血战

咸丰十年十月（1860年12月），李秀成率领南路西征部队进入皖南。当大军攻破距祁门大营仅80里的羊栈岭而进攻黔县时，曾国藩惊恐万分，以为这次再难活命了。他木呆呆地坐在营盘大帐里，写好遗书，等着太平军攻来时再度自杀。手下幕僚们更是慌作一团，有的随曾国藩面壁，打算“死在一堆”；有的则忙乱地打起行装，准备逃命。

然而，李秀成的大队人马并无必得祁门的决心，因为李秀成并不知曾国藩就在祁门的空营之中。只在休宁的柏庄岭与鲍超打了一仗，“霆军”奋勇杀退了李秀成的几次进攻后，太平军便自动退走了。曾国藩再一次逃过劫难。当鲍超退回祁门拜见曾国藩时，幕僚们像见到了救命亲人，一齐迎出大营门外。鲍超见到大帅赶忙下马行礼，曾国藩冲上去抱住鲍超激动地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说着说着竟流下眼泪，不能自持了。

曾国藩生怕留在皖南的太平军再来进攻大营，即令鲍超驻守渔亭，张运兰驻在黔县，共同防守祁门。

果不出所料，10天以后太平军再次分兵三路向祁门方向进发。这三路军向黟县进攻的要害之路人数较少，说明太平军仍不知曾国藩大营安在祁门。而进攻景德镇的一路是太平军名将黄文金，人马超过2万，但是在景德镇初战之时，就被左宗棠的楚军打伤，只得退走。随后，李世贤又率部进攻景德镇，刘官芳率军进进祁门。两路兵马进攻凌厉，左宗棠离景德镇援婺源，景德镇遂被攻破，总兵陈大富被打死。刘官芳攻至距祁门20里的历口，朱品隆率兵防历口，刘官芳退走。而李世贤占景德镇后，亦乘胜攻向祁门，在乐平附近被左宗棠阻住交战。此时，困守祁门的曾国藩组织了张运兰、娄云庆等部8000余人，主动进攻为太平军占领的徽州城，不仅连日攻战无功，反被太平军自城内杀出，打得攻城湘军四散逃命，曾国藩只得退回祁门。

恰在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在乐平打败李世贤部。李世贤败走浙江，诸军也随之退去，祁门之围又一次缓解。但是，曾国藩驻兵祁门，每日都处于危机四伏之中，正如李鸿章所言，祁门为军事绝地，敌军进攻，交通、粮路、文报尽皆堵塞。当左宗棠在乐平打败太平军之后，曾国藩再也不敢呆在祁门，遂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1861年5月6日）自祁门出发，按李鸿章先前所指出的驻军佳地东流转移。到达东流后，将指挥部设于长江靠岸停泊的大船上，从此不再担心太平军的围攻，就近指挥围攻安庆城。

曾、胡进攻安徽、围攻安庆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一是占据太平军的腹地，以便进围南京；再是打算吃掉太平军的一支中坚部队陈玉成的军队。所以，他们集中了湘军和湖北军的主力围攻安庆。在安庆战役的具体兵力部署上，又以曾国荃的一支军队围城，而把多隆阿、鲍超、李续宜等军置于外围，目的是吸引陈玉成的大部队援救安庆，而以主要兵力在外围与之交战，聚而歼之。曾国荃在安庆三面深挖长壕两道，内围安庆、外打援军。临江、临湖一面用水师包围。

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采取前文提到的“围魏救赵”之策，发动“第二次西征”。西征开始，陈玉成进兵神速，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自安徽定远出发，一个月便改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打算攻破多隆阿的防区，救援安庆。然而多次突击，皆遭失败，只得退回庐州休整。第二年二月，组织5万大军正式西征。半个月便连克英山、蕲水、占据黄州，逼近武汉。胡林

翼见后方危急，赶忙调彭玉麟、李续宜水陆两军回救武汉。这时，武汉三镇如热釜之蚁，官员富户逃徙一空，连守城的少量部队也纷纷逃走，在太湖驻守的胡林翼急得口吐鲜血，病势垂危，连后事都准备好了。但是，英国侵略者借口汉口为（北京条约）规定的开放商埠，不准陈玉成在武汉用兵。陈玉成只得留下赖文光一军驻守黄州，本人则率大军离开黄州，攻向湖北北部，占领德安（今安陆县）、随州，等待李秀成的南路大军。后不见李秀成的到来，因安庆形势吃紧，乃于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下旬）回师救援安庆。

李秀成在“第二次西征”一开始便态度消极，他的眼光和基地在经营江浙，洪仁玕曾批评他“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但迫于洪秀全的命令，他还是向武昌进军了。咸丰十年十月（1860年11月），留下主力守苏、常，自己率领部分军队进入皖南。十一月（12月），军破羊栈岭，攻克黟县。湘军鲍超部急驰援救，李秀成与鲍超打了一仗，便退出战场，改道浙江转入江西。在江西连克数城后进入湖北，到咸丰十一年五月八日（1861年6月15日）攻占武昌县，当地人民纷纷参战，据说一下子就有30万人加入了太平军。同陈玉成一样，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干预，也放弃进攻武汉，返回了江浙。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便调动全部军队，围攻安庆。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由湖北回至皖南，由宿松、石牌（今怀宁）攻入集贤关，对围攻安庆的湘军展开攻势。曾国藩见陈玉成来攻，一面令曾国荃拼命顶住，坚守待援，一面飞檄江西，令驰援景德镇的鲍超回军援助，与陈玉成决战。

陈玉成攻入集贤关后，派吴定彩带所部千人进入安庆，协助叶芸来守卫安庆，他自己则命部队在菱湖南北两岸筑垒18座，并用小船往来湖中，向安庆城运送粮物。此时，由芜湖北渡的黄文金和由天京派来的洪仁玕、林绍璋等都率军攻达安庆外围，使安庆的形势暂时稳定下来。

曾国藩、胡林翼见太平军调兵遣将，也进一步采取措施。把鲍超、成大吉等军调来集贤关，准备歼灭陈玉成的军队；令多隆阿一面顶住天京和芜湖前来增援的军队，并伺机分兵协助鲍超与陈玉成大战。四月十日（5月19日），鲍超、成大吉及多隆阿的部分军队近抵集贤关，决定第二天会合曾国荃向陈玉成发动会攻。就在这一天，陈玉成留下刘玲琳守卫集贤关，自率部分军队退走桐城，与外围的洪仁玕等共商退敌之策。

岂料陈玉成在这战役的关键时刻，率兵离开集贤关，造成军事上的极大失误。曾国藩利用陈玉成离去之机，命令鲍超、成大吉包围集贤关，日夜猛攻，争取在陈玉成返回之前攻克。命令曾国荃包围菱湖的太平军，割断菱湖与集贤关刘玲琳部的联系。

刘玲琳手下只有4000人，在赤松岗修了四个堡垒。这4000人是陈玉成部队的精华，号称“百战精锐”，陈玉成南征北战，所历战斗无数，每战多胜，很大程度依靠了刘玲琳及其精锐部队。曾、胡及湘军们无不知刘玲琳的威名，曾国藩的韦信中，每称刘玲琳为“玲琳先生”、“玲翁”，而且毫不掩饰说“敬爱玲翁”，表示对刘玲琳的敬畏，并以湘军中缺少这样的将才感到遗憾。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消灭刘玲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国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212页。

《胡文忠公遗集》，第83卷，第9页。

琳的部队，并下令绝不能放过一人，尤其不能放过刘玲琳本人。

鲍超、曾国荃、成大吉等人也深知这一仗的至关重要性，备好精兵良器，决心快速拿下赤松岗。

五月一日（6月8日），鲍、成集中一万精兵猛烈冲向赤松岗，先是大炮轰击，再用集团兵力反复向堡垒冲锋、肉搏。刘玲琳的部队果然是太平军的精锐之精锐，开始一段，湘军一点也没占到便宜。刘玲琳指挥作战，点水不透，部队或伏或战、或火器或肉搏，在大敌围困之时，毫不慌乱，以一当十。但是，时间一久，战士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吃饭的机会，枪弹火药也一点点用尽了。而湘军大队人马犹不停轮番攻击，攻垒部队正好也是湘军中精锐之精锐鲍超的部队，这支部队也专打猛仗、血仗，尽是要命的精壮汉子，经年的血战，已经不知生死为何意了，更兼鲍超往往领着“霆军”以吃人肉、喝人血为快事。

一天之内，冲杀不断，血战不断，赤松岗的四个堡垒被攻下了三个，有3000太平军战士英勇牺牲，连俘虏、负伤的也惨遭杀害，一个未留。五月二日（6月9日）又打了一整天，刘玲琳所在堡垒仍未被攻破。但因枪弹用罄，刘玲琳于当夜率800战士突围而出，至马踏石为大水所阻，“霆军”追赶而至，片刻杀死600人。刘玲琳率余下的200战士乘船而走，又被湘军炮船拦截，又全部被杀死。

与此同时，曾国荃也全力攻击菱湖18垒的太平军，各垒也逐一被攻破，陈玉成在此留下的8000太平军也全部牺牲。

刘玲琳及其精锐被消灭，曾、胡等人兴奋不已，都认为赤松岗一战，胜过塔齐布攻下岳州，李续宾攻破九江，必将造成湘军与太平军力量对比和攻守形势的重大变化。

陈玉成兵走桐城后，闻知湘军包围攻击刘玲琳，方后悔不该率兵突出，立即反攻回救。结果为多隆阿的部队阻挡，既救不了刘玲琳，也回不了安庆城，造成了军事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成为安庆失守、太平军由相持进入被动挨打防守阶段的军事转折点。他与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杨辅清联合进攻挂车河多隆阿的阵地，企图突进湘军的包围圈，援救安庆，但仍未成功。只好率领各部军队5万余众西入湖北，再由蕪州折而下行，经宿松、石牌，绕了一个大圈进入集贤关，这时刘玲琳已牺牲70余天了。湘军已经用这70多天，打破了安庆城外的所有堡垒，紧紧包围了城池，安庆城粮草断尽，已到了不攻自破的危急关头。

陈玉成回至集贤关，筑起堡垒40余座，与安庆城头上的守军遥遥相应。他又用小船向城内运送粮食，但都被湘军水师拦截，一粒也没送到。

安庆城危在旦夕，陈玉成督军攻击曾国荃的围城部队。

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每位太平军战士都背上一大捆草，如蜂如蚁地拥向长壕，把草掷入壕中，填出路来蜂拥冲过。湘军在第二道壕中开枪、开炮轰击由第一道壕中冲过的太平军，前面的被打死，后面的又冲上来。自七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至8月30日），血战5日，仅在长壕内外就牺牲万余名太平军。湘军光火药就用去17万斤，枪子用去50万斤，可见战斗进行得何等激烈！

然而，太平军终于没能突进曾国荃的内壕，城内守军几番冲击也未

能突围，外围的太平军与湘军也连日苦战，虽互有杀伤，终未能解安庆之围。

八月一日（9月5日），曾国荃部湘军轰倒安庆北门城墙，大队冲入，吴定彩堵击湘军首先牺牲。城内太平军长期缺粮，断食数日，多已饥困不能举刀枪，少有抵抗举动者皆当即被杀，投降者万余人。曾国荃等商量如何处理这么多降将降兵，湘军将领多认为其中多是太平军起义中坚“悍贼”，留下来后患无穷，还是杀了最干净。但是，这么多人如何杀法？湘军将领朱洪章献计：让俘虏排起队来，10人一组分投几个营所，半天就杀完了。结果交由朱洪章办理，“自辰至酉万余贼尽行歼戮，乃往销差”。安庆一战，先后死难的太平军达三四万人，被杀的百姓也不少。湘军以为太平军在城破后以百姓之衣服之，凡可疑者尽杀之，太平军的眷属、子女男的被杀净、女的被掠走，金银衣物被抢掠一空。

曾国荃一下子杀了那么多俘虏，心里很不安，写信给曾国藩表示后悔，曾国藩复信教训他的“九弟”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又说，杀死那些造反的“贼人”，“虽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自安庆之战后，湘军便肆无忌惮地杀戮太平军，肆无忌惮地抢掠被攻下来的城镇。

陈玉成等军见安庆失陷，便向桐城方向撤走。多隆阿则挥军追击，一路攻杀，使陈玉成的军队多数溃散，不复成军，太平天国的一支主力部队就此覆灭。湘军水陆配合，趁势攻占了安徽大部地区，迅速向东推进，直指天京城，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更加困难了。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三十二 问鼎轻重

安庆被攻陷的第七天，曾国藩由东流前往安庆，又过数日，设公馆于陈玉成原来的英王府内，直到同治三年九月初，一直驻于安庆。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此指挥湘军转战江浙等地，直至天京被攻陷为止。

曾国藩刚刚驻进英王府，就接到了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公文报告咸丰帝已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在热河行宫驾崩，6岁的皇子载淳即皇帝位，以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执掌朝政，定明年改元祺祥。

这一消息震动了曾国藩及湘军上层人物。曾国藩对皇帝英年病死，国家朝政变故进行了深入的思虑。已故的年轻大行皇帝自登极以来。十个春秋，没过一时安静日子，自己创办湘军，转战八九年，保的就是这位命运乖蹇的皇帝。军兴以来，皇帝对自己猜忌甚重，但是自去年以来，授自己为两江总督，三江两湖差不多皆听任指挥。然而正当自己指挥湘军大展宏图之时，皇帝居然逝去。在这军事重要之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以后将会如何，自己又该如何处置，感到心中茫然。

同时，曾国藩又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8位大臣中，真正有实力的仍然是肃顺。肃顺的掌权表面看对汉官有利，自己的授为两江总督赖于肃顺的举荐。但是，曾国藩认为凡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绳索，要冲破束缚就必然发生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揽权。像肃顺其人，刚愎自用，锋芒毕露，下场一定不会好。想至此，更加心乱如麻。

由于安庆被攻克，曾国藩驻进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

胡林翼先来安庆。胡是曾国藩的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推心置腹，毫无顾及。胡林翼对形势的认识、对8位顾命王大臣及肃顺的认识与曾国藩是一致的。但胡林翼兼任地方官的时间比曾国藩长，湖北省城的官文知道宫中秘密，与他同城的胡林翼自然也就知道得多些。

胡林翼告诉曾国藩的宫中秘密是慈禧太后与八大臣的尖锐矛盾、恭亲王与大行皇帝咸丰的尖锐矛盾，咸丰一死，可能会发生太后联合恭亲王推翻顾命大臣，发生宫廷政变的大事。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一定要闹的。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所措了。

胡林翼瞟了曾国藩一眼，慢慢地从怀里抽出一个信套来，一面递给曾国藩，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日前游浮梁（江西饶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联，寄来让我交你一看。”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套里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上面写着：

神所依凭，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见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曾国藩又摇头咂舌地念了一遍。当他抬头看着胡林翼神秘微笑的情态时，眼前一亮，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心里想：难道他左宗棠要“问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气也大，但手里只有数千兵马就想做皇帝？他迅速转念：这是要让我“问鼎”。曾国藩联想到创办湘军以来，宫中不断传出的

流言，皇帝对他的猜忌，近年湘军已达 10 余万众，朝野对湘军的猜忌，心里一阵阵发冷，双手颤抖，没说一句话。

胡林翼见曾国藩如此，也不便再问。遂又 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对方，口里说：“我也有一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国藩心想：不知又有什么惊人之语写在上头。打开后只见这一联是：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看后，大声说：“润芝（胡林翼字）， 妙极了！”胡林翼惊问：“妙在那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有润芝这一联，犹如良药，九弟看了定可药到病除！”胡林翼沉吟片刻，用诡谲的目光盯着曾国藩，摇了摇头，欲言又止。两天后，胡林翼要回武昌，曾国藩送他到城南码头。曾国藩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左宗棠字）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说着连同信袋递给胡林翼。胡林翼打开看时，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了“未”字，变成了“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林翼看后放声大笑：“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左季高的意思整个弄颠倒了！”曾国藩回答：“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可以乱来的。左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该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他这话同样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 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之手段，取得皇帝位，来拯救变乱的天下。但曾国藩巧妙地移作用霹雳手段对待起义者，他就无话可说了。

曾国藩目送胡林翼远去，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胡林翼因经年用心，尤其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进攻武汉，他大受惊吓，曾多次呕血。这次离安庆回至武昌，几天后就死去了，那天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61 年 9 月 30 日）。

恰在曾国藩送走胡林翼后，彭玉麟从池州来至安庆。

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非比一般，曾国藩曾言，彭玉麟是他的“一二知己者”。彭玉麟的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其令曾国藩欣赏。然而，这个谨言慎行的彭玉麟，见到曾国藩居然也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彭以鲜明炽烈地言辞表达：目今混乱之秋，咸丰早逝，皇位交给一个 6 岁的娃娃承当，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凡有爱国之心者，都应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举目四顾，唯有湘军可承担起灭长毛，擎江山的大任。湘军统帅正该是当然的一国之君。最后他探曾国藩：“今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劝谏”在曾国藩听起来要比胡林翼、左宗棠震惊得多了。前二人只用隐语试探，胡、左二人，尤其是左宗棠，本来就是“胆量冲破天”，“问鼎轻重”在他嘴里说出不会令人太惊奇。但，彭玉麟心细如丝、持身严谨、心热肠赤，他说话办事都要经过千思万虑。现在，居然胆大妄为，让他做皇帝，并表示若有此意，愿为之赴汤蹈火。彭玉麟的一腔赤诚，虽让曾国藩感激莫名！然而，这是什么事？如何能让他答应？这是犯上作乱！与“长毛”们异曲同工。曾国藩没有回答，拿别的话岔开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细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过几日，武昌便传来了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曾国藩哀 伤万分，哭着说：“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再难找这样的好人了！”对曾国藩来说，胡林翼确是如此的。自办湘军以来，作为友

军和毗邻，胡林翼处处为他设想，可以说，没有胡林翼的支持，没有湖北的友邻，曾国藩和湘军是难有今日的。

正在曾国藩哭天抹泪之时，幕僚报告：“王闿运，王壬秋先生来拜访”。王闿运是湖南名士，湘军初建时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应肃顺之邀，在其家教读，甚受尊重，实则用为心腹，咸丰皇帝也知肃顺幕中的“王举人”。王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顺看重后，结交京内外官员、士人，几年后也是名满天下了。

王闿运向来以名士自居，一见面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

曾国藩虽喜王闿运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却很反感。王闿运见曾国藩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国藩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王闿运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国藩，此人是肃顺的“西席”，其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认真听他讲了宫中内幕，即慈禧与恭亲王联合，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内幕。王闿运站在肃顺一边，认为肃顺力矫弊政，重用汉人，高瞻远瞩，但慈禧太后母因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他为曾国藩指出两条道：一条是拥湘军之重兵，入觐九重，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另一条是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他可以说动肃顺的拥戴，肃顺本来就看不起满人，而钦佩曾氏。曾国藩漠然相待，以指蘸茶，漫不经心地桌上划着，王闿运顺着曾国藩的手指看去，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闿运看后戛然而止，起身告辞而去。

即家庭教师或幕友。

三十三 东南之主

曾国藩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他的对策却很正确。他报定“效劳朝廷，忠君报清”的主意，拒绝了彭玉麟等人让他做国家之君或东南之主的劝谏，坐等形势之变化。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顾命八大臣肃顺等或处死或革职流放，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以议政王辅政。十月五日（11月7日）改后号祺祥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慈禧太后与奕訢政权为了抓紧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起义，改变了咸丰对汉官的态度，大胆向汉官放权。同年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令曾国藩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自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由他节制。根据曾国藩提议，四省的巡抚等重要官员也都作了调整，多由曾国藩的手下或与湘系有密切关系的人担任，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沈葆楨为江西巡抚。曾国藩的许多部下也都升了大官，彭玉麟授为安徽巡抚，因其力辞不受，改为水师提督、兵部侍郎；杨载福早在几年前已授福建水路提督；骆秉章升为四川总督，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曾国荃、刘蓉、李桓、蒋益澧等将领都升为布政使；毛鸿宾为湖南巡抚也是由曾国藩所推荐。

这样，东南数省不仅尽归曾国藩管辖，各省文武官员负主要责任的也都是曾国藩的部下、心腹和故旧。曾国藩不做东南之主，成了实质上的东南之主了。

此时，李秀成经营江浙，围攻杭州，巡抚王有龄向曾国藩告急。然而，王有龄与曾国藩素不和睦，他不支持湘军的作战，拒不供前往浙江作战的湘军粮饷，还在曾国藩最困难之时把背叛曾氏的湘军将领李元度收归自己麾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不忘。现在，王有龄向他求救兵，他不予理睬，而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要让左宗棠取代王有龄，不允许王有龄这样对他不忠心的人在他的治下存在。于是，他上奏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又不令左宗棠迅速入浙作战。直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62年1月11日），太平军攻下杭州，王有龄自杀，浙抚衙门官员死得差不多了，曾国藩才令左宗棠迅速入浙。同时，密保左氏为浙江巡抚。

杭州被攻克，左宗棠遵令快速入浙，连连攻下开化、常山、衢州。同时，曾国藩派出鲍超、曾国荃、张运兰、朱品隆等部在皖南、苏南、赣东发动攻势，配合左宗棠进攻浙江的太平军。曾国藩为左宗棠的进兵浙江，造成有利的局面，尤其为左氏晋升浙江巡抚造成无人取代的大好机会。很快，左宗棠就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了。

前文提到，李鸿章为李元度说情激起曾李矛盾而离开祁门大营滞留南昌赋闲，曾国藩移兵东流时，去信敦促他返回湘军大营。安庆被湘军攻陷后，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失去了进攻能力，但在下游却取得了进攻时机。李秀成在江浙一带的苏福省开辟了第二个“小天堂”事业，他的兵力有原来的数万人，有“第二次西征”在武汉地区吸收的二三十万农民队伍，又有自石达开部返回来的朱衣点、童容海等10余万人，太平军在苏南力量的壮大威胁着上海。

上海是洋人集居的地区，太平军攻占江浙各要镇，许多官僚、士绅都躲到了上海。洋人与官绅为阻止太平军的进攻，都组织了武装力量，如洋枪队等。同时，他们还效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去秦国哭求救兵，抵抗吴国进攻的

故事，派江苏太仓绅士钱鼎铭至安庆见曾国藩，声泪俱下，叩头乞师，让曾国藩派兵拯救上海的中国绅民。曾国藩感到手下再无兵可派，又怕派出兵去，上海地处僻远，若有个紧急，声援无法相达，所以并未同意派兵去上海。随后，钱鼎铭见到了曾国藩身边的李鸿章，双方讨论了上海的形势，认为那里“商货骈集，税厘充羨，饷源之富”，“弃之资贼可惋”。李鸿章再与曾国藩共议向上海派兵的问题，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从军事上考虑，湘军自西东进，由上而下，若再控制了上海，又可“由下捣上”，分兵合击，从东西两线夹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再者，“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金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于是，决定分兵援沪。

曾国藩还对江苏巡抚一职格外注视。当时的苏抚薛焕因苏南为太平军所占，正避居上海，无所作为，曾国藩决定借机援沪，取得这一职衔。开始他想让其弟曾国荃领兵赴上海，但是曾国荃竟无意去上海，而要直接围攻天京。他的初步设想为曾国荃拒绝，才商之于李鸿章。李鸿章一听，心中异常激动，当场表示若能领兵去上海，保证肃清上海周围的太平军，进而夺取苏南地盘，为最后镇压太平天国贡献力量。曾国藩听了笑着说：“你去上海我就放心了，但我的身边却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可怎么办呀！”李鸿章生怕曾国藩变卦，赶紧“坚请赴申”，曾国藩允其赴沪。

由于李鸿章一直是幕僚，手中并无军队可以带至上海，曾国藩许诺他募集一支军队。他首先写信给合肥张树声，张专程至安庆，商量募兵一事。曾、李、张等商定按湘军模式编庐州一带的团练，名曰“淮军”。由张树声约集了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在皖北招募，先后编成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2个月内，诸营陆续成军开至安庆。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1862年2月22日），淮军各营在安庆北门外集合，由曾、李检阅。曾国藩深怕淮军至上海不堪一击，当天即允由湘军中拨出8营，归入淮军。这8营有曾国藩的两营亲兵，充任李鸿章的亲兵。另有曾国荃的开字两营、薛焕委曾国藩在湖南招募的林字两营、湘军陈士杰的熊字一营、垣字一营。分别由程学启、滕嗣林、滕嗣武、陈飞熊、马先槐等人统带。加上李鸿章招募的各营，总计13营，6500人。

曾、李起初决定，练成的淮军沿长江北岸步行前往上海。二月二十人日（3月28日），钱鼎铭、潘馥由上海乘轮抵达安庆，告以已雇妥英国轮船21艘，分三班潜渡上海。三月七日至五月初（4月5日至6月初），13营淮军全部运至上海。

李鸿章赴沪的第17天，即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便奉命署理江苏巡抚，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保奏。早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就上奏弹劾江苏巡抚薛焕丢城失地，不能胜苏抚之任，并附片保奏李鸿章“才大心细，可接苏抚之任”。并表示若准奏，自己可拨给军队，保卫长江下游地方。清廷急需军队开赴长江下游与太平军作战，便接到曾国藩的奏折，稍作安排，便将薛焕调入京师，而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下卷，第17页。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清代名人轶事》，第104页。

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势力聚集于此，对太平天国起义十分仇视。曾国藩把李鸿章派进上海，立即发生如何对待外国势力的问题。当时清政府倡议“借师助剿”之政策，即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协助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的态度以为在上海一地，可以实行，而在其他各地绝不可行。理由是，上海是通商口岸，洋人已有权进驻通商，而南京、苏杭等地尚不是通商口岸，若洋人以“助剿”为由，进驻各地，必生出许多支节来。再者，洋人之所长在“船坚炮利”，而太平军主要是陆师。长江等水域，已由湘军水师控制，不需要洋人“助剿”。他反对江浙绅士官员请求让洋人“代管”南京、苏杭的建议，说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总之，他提出“借师助剿”本不得已之事，而若依洋人而“剿贼”，“尤为大耻”。清政府相信曾国藩及其湘军足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乃放权给他，让他在江南放手大干。曾国藩自己曾表白：前3年前，江南具有相等权力的共有5人，一是钦差大臣、二是两江总督、三是督办徽防、四是督办宁防、五是管辖李世忠和苗沛霖的钦差大臣，而目今他是“一身所处兼此五人之职，而又新添安庆、池洲等沿江十余城”，成了真正的“东南之主”了。

《曾文正公奏稿》，第15卷，第66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17卷，第36页。

三十四洋务之父

以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搞到90年代，进行了内容繁多的活动。诸如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校，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派遣驻外使节和留学生等等。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总理衙门大臣、议政王奕訢；而所搞活动最多，成绩最突出的地方要员要数李鸿章和张之洞。但是，要说最早搞起来的，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他办起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了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李鸿章、左宗棠虽也搞得较早，但毕竟在他之后，而且是作为学生和晚辈秉承师长曾国藩之意而搞的。故此，一提“洋务派”，人们便自然按“曾、左、李、张”的顺序历数。这个顺序虽也不一定要这么排，然而曾国藩的位子却实难向后排了。无论是他们的“辈分”还是搞这项运动的先后，左宗棠、李鸿章都无法排在曾国藩的前面去。正是从这个意义考虑，有人才称曾国藩为“洋务之父”或“近代化之父”的。

洋务运动由军事方面开始，当时迫切要求用新式武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曾国藩上奏清廷，建议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造船供应湘军水师，以攻取金陵和苏、常，并扩大水军编制。奕訢、文祥等人研究了 this 奏折，认为要办一个船厂，没有几年难以奏效，何况曾国藩要设立的船厂并非新式。因此，不如就便提出向欧美国家购买火轮船，以镇压长江流域的农民起义势力。

经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磋商细节，赫德说只要筹措几十万两白银，便可以购得一支西式舰队。随后，便向长江沿线的几个地方大员曾国藩、官文等发出谕旨，让他们“妥筹具议”。曾国藩经过认真思考，复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总体上说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对购买外洋船炮的认识显然与众不同。其不同在于：“剿发逆”，即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仅仅是眼前之目的，他的着眼不仅在此，而是看到火轮船必然成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买来外国轮船，雇募科学研究者和能工巧匠模仿研究，达到自己制造。所以说他将着眼点放在学习制造上。他在此时还说过，仅仅为的与太平军作战，就用不着购买外国人的轮船、因为太平军主要是陆军，水师的力量早为湘军水师所慑服，哪用得着购买外国军舰？曾国藩还表示，购得外国军舰，一定要完全控制在中国官员手里，绝不能让外国人说了算，免得失去自主权。“师夷制夷”，不能为夷所制，这也是曾国藩初搞洋务的基本思想。

这前后，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冯桂芬把自己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送给曾国藩一套。曾氏对其“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等内容很感兴趣，认为是“名儒之论”，此书对他的洋务思想有较大影响。

在洋务运动期间，总共开办过20多个军事工厂，而最早设立的是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攻陷安庆后，下一步就要作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准备。要彻底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南京城里

的太平军不用说，单是李秀成的军队就有 50 余万人马。这么多人马，自然多数是未经过专门训练、武器又极落后的乡村农民。但也确有一部分久历战场的老兄弟，尤其是李秀成在上海通过洋人也买了一批新式武器，不仅多次打败清军，同时在上海附近同外国军队、同中外混合军队作战，也连连取胜。所以，曾国藩要想扑灭这么一支庞大的、部分以洋枪洋炮装备的太平军，就不得不动一番脑筋，至少也得改良一下武器装备，不能光用刀、矛、鸟枪。

出于这个目的，曾国藩首先在安庆搞起了兵工厂，委派杨国栋负责。杨为筹办军械所，到处搜罗人才，先后把浙江海宁著名学者李善兰、江苏金匱（今无锡）数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请至安庆。同时，雇了数十名工匠、技师，还设法从广州、上海等地买来一批洋枪、洋炮、开花炮弹的样品，交给这些匠师们研究、仿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 年 12 月），安庆内军械所办成，很快便试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把湘军军官和幕僚组织集合在安庆演武场上，试看洋枪洋炮的演射。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试放了新制成的后膛枪和开花炮。其威力、射速、射程、准确度、杀伤力的确要比清军在战场常用的鸟枪、抬枪和以火药顶出炮膛的铁沙、石块的大小土炮要胜过不知多少倍。军官们个个看得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当场给制造者、演放者颁奖。并向军官们演讲自己的打算，说要兵工厂办大、办到南京、上海去，将来还要制造大轮船、造机器、造制造机器的机器，洋人有的我们自己也一定要有，这就叫“徐图自强”，叫“勤远略”即抵御外侮。

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也没有使用机器制造，只是利用土法打制、改装、仿造外国人的枪炮子弹。就是使用这些土法仿造的洋枪炮，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亦为纯粹土枪土炮难以相比。同治元年（1862 年），李鸿章到上海后，亲眼看到了洋人使用的洋枪洋炮，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也开办了“上海洋炮局”，仿制洋人的开花炮弹，在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仅仅试制洋枪炮，曾国藩仍不满足，同治元年（1862 年），曾国藩制定了三面并举、五路进军金陵的用兵计划：即以曾国荃部湘军从西面、以楚军左宗棠部从南面、以李鸿章淮军从东面同时并举合围金陵；五路进军是陆军四路人马：曾国荃所部湘军从芜湖、秣陵为南路，鲍超由宁国、广德进取句容、淳化为东路，多隆阿由庐州、全椒进取浦口、九袱洲为西路，李续宜由镇江取燕子矶为北路、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从长江正面，五路攻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曾国藩上奏新成立三支水师，即淮扬、宁国、太湖的计划也由皇帝明发谕旨批准，新增加了黄翼升、李朝斌两个水师统领，太湖属内湖，其水师仍归彭玉麟统辖。

大举进攻天京的计划，尤其是水师的扩建，激励着曾国藩需要使用先进军舰的构想。他以为既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能仿造出西洋的枪炮弹药，也就一定能仿造出西洋的军舰来。

从同治元年（1862 年）开始，曾国藩就命令、鼓励、支持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研制军舰，徐寿等人也就真的下力气干了起来。徐寿等人是中国当时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不仅通晓中国传统的科学、制造学等知识，同时对西方的当代数、理、化等知识，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所以，到

参见李鸿章《奏稿》，第 9 卷，第 31 页。

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他们居然制出了一部轮船的发动机。曾国藩看这部发动机的试验，心情很激动，当场就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鼓励徐寿等人再加把劲，制出中国的火轮船来。然而，事实上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发动机到一艘轮船，中间的距离还太大了。尽管徐寿、华蘅芳等人绞尽脑汁，还是没能造出他想象的能与外轮相提并论的轮船来。

造船工作屡遭失败，徐寿等人焦的万分，曾国藩一再催迫。这时，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前时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自幼读的是洋学堂，远在40年代赴美留学，为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当时的中国里，这样的洋学生真正是凤毛麟角了。于是，华蘅芳等向曾国藩介绍，认为请得容闳前来，造船、办厂工作——一定会能有进展。曾国藩详细了解容闳的情况，知道他在五六年前回国，想为国家贡献他所学到的西方科学知识，曾到南京找过洪秀全，向太平天国献过7项“新政建议”。曾国藩揣摩容闳的“建议”有改善政府、改良政治、建设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校、创办各种实业等，确实是一套好主张。幸亏洪秀全等没有采纳，容闳也没有留在南京，若是留下他来，实行了他的“建议”，对清政府不能不说是个威胁。曾国藩认为，这样的人才，一定要留为己用。于是，让华蘅芳等立即转达曾国藩邀请之意，让他尽快来安庆。

容闳很快就到了安庆，当时他正在上海宝顺洋行经理丝茶等生意。曾国藩同这位留洋生详细地谈过两次话，印象很好。认为容闳的气质的确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难找，他一是精明干练，二是爽朗诚实，毫不掩饰。比如他对曾去找过洪秀全的事，见到曾国藩便自然表示：太平军的“苏福省”人民安居乐业、军队纪律远比清军好，作战也勇敢，自己想为太平天国的成功出力。但是，太平天国高层领导意识陈腐，洪仁玕有新思想，但也无能为力，所以太平天国也成不了事，自己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好政府，只得去上海做买卖。他明确表示：对清政府的各种制度、方针也无任何信心，也不想为清政府做事。正因为找不到一个好政府，所以感到很苦恼。曾国藩却当头便说：“你的七条建议，除去把《圣经》作为教育主课之外，其他六条我都接受。”

曾国藩的态度使容闳很吃惊，他不理解，这位全国闻名的理学名臣，为什么能接受他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

于是，他们议论如何学习西方的那一套，包括办工厂、办教育、派留学等等。曾国藩还说：“好的政府不是现成的，你不讲改良吗？有缺点的政府，改良了就是好政府了，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的好东西，中国也就变好了。”容闳对曾国藩的认识深表赞同，感到回国六七年来，今天才找到了理解他的人，决定把自己的富国强兵的主张全部拿给曾国藩。

他们重点议论了办军工厂和办教育的计划，容闳建议必须先买回外国的一套机器设备，才能从头做起。于是曾国藩正式聘他为工程师，并赏给五品顶戴，给他钱让他回美国去购买机器。

机器没买来之前，轮船的试制工作仍不能停。到了同治二年年末，即1864年年初，中国的第一艘火轮船居然在安庆内军械所制成了，这是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个创举。这艘轮船的船体很小，重25吨，长55尺，高压引擎，单汽筒，回转轴长14尺，锅炉长11尺，直径2吋。严格讲，这艘轮船还只能算

是一个试验模型。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制造出的第一艘军舰，该舰取名为“黄鹄”号。

军舰造出来了！曾国藩的兴奋比两年前造出第一批新式枪炮还要强烈。他再次集合军官和幕僚在安庆的长江中试航，顺流航速为 28 里，逆水时速约为 16 里，曾国藩自认“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也认为既然中国能造出轮船来，“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中国便会有自己的舰队。

不久，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把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

京。未及办厂，同治四年（1865 年），容闳由美国买回了机器，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办起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之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该局不仅能制造枪炮弹药，还设立船坞，制造军舰。到同治七年（1868 年），终于制造了一艘真正的轮船，取名“恬吉”。到了光绪二年（1876 年），共造出 7 只轮船，其中铁甲舰 1 只、炮舰 6 只。继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之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继续举办洋务。先是军事工业，继是民用工业，使中国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曾国藩在这场运动中所做并不算多，这主要原因是他死得太早，清政府举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刚要诞生时，他便死去了。然而，他是这场运动的倡导和开拓者，其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因其做得不多而逊色。

“黄鹄”号试航在安庆，不在南京，当时南京尚在太平军手中，曾国藩于 1864 年 10 月 8 日由安庆去南京，试航日期为同年 1 月 28 日。

《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三十五 曾九军弧

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分兵五路东进，步步为营，包围攻取天京城时，他们的内部合作却出了问题，问题的症结出在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是曾国藩的四弟，曾氏习惯按男女一同排行，他就是行九，故人称“曾九”。曾国藩亦惯称其九弟。

曾国荃的生性十分骄横，史书记载他“少负奇气，倜傥不群”。16岁时曾到京师随曾国藩读经，但他对圣贤经书却不感兴趣，未几便甩手还乡。他的资质倒很聪敏，曾国藩也认为他们兄弟中真正有出息的数着老九了。回乡不久以府试第一名入县学，举为优贡。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坐困江西南昌，他弃文就武，在家乡募得3000湘勇，自率赴江西，途中攻陷安福，进攻吉安，连战皆捷，被朝廷加赐同知官衔。他的军队称“吉”字营，成为湘军嫡系。后一直在江西同太平军作战，侥幸的是，他领兵作战，多能取胜，湘军在江西的几次著名战役，如吉安战役、景德镇战役，他的部队皆是作战主力。多次得手，他的官职便升为知府、道员。

他被胡林翼看中，称他为“罕见之将才”，乃调为湖北军。后所部增为万余人，参加安庆战役，是围城的主力部队。他指挥军队，深挖长壕两道，内外作战，在其他各路军的配合下，终将安庆攻破，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官升江苏布政使。

安庆战役后，他广募军队，准备东下直捣天京城，所部达二三万人。

曾国荃性格暴烈、贪婪跋扈，排斥异己，其他将领多与之不和，湘军内的鲍超、杨载福、彭玉麟等多对他有很深的成见。他所统带的吉字营十分凶恶，每陷一城皆尽情屠杀，财物、子女尽数掠取，焚杀成性。

安庆战役中，曾国荃与多隆阿产生了极大矛盾。一是太湖战役时，多隆阿负责守太湖，陈玉成大军前来进攻，在情况紧急之时，曾国荃等部不来援救，幸赖鲍超苦战，胡林翼派兵援救，才取得该战的胜利。二是攻打安庆城，多隆阿独挡桐城一面，挡住陈玉成的大军增援，连番苦战，保证了围城部队的战斗进行。然而，战后曾国荃却列为首功，赏赐丰厚，多隆阿出力极大，损失也很重，却未得封赏。因此，对曾氏兄弟、尤其对曾国荃极为不满。据说封赏之后未见他的赏赐，气得大病了一场，下决心“再不与曾国荃同处”。

这次，当曾国藩发布“三面并举，五路进军”的战斗命令后，曾国荃（曾国葆咸丰三年因战败被裁回乡，再出时改名曾贞干）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板桥、秣陵关、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同治元年五月四日（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彭毓橘、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苏福省的李秀成一

优贡：因成绩优秀，破格由秀才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

其中包括曾国荃之弟曾国葆的部分军队。

王闿运：《湘军志》，岳书社1983年版，第11页。

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綰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綰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问，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

曾国荃两万余人在南京城下进退两难，时刻准备遭受太平军的打击。但是，在别人眼里，却认为曾氏为了独占破城之功，不肯与他部合作，还有人说，多隆阿西走便是曾氏兄弟所排挤。

正在曾氏兄弟两头为难之时，李秀成受天王洪秀全之严命，率领 20 万大军自苏州进抵天京城下，很快对雨花台的湘军发动了进攻。曾国藩闻李秀成率兵回援天京，知道曾国荃等难逃灭顶之灾，吓得连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写信给守制的李续宜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求他“夺情”返回战场，助自己一臂之力，救出雨花台下的湘军将士。同时派人去上海向李鸿章求援，要求把曾国荃原来的部队由程学启率带援救曾国荃。结果，李续宜染病在家，无法出山；李鸿章仅派吴长庆、张树声所部少量新兵前往，曾国藩干脆不再向他求援兵了，因为这些新兵起不了救援之作用。

救兵求不到，李秀成的 20 万大军已包围了曾国荃的 2 万多人马。曾国荃想逃也逃脱不了，只得咬紧牙根，依靠修好的壕沟、堡垒，与李秀成展开了生死搏斗。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李秀成大军自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日（1862 年 10 月 13 日），开始进攻雨花台湘军营垒，至十月五日（11 月 26 日）止，共计围攻 46 天，竟然没能攻入曾国荃修筑的壕垒，而自行撤围离去，曾国荃竟然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

因祸得福，曾国荃经此一战，声名更加大振，曾国荃更加踌躇满志，感到自豪。许多参加此战的湘军军官也都因此而取得莫大的政治资本。这次战役与太平天国的生死存亡关系甚大，李秀成未打破雨花台的湘军大营，在退走时又遭到湘军的袭击，伤亡十几万人，从此之后，太平军再也无力组织对围城湘军的攻击了，直至天京被曾国荃等部攻陷为止。

为什么雨花台 46 天大战，李秀成 20 余万大军竟未能攻破曾国荃的 2 万

《曾文正公书札》，第 18 卷，第 44～45 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 19 卷，第 47 页。

多人的营垒？这是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后来曾国荃对王闳运写的《湘军志》大为恼火，毁掉该书之版，欲置王闳运于死地的事，揭露了谜底。王闳运写这次战役时就很纳闷，究竟为什么 20 万大军战不胜 2 万多又饥、又疲、又遭瘟疫的湘军？经过认真研究，王闳运才发现那次战役，一是李秀成无心决战，迫于洪秀全之严命才勉强应付。作战时仅“恃炮声相震慑”，根本就没有向堡垒内的湘军冲锋。因为李秀成等人既不愿战，也不敢战。46 天的仗，表面上炮声大作，“多发西夷大炮相烧击”，“连十昼夜不休”，实质上简直像过年放鞭炮，并未杀伤堡垒和壕沟里的湘军，才使曾国荃不仅侥幸存活了下来，还捞到了政治资本。

李秀成撤走后，曾国藩还怕太平军再度来攻，赶紧写信让曾国荃“趁势退兵”，免得“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但是，经过 46 天战役的曾国荃反而表示坚决不退兵。经过多时反复争论，也再不见太平军来攻，曾国藩乃于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63 年 3 月 18 日）由安庆动身去南京，亲自查看了雨花台大营，发现那里的营盘坚固，堡垒与壕沟关系协调。又了解到李秀成一去，不可能再有回师攻击之力，才打消了顾虑，让曾国荃坚守雨花台营垒，成为合围天京的基础。

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八日（4 月 15 日）回至安庆，重新安排军事部署，从四处增募、调集兵勇增援雨花台大营，很快使围城军增达 5 万多人。至此，天京被攻陷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王闳运：《湘军志》，第 22 页。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三十六 曾沈争饷

雨花台大战之后，曾国藩的湘军主力陆续开抵天京城下，合围了太平天国的都城。但是，这个坚持十几年之久的农民政权，到了最后的时刻仍困守孤城，与湘军进行着生死较量。自雨花台之战后，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为止，又坚持了一年半之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太平天国的困难自不必说，曾国藩因久攻天京不下，大军云集，军队供应问题发生了极大困难，也出现了几将瓦解的势头，产生了湘军的内外矛盾。其中，曾国藩与沈葆楨的争饷问题，闹得最惹人注目了。

先是湘军大营瘟疫流行，一天要死掉数十人、上百人。由于缺乏医药，吃粮又不足，湘军士兵夜里抱着饿肚昏昏睡去，第二天就成了一具僵尸。一个营房里一人得病，一天内便传染全室。大批士兵死亡，许多骨干也丧了性命，曾国藩的弟弟曾贞干是“贞”字营的统帅，也死在天京城下的瘟疫中。

胞弟的死亡对曾国藩打击很大，他要下决心解决围城军的困难，坚持到攻下天京城，不然将是前功尽弃。

然而，要解决困难着实不易。自湘军建军以来，军饷从来都是大问题，但当年湘军人数不多，弄上一笔就可缓解。可是，现在的湘军兵员大增，曾国藩的直属湘军就有12万，由他直接供饷的也将近10万人，加上各省的湘军，人数已达30万之众。曾国藩虽然在江南地方有了实权，但长年征战，地方的粮饷早已枯竭了。仅由他提供军饷的湘军，每月最少也得50万两白银才能过得去。同治元年（1862年）以后，清廷允湘军供应可由广东厘金、上海税厘、各省协饷里抽补，但实际上都是空头支票。郭嵩焘时任广东巡抚，还不断为湘军供饷，别的省分就从未向湘军供过饷。

曾国藩直接管辖的几个省分中，浙江巡抚由左宗棠担任，但左系湘军不断扩充，到同治元年（1862年）已由原来的6000人扩为5万人。浙江的战事一直很激烈，那是李秀成控制的地区，左系湘军每天要打仗，自己的军饷供应尚不足，也就拿不出银子送给曾国藩了。不仅如此，左宗棠还伸手向上海的李鸿章要“协饷”，曾国藩见了老大不高兴，这是吃到曾国藩的上海“协饷”里面去了，当然李鸿章也不会给左宗棠。

湘军主力集中南京一带，太平天国的军队和政府正好也集中在这里，双方的吃粮也就大成问题。江、浙地区本是富庶之区，但因连年战火，生产停顿，粮食也就欠收。史书上说，这里饥民成群，而有的地方连饥民也不见了，是遍地榛莽“常竟日不见烟火，不逢行人”。这样一来，不要说无钱购粮，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了。南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军队就达7万余人，每天最少也要吃10万斤粮食，哪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去！曾国荃没有办法，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断向上下呼吁供给湘军粮食，说再这样下去，湘军就要溃散了！

为此，曾国荃通过哥哥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的淮军也不宽余，只能将发霉的大米运来搪塞。曾国荃见了大骂李鸿章坏了良心，下令将坏米还给李鸿章。幕僚立即劝他：“粮食不可退，有米总比无米强，退回上海将与李二失去了和气！”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了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正因为饷项、粮食供应困难，南京城下的湘军开始四处抢劫，本来曾国荃部湘军就是抢掠成性，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他们不仅成群出动，抢劫乡

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而且到处抢劫妇女，虏入营盘奸宿。太平军粮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内的百姓放出城来，妇女儿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妇女一出江东桥，就被城外的湘军掠去，无一幸免。为了此事，幕僚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表示：“我欠各营的粮饷太多，勇丁们连粥也吃不够，没有脸去见各部将领，哪有理由再去管这些事？若再不破城，军队怕要瓦解了！”赵烈文素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著称，听了曾国荃的话也没有话可回了。不久，萧庆衍部果然发生闹饷事件，曾国荃向兄长问计，曾国藩劝他：“事因欠饷缺粮而起，只宜多加慰抚，不可过绳以法，免得功亏一篑！”

军饷问题越闹越紧张，终于发生了曾国藩与沈葆楨的重大矛盾。

沈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则徐之婿，道光朝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时，因九江为太平军所占，到曾国藩湘军充营务处会办，抵抗太平军。后再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葆楨与林夫人坚守城池，力战胜之。曾国藩上奏极言葆楨夫妇共同抗敌，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惟沈某能独申大义于天下”等，清廷闻报，加葆楨按察使銜。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大举兴军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书请沈来安庆会办军务，旨准其去安庆。安庆被攻陷后，慈禧、奕訢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保奏沈葆楨为江西巡抚。

从沈葆楨仕途经历看，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一同抗击太平军，他的两次升官，也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但是，当沈葆楨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令湘军东进，左宗棠进兵浙江，清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而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大兵入江西，以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沈葆楨见太平军大举入江西，湘军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乃亲赴广信督防，抵御太平军。又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还广调清军去江西参预防卫，如江忠义的精捷营、习保田的精毅营、王文瑞的老湘营、王德榜的长左营、张岳龄的平江营、王沐的继果营、韩进忠的韩字营、刘胜祥的祥字营、刘于浚的水师营、刘典的克勇、段起的衡字营等。

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需要大笔军饷开支，沈遂上奏清廷，停止供应湘军军饷，包括原来供应曾国荃大营的协饷、江西漕折银、九江关洋税银、江西厘金等，这些银两，都是朝廷批准供给湘军的。在湘军军饷奇缺，雨花台各营岌岌可危之际，江西的沈葆楨又截留了所有的供应，这下子激起了曾国藩的怒火。

前文已述，曾国藩在江西驻兵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也看够了江西巡抚的眼色。咸丰八年（1858年）再度出山，江西巡抚毓科等同他的关系好转。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项收入均归他提作湘军军饷。他所以奏准让沈葆楨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楨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楨上得台来便断了他的后路。

沈葆楨在江西扩建军队也算正事，但银子就那么多，江西用了湘军就没

《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曾文正公奏稿》，第20卷，第33页。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182页。

有了。但从缓急程度着想，雨花台的曾国荃大营是迫不急待的，开始，曾国藩看到湘军军饷一天天困难，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一封私信，让他解九江关洋税3万两给雨花台湘军，以解眼前之急。蔡锦青不敢违意，便向南京运银，谁知被沈葆楨发现了，沈把蔡大骂一顿，勒令他追回款项，否则就罢他的官。沈葆楨是蔡的顶头上司，得罪不起，蔡锦青只好乖乖地原数追回了寄出的款子。

事情发生后，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楨忘恩负义，催促曾国藩上书争饷。曾国藩心里不愿同沈葆楨闹翻，但迫于湘军用饷太急，只得具疏力争，要求仍把江西的原款发给湘军，“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奏疏寄出后，清廷以户部“部文”的形式答复了曾国藩，不仅令湘军不许再要江西的军饷，还说湘军不仅每月有两湖、川、赣协解的军饷15.5万两，目今江、浙大半肃清，上海富甲天下，湘军有的是饷源，曾国藩还硬要江西的银子，这分明是“广揽利权，贪得无厌”。曾国藩看户部发来的这个“部文”，一下子气得两眼发昏，金星直冒，半天透不过气来。幕僚们一边劝慰，一边拿过“部文”传看，看后无不大骂沈葆楨。有人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葆楨一定能得第一名！有人说：“沈葆楨简直比过去的江西巡抚陈启迈还可恶！”曾国藩一再思忖：“部文”的内容，一定是沈葆楨“恶人先告状”，他断了湘军的饷还不算，还硬给自己加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罪名，自办湘军以来受了不少窝囊气，但都比不上沈葆楨给他的这个气大。

大家商量着如何对待沈葆楨和这个“部文”，多数人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楨，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认为过去的陈启迈因不供湘军饷械被罢了官，沈葆楨的下场不会比陈启迈好。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狠狠地抓起笔来。他知道要参沈葆楨的确不难，以现在自己的身分，以朝廷急待让湘军攻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楨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楨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慢慢放下笔。他考虑，沈葆楨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不值。再者，自己所争之饷，正好又是为了自己的弟弟，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目睽睽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楨的念头。但是，金陵围城军一天天困难，而沈葆楨又告他“贪得无厌”，这个冤枉却不能不辩。

最终拟了一个《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折内陈述：自大军东下以来，兵饷奇缺，原议供饷的各省，除广东解来9万两外，其他省分一文未见，此皆有案可稽。而江西仅解1.5万两，又被其追回。他写道：目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锁遭奇祸！”折末恳求朝廷简派大臣前来主持江南大局，放他回家养病，现在“兵弱饷绌，颠覆将及”，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为了争饷之事，曾国藩写了多篇日记，反复记载此事的苦恼，一怕缺饷，

《曾文正公奏稿》，第20卷，第27页。

参见《曾文正公奏稿》，第20卷，第51页。

金陵士兵哗变，功败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权重，别人疑其专擅；三怕与江西争饷，败了饷缺兵溃，胜了得到专权恶名。所以，还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为最稳妥。

沈葆楨知道曾国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赶紧上了个奏折，陈请开缺，“以养老亲”。

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等自然不会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回家休息。只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曾、沈各得其半，并把李泰国购买轮船的退款 50 万两，拨给曾国藩使用以解其纷争。原来当时清廷正闹着一起“阿思本舰队”事件：同治元年（1862 年），清政府经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之手，在英国买得炮舰 7 只。李泰国擅自决定，该舰队用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统领，协助进攻太平军。同治二年八月（1863 年 9 月），舰队开抵上海，清政府任命总兵蔡国祥为统领，阿思本为帮统，舰队归曾国藩、李鸿章节制。双方因此而争执不下，后以解散舰队告终。英国退款 50 万两白银，其中 29 万两已经报销，仅余 21 万两尚存于上海海关，可以马上由曾国藩提取。

此外，清政府为保证湘军的围城粮饷，又指拨淮北盐厘每月 8 万两，从湖南拨粮优先保证围城军，还拨给安徽、河南等省士绅的捐款数十万两。这些钱粮一下子缓解了湘军的困难，保证了围城军的供应。曾、沈二人同时撤销“告退”，结束了轰动一时的争饷闹剧。湘军因祸得福，加紧了攻城的步伐。

三十七 生死关头

湘军的粮饷解决后，可以集中兵力对太平军作战了，而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却到了生死交关的最后时刻。

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李鸿章、左宗棠与洋人勾结，组织中外混合军，向江、浙地区的太平军占领区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李鸿章在上海与英国侵略者奥伦、戈登达成协议，组织“常胜军”，由上海西向进犯。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3年2月10日），奥伦与淮军程学启、郭松林部，携带22门西洋野战炮、全副英国来福枪、3000名英国军、1万名淮军，向太仓进攻。他们以重炮轰倒城墙，而后发起冲锋。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太仓全城军民，包括10余岁的幼儿都冲向城墙边，以血肉之躯堵住了敌人的进攻。英勇的太平军战士，在生死关头，前仆后继，打击中外反动军队。5个小时，杀死400名英国军、2000余名淮军。奥伦因此被撤去常胜军统带，以英国现役少校戈登取代之。

同年七月（8月），戈登率外国军队6000名，程学启等率淮军5万名，向苏州近逼。苏州是南京之外的重要首府，是太平天国的第二个“小天堂”，这里有4万太平军守卫，由英勇善战的慕王谭绍光指挥。

十月十七日（11月27日），敌军夜袭苏州东门外的石垒，这里是东门的要垒。谭绍光身先士卒，赤足而立，奋勇作战。广大战士冒着数十门大炮喷射的弹雨，随着主帅谭绍光一步也不后退，在生死交关时刻，表现了起义者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戈登承认：这是他参战以来遇到的最坚决的抵抗和最激烈的血战，谭绍光是他遇到的最顽强的指挥官。在连续3天的战斗中，英国军官被击毙10余名，士兵伤亡350余名。

正当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与敌人英勇血战之时，发生了纳王郅永宽、康王汪安钧等8个高级将领集体叛变，向敌人投降的骇人听闻的严重事件。

在敌人的武装“围剿”面前，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困难时刻，在生死交关时刻，太平天国队伍中的悲观投降情绪滋长，不战而降的事件不断发生。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在汪有为的同谋下，上海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刘玉林率万余部队战士降敌；接着，常熟守将骆国忠降敌，使中外反动军队得以轻松地进入苏南革命根据地。吴建瀛、骆国忠叛变后，洪秀全则发布诏书，痛斥他们的叛变罪行，号召广大太平军同各地的叛变行为作斗争。

汪有为等人的叛变阴谋，李秀成事先是知道的，但他却说：“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虽悉其所为，我亦不罪。……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等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

恭王谭绍光也很快发现了汪有为等人动摇、悲观、意欲投降的阴谋串联活动，劝告他们要对太平天国政权忠心不二。汪有为等没有接受劝告，并认为慕王已发现了他们的叛变活动，便抓紧同敌人联系。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已密谋决定叛降的郅永宽、汪安钧、汪有为等人，派遣与程学启熟悉的汪安钧在阳澄湖晤谈投降条件。汪安钧透露，苏州的慕王与数十名天将团

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页～567页。

《李秀成自述》，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44页。

程学启原为太平军陈玉成部先锋，安庆集贤关兵败降清。

结广西的“老兄弟”决心战斗到最后，苏州防守严密，很难攻破。而他们存5个王和几个天将联合，决定投降，条件是只要留住生命即可，到时候可以献出一个城门投降。

程学启与李鸿章、戈登议论后，表示不仅可以保全叛将的生命，还可以晋升大清官职，率领旧部人马。

郜永宽、汪安钧、汪有为一伙这几天议论投降之事，李秀成也有风闻。但就在这几天里，洪秀全招他回天京，他未向慕王交待即离去。李秀成离开苏州，为叛徒的叛变活动，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十月二十四日（12月4日），谭绍光召集军事会议，作进一步坚守苏州的战斗部署。会上，他表扬了作战勇敢的军官和部队，提醒大家坚定革命意志和信心，打败进攻苏州的清军，并对一些不坚定分子的表现作了批评。郜永宽等人一是作贼心虚，二是认为此时正可以发动叛变。当时的8个叛徒、除郜、汪二人外，还有比王武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他们8人早有准备，见到时机成熟，各握兵器准备举动。谭绍光的话音刚落，康王汪安钧猛力抽出一柄短剑，向谭绍光的胸部刺去。谭绍光的脖子被刺中，大叫一声，倒在桌子上，其余叛徒也一拥而上，汪有为首先冲上，一刀砍下了慕王的首级。

郜永宽见杀了谭绍光，便跳上桌子，发狂般地高叫：“天国的气数已尽，天京就要被攻破，苏州城的粮食已吃光了，再也守不下去了。为了搭救众位兄弟，我们已和李中丞李鸿章大人讲好了，只要献城投降，大家都可以保全生命，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饷回家！”

几个叛徒和被鼓动变节的官兵齐声答应。

谭绍光被杀后第二天，李鸿章、程学启、戈登等率领中外混合军进了苏州城。8个叛徒妄想保全生命、升官发财的美梦也随着苏州城的失陷而破灭：谭绍光牺牲两天后，李鸿章便翻脸失言，把他们一起杀死。

李鸿章杀降激怒了戈登，他大骂李鸿章背信，骂李鸿章是流氓，要控告他。结果，戈登闹了一阵子，毫无结果，又提出辞去“常胜军”统带之职，拒绝再与李鸿章合作。李鸿章只好派人对他好言安慰，给他送去银两，又给“常胜军”发了数万赏银，才使他又留了下来。

在李鸿章与戈登联合进攻苏州等地的同时，左宗棠也在浙江与法国侵略者德克碑的“常捷军”联合，对浙江的太平军作战。他们连续攻陷绍兴，金华、严郡、富阳，于同治二年九月六日（1863年10月18日）攻至杭州。杭州军民在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的指挥下坚守月余，敌人难以得逞。然而，苏州因叛徒出卖而失守的消息，影响了浙江战场上太平军的斗志。许多守将也纷纷效法郜永宽等人，纷纷献城投降。先后有浙江平湖守将陈殿选、乍浦守将熊万荃、海盐李文楚、嘉善的陈占榜、海宁的蔡元隆、桐乡的何信义等，先后向清军开城投降。但杭州、嘉兴两城太平军仍坚决固守。苏州失陷不久，李鸿章派程学启率部攻嘉兴。被守军打伤，很快死去，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嘉兴终被攻陷。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杭州随之被攻破，比王钱桂仁向清军投降。

苏、杭陷落后，清军与英法侵略者联合攻占江浙其他各府州县，同治二年十一月又向驻有重兵的常州进攻。淮军刘铭传，周盛波部与“常胜军”联

合进攻常州，太平军守将护王陈坤书指挥守城军顽强抵抗，坚守半年之久，多次打败中外联合军的拼命进攻，使淮军和“常胜军”都不敢靠近城墙。即使他们以重炮把城墙轰倒，出现了几个缺口，仍无法冲进城去，缺口处成了太平军杀伤敌人的最好阵地。如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64年4月27日）一战，刘铭传淮军几次攻不进去，只好退下来愤怒地看着成堆的清军尸体丢在缺口内外。戈登命令他的军官带头冲锋，大批准军殿后。结果，十几名英国军官先攻至缺口，而大批士兵却不敢上前。太平军扑了上来，有19名英国军官负重伤，10名被当场打死。

李鸿章在几个月中攻不下一个常州城，气得大骂他的将领无能，大骂英国军队无用。最后想出诱降之计，他张贴大字写成的布告，并让士兵临阵广为宣传，说明只要放下武器，自愿投降者，一律免死。在这死生交关之时，太平军有很多官兵动摇了。据记载，常州战役的后期，大批太平军官兵逃跑。投敌，每天投李鸿章大营的“约有三四百人”。于是，守城军大量减少，斗志也一下子松了下来。最后剩下少数官兵难以抵挡淮军和英国侵略者的猛烈进攻，敌人终于攻入了苏州城。然而，留下的数百名太平军官兵与敌人展开拼死搏斗，寸土必争。最后一直打到护王府，陈坤书指挥着只有30余人的队伍，杀死了一批批冲上来的敌人。打到最后只剩下陈坤书一个人。英人呤俐在他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记载说：“这时，他单独一个人和大批敌人鏖战，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我现在来哀悼他，虽然觉得无限悲伤，但同时也感到了骄傲。”呤俐是英国人，于咸丰十年（1860年）接触太平军，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动所感动，而加入革命队伍，参加过多次抗击清军和英法侵略者的战役。他这里对英勇抗敌的陈坤书及常州守军的记述和赞扬，是对太平军将士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公正评价。

王崇武等：《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241页。

呤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636页。

三十八 天国覆灭

江、浙大小城镇被清军逐一攻破，天京成了一座四面合围的孤城。

曾氏兄弟在苏、杭等地大战之时，加紧围攻天京城。早在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间，即距天京陷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天京的粮道就被湘军完全堵死，城内的吃粮一天比一天困难。当年冬天，洪秀全号召天京城内军民在城中空闲之地种麦、种菜，但是小麦要大半年才能收割，何况城中空地有限，无法解决吃粮问题。

在一无粮草，二无救兵的困难时刻，李秀成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63年12月21日），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方案。他说：“现在天京已被湘军团团包围了，城内吃粮已断，外面又无救兵到来。所以，唯一的选择是让城别走。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

洪秀全不同意李秀成的计划。城内的许多官员主动集中在一起，讨论是走是留，大家都认为李秀成“让城别走”是不得已的唯一出路。于是让李秀成再奏，李再恳求天王率众突围。洪秀全听后大怒，大声说：“朕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是九州万国唯一真主，何惧之有？尔畏死，尔就走。朕铁打江山，尔不扶助，有人扶助！”

李秀成还欲再奏，洪秀全立即宣布：“从现在开始，一天国政事不与尔于，朝政由勇王执掌，朝令由幼西王发出，有不遵令者，合朝诛之！”说罢，挥手令李秀成走开，并令他离开天京城。

后来，在众多官员的告求下，才将李秀成留在城内。

到同治三年二月（1864年3月）初，城内的可食之物俱被吃光，不少人被饿死。文武官员向洪秀全奏问对策，洪秀全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所谓“甜露”就是野草，洪秀全解释说：“甜露是上帝赐给的粮食，天京百草丛生，就是上帝准备有断粮的一天，留给百姓的粮食，从明天起，全城军民俱食甜露，其味甘甜如蜜。”

大家听了洪秀全的话，都茫然苦笑，齐说：“野草如何能吃？”洪秀全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于是，从第二天便带头吃野草做成的草团，大家也只好四处拔草，揉成草团充饥。但是，野草毕竟不是救人类命的“甜露”，洪秀全以野草代食，不久即病倒。他明知生命难保，天国将亡，拒绝看视，也不吃药，不久便逝世。逝世日期一说是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一说是四月二十九日（6月3日）。

洪秀全逝世后，其子洪天贵福即位，称幼天王。

南京为六朝古都，天下名城。它的城墙围长90里，高如三层楼房，城墙又宽又厚，可以并排通过二三十人的横队。城墙与江湖相接，只有通济门至太平门一带陆地。太平门外富贵山，是钟山南麓，左面地势甚高，右面地势极低，是进攻南京的极好地区。但是，太平军在远处修筑一座石垒，名曰，“天堡城”；在低处修筑一座石垒，名曰：“地堡城”（系在原基础上加固修筑），进攻南京只能在此下手。所以，争夺这两座堡垒成了攻守天京的胜败关键。

天堡城虽坚固，但目标突出。曾国荃命令萧孚泗、朱洪章以巨炮连日轰

《李秀成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45页。

勇王，即洪秀全二兄洪仁达，初封福王，后改此封。

击，以巨大的代价于同治三年一月二十一日（1864年2月28日）攻占了这“钟山第三峰”的南京制高点。天堡城攻陷后，曾国荃指挥军队一面在太平门东侧挖地道，准备以炸药炸塌城墙攻城；一面以重炮狂轰地堡城。然而，连续进攻几个月，地堡城仍旧固若金汤，岿然不动。地堡城攻不下来，太平门一带皆在此堡垒的火力控制之下，地道也就挖不成，湘军在地道口丢下数百具尸体也挖不通，弄得湘军将领一个个垂头丧气，急得曾国荃天天骂娘。

一座孤城，湘军包围了几年也攻不下。清政府越催越紧，多次命令别的军队前来助战，但曾氏兄弟不愿别人来染指攻破天京城的功劳。早在同治元年、二年（1862年、1863年），先后有英国人白齐文、迪佛立要来增援攻打天京，或要曾国藩也成立“洋枪队”，包打天京城，都被曾氏兄弟坚决拒绝。李鸿章攻陷苏州、常州后，顺理成章，应前来进攻南城。曾国荃知道了李鸿章欲来助战的消息，大为恼火，坚决不许。曾国藩虽也不愿李鸿章前来分功，但他的性格不像其九弟那般蛮横，心里倒怕自己兄弟吃了独食闹出乱子，便写信同“老九”商量。信中说：自军兴以来，胡林翼攻下了武汉、李续宾攻克了九江，曾国荃攻占过安庆、李鸿章克苏州、左宗棠克杭州，大家各得其功，其实颇平和。现在李鸿章又要前来助战，我看金陵一城，九弟与之各分其半，反而是好事，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早决计，不著痕迹。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也。”

曾国藩与他的九弟通信自然不必隐晦，他是说曾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怕生意外；再则是单独攻下了，功名太大，定会遭人嫉恨。

然而曾国荃却不听这一套，仍然不愿别人前来分功。

李鸿章当时也左右为难，一方面皇帝令他协助进攻天京，不敢违命，又碍着曾国藩的面子，又不能不表示帮助曾老九打天京；另一方面又深知曾国荃怕淮军前去分了他的功劳。经过连番写信试探，知道了曾氏兄弟的确不愿淮军前往，尤其是曾老九的态度强硬，誓死不愿别人分肥。于是主·动向朝廷上奏说：“曾国荃军两年围攻，一赏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粮，”因而请求清廷推延淮军进攻天京的时日。

然而，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各方面议论纷纷，一说曾氏兄弟为争天京之全功，拒绝他军前往，坏了大局；一说李鸿章眼看湘军攻不下金陵也不帮助。这两方面一激，首先是曾国藩害怕舆论及皇帝的责难，乃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上疏恳请“伤催李鸿章速赴金陵。”李鸿章怕被舆论斥之区分湘淮畛域，不愿助攻，也就向曾氏兄弟写信，决定立即派淮军刘士奇炮队，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27营陆军，会攻天京。

六月十五日（7月18日）曾国荃接到李鸿章派兵会攻的书信，当时他正在天堡城指挥湘军攻城，便将此信向身边大将宣读，大声说：“争功的人到了！我们艰苦奋斗两年多的肥肉，却要让别人来争吃吗？”众将一声回答：“不能，弟兄愿尽死力！”于是，连夜动员，决定第二天在李鸿章援军到达前攻进天京。

此时，地堡城已于日前被攻破。湘军把100多门大炮安于龙脖子山上，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6卷，第59页。

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

日夜不停地向城墙轰击，迫使太平军上不了城墙。湘军利用这个机会，抓紧挖掘地道。事亦凑巧，正好在李鸿章派兵助攻之信到达之日，即六月十五日把地道挖好。当夜，曾国荃动员第二天攻城，湘军即在地道末端的城墙下面装好了炸药。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上午，太平军发现湘军向地道运送炸药，曾派兵从太平门冲出，打算捣毁地道，但被湘军击退，未能达到目的。

当天中午，湘军攻城部队集合于地道口旁，准备引爆炸药后向城内冲杀。但究竟谁先打头阵？却迟迟解决不了。曾国荃向站在周围的将官们问了多少遍，谁也不回答。朱洪章忍不住提出：“如果谁也不肯自愿打头阵，就按职位高低排，职位高的打头阵！”当时萧孚泗是提督衔，职位在突击部队里是最高的，李臣典是总兵，职位是第二。萧低头不语，李臣典则说：“朱洪章所提甚是，我愿打头阵，但请把朱洪章的军队拨给我指挥！”朱洪章一听愤怒地回答：“我的军队拨给你指挥？难道我就不会指挥吗？”众营官立即起哄，把朱洪章推到第一队。朱洪章被逼着表态，当着曾国荃的面又不好拒绝回答，只得表示：“愿意打头阵！”曾国荃当众表扬了朱洪章，鼓励他奋勇当先，攻克金陵。

曾国荃安排了朱洪章、萧孚泗、刘连捷、李臣典、张诗日、熊登武、彭毓橘等部的作战任务，让他们各立军令状，“前进者赏，后退者罚诛！”然后下令点火。不料引信燃尽后，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原先没有估计到炸药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城墙炸倒后会不会伤着准备攻城的军队，由于估计不够，随着炸药爆炸，20余丈城墙被崩塌，朱洪章的先锋营400余人也全部被炸死。后面的大队人马踏尸而过，冲入被炸开的城墙缺口，立即遇到城内太平军战士的顽强抵抗，一阵肉搏，朱洪章的先头部队被消灭1000余人。

朱洪章曾写过：“精兵四百遭全没，壮士三千只半生！”就是攻破天京城时的真实情况。但是，尽管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奋勇抵抗，他们的抵抗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当时城内太平天国军队人等只有万余人，能战的战士仅不过三四千人。何况，天京城绝粮多日，他们早已饥疲无力了。自午至申战斗半日，天京九门皆破，天京最终陷落，历经14年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此失败了。

三十九 湘军劫城

围困几年的天京终于被攻陷了，这使每个湘军官兵的每根神经都极端兴奋。当时湘军士兵的普遍心理是，打下南京城后仗就打到头了，兵也当到头了，以后就是被遣散，有家的归家，无家的当流民、当土匪、做生意。无论遣散后做什么，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等着发赏吗，十几万湘军，每人得不了几个，要想有钱得自己去抢。没有一个湘军士兵不听说金陵古城本来金银财宝就多，加上太平天国奠都十几年，“长毛”四处抢的钱都积在天京城里了。因为洪秀全不让太平军有私产，所以，都作好准备攻下城来抢个够，也不在当兵打了这么多年仗。

抢掠是主要目的，但攻进城后先得杀人，杀不光城里的人，钱是轻易拿不到的，因为活着的太平军都在反抗。

曾国荃部湘军本来就是杀人成性的。入得城来，便使天京变成了一座杀人场。不管是太平军战士还是无辜市民，只要遇上的，全部以刀枪相向。据记载：城破时，城中总计3万人，太平军战士不过1万，随李秀成突围而走者千余人，利用各种机会逃走者也不在少数。所以，死在湘军刀枪之下者，绝大部分是老百姓。

几万百姓。数千太平军，在几天之内被湘军杀光。当时正是南京城流火炼金的季节，湘军只顾杀人，抢劫，被杀的尸体腐败无人过问，大街小巷，“尸骸塞路，臭不可闻”，“秦淮河上，尸首如麻”。这是赵烈文、曾国藩自己说的。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着想，对湘军的乱杀无辜，十分不满。因此，他不断指责曾国荃，不可让湘军这么乱杀、乱抢、奸淫下去。他在当时所记的日记中，大量记下湘军的杀人情况。他说：湘军杀死的太平军却有限，数万人中，百姓居多、老幼妇女居多，“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所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像赵烈文这般对湘军图谋抢劫而血洗天京行为不满者，在统治者中也不为少数。曾国藩见议论沸腾，怕对他们不利，赶忙上奏皇帝，掩盖屠杀无辜百姓的事实，同时又要夸大湘军入城的“战功”，谎报说：“湘军入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十余万”。

湘军的兽行更在天京妇女身上尽情发泄。赵烈文所说“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就是揭露湘军把40岁以下的妇女全部抢掠奸淫了。有的被强拉进营房。居室糟踏，有的被掠走他乡，霸占、贩卖，甚至在大街上“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赵烈文是曾国藩的谋士，是目击湘军犯罪的无可辩驳的见证人。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湘军淫掳妇女的大量例子。其中，不光太平军的家属、南京城内的和平居民，连反对太平军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妇女，也难免于难。一名叫做黄淑华的少女，颇有文化，被湘军掳往湖南湘乡，同时被掳者多人。黄姓少女以其机智，杀死了掳她的湘勇，而后悬梁自尽，她的家庭便是反对太平军的。有的人明系拥护湘军的，但不仅被湘军抢掠，妻女被掳走，反被诬指为“余党”，只好自任倒霉。

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三日。

《曾文正公奏稿》，第20卷，第31页。

湘军大肆杀戮天京军民，一是出于对太平天国的仇恨，主要还是为了抢掠财物。城破后，湘军抢劫天京 10 余日。开始抢劫的目标是诸王王府，王府抢空了，就是逐户抢劫市民百姓。后来则是挖地拆屋，掘坟开墓。在劫财过程中，不仅杀死财产的主人，而且相互争夺火并。当时整个天京城都是湘军忙着搜寻财物，大街上挤满肩挑手提，结队成群抢劫而归的湘军士兵。一些不敢参加抢劫的文员，就出钱争购士兵抢来的赃物。

湘军在抢掠天京时都发了财。抢劫之后，用船装满财物运往湖南，长江之中千船万闸，日夜川流不息。自然，发财大小，也是因官职高低而有区别。因为抢得的赃物，必须逐级进贡。湘军将领萧孚泗、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张诗日等人却因个人抢掠和官兵的进贡而成了巨富。攻陷天京的统帅是曾国荃，纵容、制造天京大抢劫的罪魁就是曾国荃，财发得最大的也是曾国荃。曾国荃所以冒许多艰险进围天京，拒绝援助，目的之一便是要独吞天京的财物。所以打破天京后，他便放纵湘军肆意抢掠。

受曾国藩委托前来天京的赵烈文；自天京攻破之日便直接请曾国荃出面，制止杀掠，加强防卫，别让太平军，尤其是李秀成、洪天贵福等人趁乱逃离，无法向皇帝交待，曾国荃拒不接受。后来弄得太不像话，湘军之间互相争掠、火并。赵烈文来拟条文，让曾国荃签字，曾氏仅同意部分条文，签署市告，禁杀良民、禁掠妇女。结果，遭到湘军大将们的普遍反对，大骂赵烈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曾国荃碍着哥哥的面子不好对赵烈文怎么样，但也对赵极为不满，闹僵了关系。

由于层层进贡的原因，曾国荃在这场无耻的杀掠中，是受益最大的一个。他到底得了多少财物，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当时的局面混乱，又是鼠窃狗偷，也无从统计。不少史书估计说，曾氏“于此中获资数千万”。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就说她九叔“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由于曾国荃把湘军抢劫进贡给他的银钱回乡抢购田产，使舆论沸扬，称之为“老饕”。清政府知道了曾国荃的情况，下令追问天京“贮金”的下落，曾国藩则为其九弟鸣冤，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事实证明，曾国荃被人们称为抢掠天京及安庆等城的“老饕”一点也不冤枉。

至于李臣典、萧孚泗、朱洪章之流，更是奸淫掳掠的无耻之徒。李臣典攻破天京，日夜奸淫妇女，终因淫乱过度致病，10 余天后便一命呜呼，死年仅 27 岁。李臣典、萧孚泗、朱洪章等虽攻城有功，但因其抢掠罪名太坏，连统治者们都对他们非常反感，不愿为之加官封赏，只是确因攻城“有功”，才不得不封，封后舆论反应也极为强烈，弄得曾国藩极为被动。

为了掩盖他们抢掠的罪迹，曾国荃以下将官攻进城去，一面杀人、抢劫，一面四处放火，焚烧房屋。初次入城，太平军与敌进行了顽强的决斗。当守军及城内官民感到必死无疑时，也放火自焚，并焚烧房屋财产，打算与城俱焚，让曾国荃抢劫财物之用心落空。但是，这种情况很快便结束，因为抵抗者当天基本就被杀害得差不多了。随后才是湘军的抢劫、杀人。为了销灭赃证，随之而来的便是放火焚城。大火一直烧了 10 几天，自六月二十六日（7 月 19 日）点燃大火，烧到六月十四日（7 月 27 日），因为天降大雨，才慢慢熄灭。

经过杀、掠、焚烧，使这座六朝古都、江南名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四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连一株完好的树木也找不到了。李鸿章、何绍基、赵烈文，甚至连曾国藩看了南京被毁的情景，都感慨万端，认为自南京成其规模以来，被毁之程度，从来没有这么严重，以致于不打算在这里置两江总督署，而不如移署于扬州了。可见南京被湘军破坏得何等严重。

四十 自惕自概

随着湘军全胜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国藩却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在思考当金陵被克之后，自己与清政府的关系将如何处置，想到历史上大臣“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例子，真是不寒而栗。

远在曾国荃与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禁绝骄满，随时准备急流勇退。观其家书，他告诫曾国荃的书信日多一日。如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五日，他给雨花台大营中的曾国荃兄弟去信说：现在是咱们家的鼎盛之时，兄弟们非督即抚，近世能有几家得此殊恩？但“日中则昃，日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即粮食装满斗斛，人就要削平它——引者）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自概之。”

这封信写得很长，曾国藩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概，把好“廉、谦、劳”三字，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不要把祖宗留下的福份，让我们享尽，要时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

此后，他一天天惶恐不安，几乎感到末日将至，说不上皇帝哪一天就要加之斧钺。同年六月二十日（7月16日）给曾国荃的信中又说：“阿兄永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者极少，深恐我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

后因与沈葆楨争夺江西厘金，舆论说他“恃功骄蹇”。他给好友郭嵩焘去信说：“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他说的“毅然行之”，就是要急流勇退，辞职告退，于是便有当年要求引退的奏疏。就当时与沈氏争饷论文，确有借引退赌气要挟清廷之意，但亦兼有引退求善终之心。他同时给曾国荃、李鸿章等人多次去信，皆认为古来处大位、揽大权者没有几个可以“善其末路”的，现在户部发来“部文”，已疑自己“广揽利权”，看来谤忌已生，“凶于国而害于家”的下场即将到来，等到“金陵克复，拟退引退”。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口，无论如何也排解不掉，他身在安庆，而心在天京战场，日夜盼望天京被他的军队攻下来，也了却多年的宿愿。但是，攻下天京来又正好是他估计的“日中”、“月盈”之时，也是他等待的最可怕的日子。这种自相矛盾的时日，荣辱俱至的时日，正是压在他心头上难以排解的巨石。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国藩终于接到曾国荃攻克天京的急信。据说，那种既怕又喜的心理压力，使他的手颤抖得打不开信来；而看信之后，那种且惊且惧的心情，使他晕了过去。随之是“绕室彷徨，彻夜不眠”，思考着应付的办法。

《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39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7页。

那些天，许多朋友为攻破天京或登门祝贺，或捎书传信为曾氏兄弟庆祝、贺喜。而他的朋友窦垵却提醒他说：“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何如，于民何如，于家何如，于身何如，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图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使他读了更加心惊肉跳，更加深思着如何“退让”，如何“持盈保泰”的办法。

然而，天京攻克了，他还得按部就班，先以曾国荃信上写的攻城。杀“贼”等情节，向皇帝拟《报捷折》。以后的几天，曾国荃随时都送来大叠大叠的信件，曾国藩虽未临战，也知道了破城的详情。他的报捷折。保举折都是综合南京送来的信件写成的。

奏折发出去后，曾国藩等着清廷的批复，他急待知道清政府的态度。

六月二十四日（7月27日），终于等来了上谕。此篇上谕，是皇太后。皇帝看了曾国藩奏报后当日发出的，为湘军攻克天京而称贺，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接旨后，于当天乘轮赴南京视察。他要了解被攻破的金陵的具体情况，要亲自审问“长毛”的紧要人物李秀成，要劝说曾国荃如何闯过“功高震主”这一关。

在审讯李秀成的过程中，他知道了攻破天京时太平军的实际人数，并不像曾国荃所说的金陵城内的10万太平军，被湘军全部杀毙了。同时了解到幼主洪天贵福在湘军大肆抢掠，秩序混乱之际逃出金陵，亦不像曾国荃所说，已在城破时“举火自焚”。李秀成还供认：天京城内有“圣库”、有金银珠宝的窖藏等，这些情况与自己的奏报大不相符。这些情况，如果被清廷审问知道了，将成为他“欺君罔上”的罪证。于是他宁可违背将李秀成押送京师的旨意，在七月六日（8月7日）将李秀成杀害，并大量涂改了《李秀成自述》，以掩盖湘军抢掠财物的罪证，掩盖他们屡屡谎报军情的欺君行为。

曾国藩亲眼看到金陵各城被自己的军队焚烧、破坏的惨状，感慨地说：“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他还亲眼见到湘军官兵尚在继续搜寻财物的卑劣行径；见到湘军将领们抢掠私藏的大量财物；见到湘军营内私藏的大批妇女。尤其亲眼见到李臣典奸淫妇女过度而致病的情景，亲至其营内看望他，并眼看着这个无耻之徒死去。

曾国藩看了浩劫之后金陵的惨景，看了湘军官兵势同强盗的情景，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深刻地了解自己的“九弟”，了解他率带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不理解月亏水溢的道理，他们只知争功抢掠。思之再四，他决心先为自己的九弟找一条通向安全岛的路子。

在满目凄凉的天京城里，在熊熊大火尚在燃烧之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将领们拜接了清廷新颁的上谕。上谕对曾国藩封赏没有变化，还是在安庆临行前看到的上谕内容，只是增加了一段军兴以来的“勋绩”表彰。而后是对曾国荃的“功绩”的表彰，封其为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接着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刘连捷、张诗日、彭毓橘等加封骑都尉或轻车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赏却分两道上谕。在另一道上谕里，对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都兴阿、左宗棠、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咸同朝函札汇存》，《窦垵致曾国藩函》。

《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13页。

葆楨及江宁将军富明阿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赏赐不比曾国荃等低。如僧格林沁加封贝勒一名，由其子受封（前已封亲王）；官文加封伯爵，本支抬旗；李鸿章加封伯爵等。

曾国荃对自己的封赏并不满意，牢骚话刚一出口，又一道上谕发到，直接点了他的名，指责他“指挥失宜，遂使伪忠酋夹带伪幼主一千余人，从太平门缺口突出”；并指责曾国藩奏报幼天王“积薪自焚”情况失真，责令他惩罚防守缺口不力人员；还说“金陵城陷于贼中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勒令曾国藩查清报部，以备拨用。上谕中杀机毕露之处是：“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曾国藩担心的事情在这篇上谕中全部出现了：朝廷追要幼天王等逃失人犯、谎报军情、追要天京“如海”的金银、惩处防守不严之人、指责曾国荃“骤胜而骄”。做不到这一切就难以“永保勋名”，也就不能“长承恩眷”。

曾国藩被这一纸上谕惊得热汗直流。看来，再不“自惕自概”，就将被太后“概之”、皇帝“概之”了。

四十一 自解兵权

听完上谕，粗野骄横的曾国荃连惊带气，病倒在军营里。

曾国藩看望弟弟，老九一把拉住哥哥，委屈、愤恨得欲哭无泪。曾国藩见他并无多大病，乘机狠劝了弟弟一通。曾国荃不知深浅，只怪清政府奖赏不公，以为自己率领湘军围攻金陵几年，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处，同“长毛”拼过无数次血仗，死了千百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了一身不是。最让他不理解的是，金陵城破，只逃走千余名太平军就要严加惩办，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率数万太平军逃出城去，左宗棠为何未受指责？

曾国荃一提左宗棠，顿时触动了曾国藩的痛处。他根据曾国荃的报告，上奏说幼天王“积薪自焚”，而皇帝的“上谕”中说根据浙江方面奏报，幼天王由天京逃出。浙江方面的奏报，一定是左宗棠了，自己对左氏不薄，何以在此时告自己的黑状！

曾国藩的猜测是对的，没过几天左宗棠也就写信告诉他，说是从难民中得知洪天贵福由李秀成等保护逃出城去。然而，左宗棠为何要上报皇帝呢？这位与自己相交 30 年的老朋友，在这么大的事情上不仅对自己毫不留情面，反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最让曾氏兄弟难办的是，皇帝勒令他们查清金陵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曾国荃实告哥哥：金银确是不少，但城破以来，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在各自的腰包，多数已运回老家了，如何还能“查清”，又如何“报部”？

“况且，还要我们把李秀成、洪仁达押送京师。这两个人已被杀死了，如何送得去！”曾国荃越说越气，下得床来，摩拳擦掌。据传闻，就在这次谈话中，曾国荃要让哥哥学赵匡胤，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说：“皇帝逼得这么紧，湘军上下怨声载道。我的吉字营 5 万，彭玉麟、杨载福水师 2 万，鲍超、张运兰、萧启江共 5 万。这 10 余万人马，八旗、绿营都不是我们的敌手！”

曾国藩没等弟弟说完就坚决地止住了曾国荃再讲下去。他知道，曾国荃的话若被人听去告发，就会立即遭来灭族之祸。曾国藩以他对清朝 200 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经历，深知清政府虽对洋人的欺凌。对吏治的败坏、对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束手无策，但对汉官的防范制裁，却是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虽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占着优势，但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楨，早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支利芒。湘军号称 30 万，他能调动的只有十余万人。这十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与他的关系不错，但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李鸿章不一定会像彭玉麟那样对他死心追随，很可能会站到清政府那边去。

即使黄袍加身了，恐怕就真的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心高气傲、倔强狠毒，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少倍。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夺走。“烛光斧影，千古之谜”，也许老九就是当今的赵光义。

他转念再想，金陵被湘军攻下来了，“长毛”闹得清政府束手无策，也

是被湘军打败的。金陵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颜色看，其实这并不为怪，清廷建制 200 多年，有几个像曾氏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曾老九的要学赵匡胤，正说明清政府防范得有因，假若自己同意了老九的计划，就说明太后与皇上料事之准了。可是，曾国藩不会违背“忠君敬上”的儒家信条，如今虽受了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自己则不会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国藩思之再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手中这十几万军队。当时就有人言：“3000 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是啊，这是清朝开国从来没有的事。怎能令太后、皇上心安意舒？湘军原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长毛”起事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了。他回忆这些天见到的湘军从营官到士兵的表现，知道这支军队也真该解散了。“嗯，裁去他一大半，一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二是自己也甩去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是曾国藩与他的九弟谈话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

决定后立即向清廷奏请裁军一事，清政府很快批准，但提出不可裁撤太骤，恐遣散之勇聚众闹事，要曾国藩将精壮之兵留下补充绿营。但曾国藩未予理睬，于七月二十日（8 月 21 日）下令裁撤江宁吉字营湘军 2.5 万人。裁军问题进展并不顺利，其将领皆依军队自重，所以，曾国藩未采纳清廷“留精壮补绿营”的意见，而采纳了不可“骤裁”的意见，陆续将湘军裁撤。

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 7 万余人，鲍超、周宽世 2 万余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楨指挥了，手中仅余曾国荃统领的 5 万余人，正是清政府不放心的军队。七月二十日（8 月 21 日）先裁 2.5 万人，留 1 万人守江宁，1.5 万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二月（1865 年）3 月，守城部队仅余 2000 人，城外的游击之师也所余无几。再到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国藩手中除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少量湘军，基本再无军队了。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曾国藩在清政府逼令他交出金陵金银之时，他一面上奏金陵城确无金银可以“报部拨用”；一面上奏停解湘军军饷，用以作为交换条件。

当年七月二十日，奏请裁军，七月二十九日（8 月 30 日）即奏请停解湘军军饷，第一笔是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同治元年（1862 年）以来，即供金陵围城军 120 万两。曾氏请求停解，正说明他的诚意。清政府接到他的奏折后，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国藩可留其三成作饷，也被他拒绝留用。

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的军饷，即前不久同沈葆楨争夺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因鲍超、周宽世两军赴援江西，停解南京的江西厘金大部改供鲍超等军了。

随后，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所谓“东征厘金”，是咸丰十年（1860 年）湘军围攻安庆时向湖南加派的军饷。当曾国藩奏请停收、停解时，升为陕甘总督的杨载福奏请将“东征厘”改为“西征厘”。当时爆发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急于镇压，就同意了杨载福的奏请。但曾国藩坚决不同意再收湖南厘金，要求撤销当年由他申请成立的“东征局”。后经反复争吵、榷商，将湖南厘金改为“厘票”，撤销“东征局”，由湖南省主持把

部分“厘票”接济杨载福。

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在奏撤湘军、停解军饷的同时，曾国藩又于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64年9月27日）上奏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这份奏疏是曾国藩在金陵月余后再回安庆时上奏的。原来此时朝野上下舆论沸腾，皆言曾国荃为“老饕”。御史朱镇、廖世民、蔡寿祺三人上奏折弹劾曾国荃、曾国藩及湘军将领们占军政高位，乘时而起，实非国家之福，而将为国家之患。罗列曾国荃及湘军将领抢掠金陵，湘军士兵虐害地方的种种罪行。要求朝廷对曾氏兄弟及湘军将领进行调查、惩处。

曾国藩阅罢三御史的弹劾奏章，立即派人给曾国荃送信，要他作好准备，辞官开缺回籍。同时上奏朝廷，代曾国荃申请开缺。

曾国藩上奏的第8天，即九月五日（10月5日），清廷便批复了准曾国荃开缺的上谕，可见当时清政府对曾国荃的恶感和不放心。一般地说，曾国荃攻克金陵，战功赫赫，身为巡抚之职，又是曾国藩的亲弟弟，即使有意开缺，总要客气一番的。

同治三年九月八日（1864年10月8日），曾国藩由安庆回金陵，正式将两江总督衙门设于原英王府。满堂宾客，共庆典礼。盛会之上，曾国荃以大功不赏，反被逼令开缺回籍，三杯酒下肚后又哭又闹，搅得盛典难成，曾国藩也狼狈万状，“直无地置面目”。为了安慰弟弟，在他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派赵烈文登门劝慰，并写了十几首诗为之庆寿。诗篇记述了曾氏兄弟创办湘军，为清廷征战10余载，讨平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创立了丰功伟绩，但却遭到嫉谤，所谓“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他劝曾国荃暂且回籍修养，不必把开缺一事看得过重。但写诗的曾国藩毕竟也是心有不平，万般委屈虽能安慰弟弟，但诗篇里却饱含了无限怨愤和伤感。当曾国荃读到“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几句时，他想到自己征战多年，身上满带刀箭之伤，兄长知道，自己知道，然而苍天是否知道？而嫉恨者不知自己和湘军兄弟征战之苦，却诋毁咒骂，使自己得到了如此结果，满腹的委屈和痛苦，使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十月四日（11月2日），曾国荃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地返回湖南老家。回籍后“杜门谢客，以书帖自娱”。当时太平军虽大致被镇压，但捻军复起，西北回民起义复起，天下并未太平，清政府在曾国荃回籍数月后，又下旨令其“入京陛见”，第二年又简授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坚辞，不肯从命。后来虽勉强接受了湖北巡抚，不久又借故辞归，再不像围攻金陵时那般替清政府卖命了。

四十二 无兵不帅

清政府利用曾国藩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又怕湘军兵力太重，同样为其统治造成威胁，故迫令曾国藩自解兵权，裁撤了湘军。岂料太平军甫败，捻军起义又在豫、皖、鲁中州广阔的平原上发动起来。清廷再四派兵镇压不下，不得不再度调曾国藩。曾国藩始以无兵不帅而拒绝出征；后迫于严令，再度出战，终因湘军遣散，无兵可用而遭到挫折和失败。

捻军由捻和捻党发展而来。捻，是淮北方言，即把少数人捻合为一团，犹如东北人说的“抱团”。康熙年间，淮北淝水、涡河流域的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常“捻合”一批青壮年贩卖私盐。卖私盐为政府所不许，要遭捉拿。为了对抗政府捕拿，遂发展为武装反抗行为的“捻党”，小捻党数十人一群，大捻党数百人一伙。由于历久为政府不容，也就自然成了反清的松散武装组织。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捻党大力响应，发展为有统一指挥和领导的捻军，开展武装反清斗争，成为太平军的盟友。尤其是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陈玉成经略安徽，主要得到了捻军的支持。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失守，陈玉成兵败牺牲，捻军孤立无援，受到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之一部退至鄂、豫、皖地区，与群龙无首的捻军联合，使捻军再度兴起。

捻军的领导人主要是太平天国名将遵王赖文光，他是陈玉成军队中少有的文武兼备的起义领导者，咸丰十一年（1861年）随陈得才远征西北。太平天国失败、陈得才牺牲后，他在江北把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领导的几支捻军团结在自己周围，吸收蒙、亳地区广大反抗群众和失散的太平军，组织新的抗清力量，坚持斗争。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组织原则，改编捻军，使之成为一支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同时，又改变了太平军固守一城一地的战略，以大规模运动战打击清军。以此战略原则，捻军大量发展骑兵，改善装备，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往往以精骑袭击清兵。作战时万骑包装，急如狂飙，使敌人仓促之间无法应付；退走时急走如飞，敌人追之不及，使清政府甚感头疼。

捻军在中原响应太平军，清政府用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兵镇压。在陈玉成牺牲后的一段，僧格林沁利用捻军孤立无援之机发动攻势，一举攻陷捻军根据地安徽蒙城县雒河集，捕杀捻军领袖张洛行，血洗了蒙城、亳州。清政府以其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和“剿捻”有功，将他由科尔沁郡王格升为亲王，并屡受嘉奖。僧格林沁骄横跋扈，他率领的蒙古骑兵是清廷赖以维护统治地位的“长城”。因八旗，绿营皆被太平军摧毁，不被清廷信任的汉人地方武装湘军兴起，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又成为清政府用以抵制湘军的唯一武装力量。

僧格林沁自以为蒙古骑兵天下无敌，又深知清政府倚重自己，对抗汉族地方军队。所以他对湘军和后起的淮军统统不放在眼里，在共同对抗捻军与太平军时，就经常制造摩擦，欺压湘军，经常向清政府告湘军及其将领的黑状。平日里曾国藩明知僧格林沁对湘军寻衅，但自己处于劣势，只能忍气吞声。湘军攻克金陵，大肆焚掠，清政府对湘军施加压力，也主要依靠手中有僧格林沁这张王牌。

当赖文光整编捻军之后，清军仍派僧格林沁进行镇压。僧格林沁骄横狂妄，对捻军穷追猛攻，企图一举歼灭。捻军灵活作战，利用战机，采取各种

战术，不断给以回击，使僧格林沁火气冲天，跟在捻军后面日夜穷追，赖文光决心利用他的急躁情绪，予以狠狠打击。同治四年（1865年）春夏之交，僧格林沁盯住捻军不放，从河南追至山东。捻军故意引其上钩，使他一气追了数千里，远远离开了自己的主力部队，只率少数骑兵追击，结果，在山东曹州陷入捻军的伏击圈。四月二十四日（5月18日）菏泽高楼寨一战，被捻军击毙。

起初，清廷只想让僧格林沁“剿捻”，以其镇压捻军以功与湘淮军抗衡，提高清廷贵族的威望。后见僧格林沁鲁莽从事，屡遭捻军的打击，又想让湘淮军助攻，以达湘淮苦战，僧格林沁收功之目的。早在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赖文光在湖北蕲水打败清军，击毙清将石清吉，包围成大吉于蕲北，清廷急调曾国藩赴援。

当时正值朝廷对湘军施加压力，湘军已在裁撤，曾国荃也被批准开缺回籍，曾国藩自然不会赴援。即使想去援助，当时湘军正在裁撤期间，人心混乱，敌意很大，也难以征调。所以，曾国藩于十月二十二日（11月20日）上奏清廷，以自己难以胜任指挥“剿捻”之任，拒绝前往。不久，捻军解围而去，才免于僵持下去。而清廷又令湘军刘连捷、淮军刘铭传赴河南“剿捻”，由僧格林沁指挥。曾国藩接到命令，立即上奏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正拟遣散，不宜北调。清廷见奏，只得令刘铭传一军赴河南。但僧格林沁公然贬低湘淮军“皆不能战”，拒绝接受，曾国藩则顺水推舟，连刘铭传一军也未派遣。湘淮军不参加“剿捻”，蒙古骑兵孤军作战，遂连遭捻军打击，最后僧格林沁被打死在山东菏泽。

僧格林沁被击毙，清廷大为震惊，只好再令曾国藩率湘淮军北上“剿捻”。同治四年五月五日（1865年5月29日），曾国藩接到清政府的命令，让他“星夜出省，赶赴山东”，到僧格林沁被歼的地点去“剿捻”。生怕曾国藩手中无兵，不愿北上，接着又给他指挥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八旗、绿营各军的大权。后又连连发布谕旨，催他启程。清政府最担心捻军击毙僧格林沁后渡黄河、攻击北京。当时，北京一片恐慌气氛，连京城内的警卫部队、神机营等军都调动起来，准备抵御捻军的袭击了。

但曾国藩的心情与清政府正好相反，他一方面暗恨清廷对他太过份，迫他遣散了湘军，手中无兵，难再作战。这时他给回籍的九弟曾国荃去信说：“连他保奏湘军在皖南、金陵作战的有功人员的几个“保案”，皆被吏部驳回，其他的一些小事，也动不动遭到驳洁，“于任事有功之臣，责备甚苛，措辞甚厉，令人寒心”，自然不愿在这个当口出师作战。另一方面，前不久宫廷发生了慈禧太后与奕訢的一场争斗，其中很大程度因曾国藩而起，也使他不愿马上北上“剿捻”。

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年3月30日），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向慈禧上疏，公然弹劾议政王奕訢。蔡是胜保的旧人，与太监安得海有私交，从安处得知慈禧恼恨恭亲王，欲寻隙谴责之。于是，罗织了奕訢的一些罪名，上奏慈禧，妄图借机博取皇太后的欢心。蔡的折子并未举出多少事例，只是宠统攻击奕訢“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也未明白指出与曾国藩的关系。但其中内幕都是另一回事。原来，自湘军兴起，曾国藩等汉员得到重用后，

《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26页。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慈禧与奕訢对此持有不同政见。奕訢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大胆放权，任用湘淮军等镇压农民起义，而慈禧则不以为然。金陵攻破后，慈禧欲借舆论根除曾国藩等隐患，奕訢不同意。蔡寿祺从安得海处得知此情，先上一疏，集中攻击曾国藩。此折关系甚大，慈禧与奕訢看法不同，只好“留中不发”。蔡见一箭不中，于是又上一折，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上了恭亲王。

据说，慈禧把蔡的奏折捏在手里，向奕訢摊牌，二人争吵得很厉害。史书这样记述：太后责难奕訢用汉人说：“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奕訢不服，反说蔡寿祺“不是好人，有案未消，应该拿问”。慈禧气愤的大叫：“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奕訢也不示弱，回答道：“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他原来是跪在太皇面前的，说着站了起来。慈禧见状大呼恭王要打她，太监将恭王趋出。

接着，慈禧亲拟懿旨，召集军机，革去奕訢“议政王”号，并不许其干预政事。然后，军机大臣个个反对，唯有倭仁表示支持慈禧。最后弄得朝中大动干戈，慈禧只能折衷从事，革除了“议政王”号，保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

这次政潮因恭亲王任用曾国藩等汉员而起，牵连曾国荃、刘蓉，李元度等湘军将领和其他汉官。曾国藩闻讯非常害怕，以为政潮的结果，恭王不可能得胜，而将使汉员的职位不保，或遭更大不测，于是同彭玉麟等人密议对策。彭听后“愤恨欲死”，“喷火中烧”，当时就要具折弹劾蔡寿祺和倭仁，申明大义，曾国藩劝而止之。曾还写信告诉曾国荃等家里人，要准备好接受一切不测的打击。慈禧太后对汉员和湘淮军如此态度，曾国藩当然不肯出师“剿捻”了。

后来，形势突然变化，僧格林沁被打死，捻军大振，慈禧太后在此紧要关头，又不得不迭次催促曾国藩北上“剿捻”。曾国藩见清廷发生的政潮过去，恭亲王未被斥罢，也未有牵连汉员之迹象，在清廷的反复催逼下，才勉强受命，踏上了步步夫招的“剿捻”败局。

董守义著：《恭亲王奕訢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0 页。

《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四十三 客军难驭

曾国藩奉命“剿捻”，先后征战2年，最后无功而回，写下了这位“中兴名臣”败走麦城的记录。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湘军裁撤后手中无兵，“剿捻”之师多为客军，不听驾驭，指挥失灵，造成他的巨大失败。

曾国藩再四推辞“剿捻”之任而不获准，只得勉强出师。

出师前后，他对捻军的特点、僧格林沁的战略战术的得失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认准捻军的特点是骑兵为主，战略原则是流动作战。他们精骑数万，行动迅速，行踪遍及鄂、豫、皖、苏、鲁5省，忽南忽北，极难捕捉其主力踪迹。他接受僧格林沁穷追不舍的战略失误教训，改为“以静制动”的方略。于出师后20余日后向清廷上奏“剿捻之策”，其内容之一是“剿捻”部队与地方配合，北起黄河，南至沙河、淮河，东起运河，西至贾鲁河，包括鲁、苏、豫、皖4省13府州县为战区，此外由各地方督抚配合部队作战；其二是军事进攻与政治清查相配合，他认为“捻”军与百姓关系甚密，若发动地方地主武装，开展清查运动，割断捻军与百姓的联系，使捻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断绝粮草供应；其三是采取追剿与拦截相结合的作战原则，以水师拒黄河，防止捻军入直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镇驻重兵，另筹两支精锐游击捻军。

曾国藩毕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老手，他把镇压太平军的经验、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用在“剿捻”之上，他制定的上述战略无疑是正确而恶毒的。

然而，要落实上述计划，在黄、淮之间的广袤地区与流动作战的捻军周旋，急需要能征惯战的，得心应手的军队。可是，这些军队从何而来呢？

这时，他多么怀念过去自己手中的10万湘军啊！然而，湘军的历史毕竟一去难返了。现在，经过一再裁撤之后，手中可供调遣的湘军只有刘松山、易开俊统带的2000余人。这点军队。一听说要北上与捻军作战，皆纷纷反对。刘松山杀了几个反对的士兵，才勉强带走。在北进途中仍然不断逃跑、鼓噪，带过黄河故道后，只剩了一半人马。另一支军队是由江宁驻防军和临时去湖南招募的新兵，凑成2000人，由张诗日率领作为亲兵，其中最少数在半数以上也是被逼迫前行的。

湘军的“光辉历史”已划了句号，主力只能是淮军。而淮军如湘军一样，亦属军阀性质，没有李鸿章指挥，即使是曾国藩也驾驭不动。曾国藩调集的淮军是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四支部队，共计2.2万人。为方便指挥，他又奏调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管理营务，另一弟李昭庆协助军务。尽管如此，淮军仍难驾驭，成为后来“剿捻”失败的主要原因。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自江宁动身，准备赴徐州建立“剿捻”老营。因捻军围雒河集而改道临淮关，指挥解雒河之围。并急调已赴山东济宁的刘铭传回师，配合刘松山来皖北作战。

捻军见曾国藩指挥湘淮军前来解围，便主动撤离雒河集，兵分两支，一支由张宗禹率领，进入河南西部；一支由赖文光率领，转入湖北东部地区。

捻军的部署改变后，曾国藩也改变攻守方向：指令刘铭传驻周口、刘松山驻临淮、张树声与周盛波驻徐州、调僧格林沁的部将陈国瑞去清江浦。

但是部队尚未调集，陈国瑞与刘铭传两军便大打出手。僧军与淮军皆不奉调，使他一出师便遇上指挥失灵的兵家大忌。

陈国瑞是僧格林沁麾下的著名悍将，也是僧军败后保留完整的一支军队的统领。他是湖北应城人，幼孤，10余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后投降清军，被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因对捻军、太平军作战勇敢，先后升力都司、游击、总兵，并随袁甲三、吴棠、僧格林沁各部作战。陈国瑞身材短小，打仗时常穿红盔红甲，勇悍冠三军，人称为“红孩儿”。同治二年（1863年），苗沛霖叛清，清廷命陈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主攻苗沛霖。他冒苗军之弹雨，反复冲杀，败苗军而杀死苗沛霖，因功升为记名提督，赏三代一品封典，慈禧亲赏各种珍品。僧格林沁追赶捻军时，他尾随其后，差一时未达，来不及救援，僧氏即被打死，他大呼闯入捻军马队，夺得僧格林沁尸体。

僧军败后，山东巡抚阎敬铭、布政使丁宝桢以下文武皆以赴援不力获罪，遭到发遣、革职，降调等不同处分，唯陈国瑞以战功素著免于处分，仍以总兵帮办军务，并代领僧格林沁残部，护理钦差大臣关防，驻扎于济宁。

曾国藩出师后，先派刘铭传一军赴济宁。刘军抵达后，见陈国瑞尚驻济宁城，只得扎营于济宁城北的长沟集。

陈国瑞一向被袁甲三、吴棠、僧格林沁骄惯，依为长城，故而暴戾成性，也不把湘淮军看在眼里。对刘铭传的到来十分憎恶，又对刘军的洋枪垂涎，想要强行夺取。于是，点起500名兄弟突袭刘铭传营寨，杀死数十名淮军，抢走300多条洋枪，回营而去。

陈国瑞杀人抢枪时刘铭传不在营内，第二天得知此事，自然不肯罢休。刘铭传与陈国瑞的地位、脾气相似，在淮军里也是拔尖的人物，为李鸿章倚重。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淮北，自幼天不怕地不怕，因聚党贩私盐与官兵打斗，吓死了他的母亲。后据寨为王，投者甚众，拉起了一支人马。李氏兄弟办团练，第一个便招其入团练，后成为淮军人马最多、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也最好的一军。陈国瑞一个败兵之将，敢于到他营中杀人抢枪，简直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他也点起大队人马，突入陈国瑞的军营，逢人便杀，陈之亲兵反抗，其500人全被“铭军”杀死，并活捉了陈国瑞，押进长沟集。刘铭传亲审陈国瑞，狠狠地鞭打他，痛骂他是“长毛贼”。而后把他锁在黑屋里，整整饿他3天。直到陈国瑞告饶，刘铭传才把他放回济宁。

二人火并之后，又先后到曾国藩面前相互告状。曾国藩出师以来，一个捻军没“剿”到，却发生了两军火并，杀死数百人的内部纠纷。这使他又气又恼，当时正在用人用兵之际，又不好对刘、陈怎么样。陈国瑞蛮横骄悍，先杀人抢枪，本该治罪，但此人为清政府倚重，僧军又要靠他招集，对他不能惩处。刘铭传率军攻打对方的营寨，杀死陈军500多人，虽是后发，罪也不轻。但刘军是北上“剿捻”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生杀之权又在李鸿章，他更不能将其治罪。最使他头疼的是，“剿捻”之始就发生内部大打出手，互杀数百人之多，这是他带兵十几年从未发生的棘手恶性事件，也足以说明他在诸军中并无控驭能力。

事因陈国瑞而起，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开导这位骄将。他在陈的状子上写了数千字，历数其半生功罪，劝他改过从善，命他率兵火速开赴清江浦。谁料陈国瑞强调刘铭传杀死部下数百人，要求曾国藩治罪，否则不去清江浦，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曾国藩见到一个败兵之将也治不了，如何指挥诸军。于是拜折参奏陈国瑞，追究其不顾主帅安危，致使僧格林沁被杀之罪。陈被撤

去帮办军务衔，暂留总兵实确，若再不听军令，立即革去总兵衔，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拼杀半生赚来个总兵官，轻易不肯放手，于是乖乖地跑到曾国藩面前低头认罪，立即率兵由济宁前往清江浦。僧格林沁的这员骄将，终被曾国藩制服。

陈国瑞被曾国藩制服了，他终生未忘曾氏的教诲。至光绪年间，陈又因总兵詹启纶殴毙胡士礼一案受牵连而革职，发配黑龙江，死于戍所。死前叹曰：“吾早从曾文正公之言，不及此夫！”

陈国瑞虽服，而“剿捻”主力淮军却更难指挥。李鸿章虽表面上把兵权交给了曾国藩，实质上仍暗相遥控，曾氏令出后，淮军各将不得李鸿章可否，皆拒不执行。或阳为应诺，暗相抵制。曾国藩明知其故，也只好预先征得李氏同意后，让李氏下令，才能让淮军行动。例如曾国藩令刘铭传守周口镇，该地是曾国藩计划中临淮、济宁、徐州、周口四镇中的要害之区，是捻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必须让刘铭传这样的将强兵精的部队驻守，但刘铭传也因周口镇危险而拒不前往。经曾、李、刘三方多次协商，争论多时也难以决定。刘铭传咬定不去，曾不允许，他就称病不起。曾国藩无奈，只好向李鸿章发牢骚，争取真正的指挥权。他向李鸿章说：“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李鸿章身为弟子，不敢明相争辩，只得许诺。曾国藩同李鸿章商定：以后除去罢免淮军的营官要双方商量外，其余进止、分合、保参、增勇、请假等，都不许他遥相指挥。不妥的地方，也只能“密函见告”，所有军务之事，必须让曾“径自主持”。李鸿章见曾国藩被逼迫之下，态度强硬，只得多少让点步，而并未根本解决。

刘铭传在李鸿章的动员下执行了命令，而李昭庆却又不听曾国藩的指挥。曾国藩从一出师就想建立骑兵与捻军对抗，他把僧格林沁的残余马队调到涂州，又把鲍超购买的口外战马800匹解来，组成骑兵队。但这支骑兵不想让一般人率领，而要由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亲自指挥。然而李昭庆却不愿干，害怕骑兵要与捻军对阵，遭到僧格林沁的同样下场，于是，要求哥哥出面干预。李鸿章果然写信给曾国藩，要他改变用人计划。曾国藩坚持前议。认为这是他的指挥权内之事，不许李鸿章干预。李鸿章不敢强行对抗，只好令弟弟任马队的指挥，李昭庆自然心里不高兴，行动也就很勉强。

曾国藩出师多时，与捻军一仗未打，在部队调置上已耗蚀大量精力，使他大伤脑筋，预感到未来的结局不妙。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344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37页。

四十四 河防大计

曾国藩深感客军难驭，同时也感兵力不足，不久又奏请调鲍超北上。鲍军在天京陷落前被调往江西，在湘军裁撤时没有包括他的“霆军”。鲍超勇于战事，又极服曾国藩指挥，一闻奏调，欣然前往。曾国藩让他就地整编，淘汰腐朽部分，新募骑兵数千，最后编成步骑各 20 营 1.5 万人。

同治五年（1866 年）初，清政府起用在原籍养病的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打算让九弟新募湘军出师助战，所以不再阻止曾国荃出山。上谕先到曾国藩手中，他把上谕传给老九，并附信让他召集归部，增募新勇，立即赴任。曾国荃接任后召集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郭松林等人，募得湘勇 1.5 万人，赴湖北堵击捻军，这支队伍被称为“新湘军”。

至同治五年春季，不包括曾国荃的“新湘军”，曾国藩指挥的部队已达 7 万人：由江宁出师时有湘淮军 3 万余人，李昭庆新募马队 9000 人，陈国瑞统带的僧军旧部数千人，新调刘秉章淮军数千人，鲍超马步 1.5 万人。曾国藩认为手

中部队有了一定实力，便开始对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的战略仍取重点防守与游师追击相结合，为寻找捻军决战，加强了跟踪追击这一环节。

同治五年五月（1866 年 6 月）开始，曾国藩组织四支游击之师进攻捻军；其中潘鼎新、周盛波一支与刘松山、张诗日一支联合对付张宗禹、牛宏升，刘秉章、杨鼎勋一支与刘铭传、李昭庆一支联合对付赖文光、任化邦。同时以鲍超驻守河南汝宁、南阳，保奏与湘军有渊源关系的丁宝桢、李鹤年晋升山东、河南巡抚，募勇共同对付捻军。

四支游击之师与地方诸军诸抚配合，大举“剿捻”一个多月，四军日夜跟在捻军马后穷追不舍，又犯了僧格林沁的老错误。数十天里，“剿捻”诸军跑得精疲力尽，只是同捻军瞎转悠，而未能动捻军一皮一毛。有时捻军拖着敌人长跑不息，待追兵力衰之时，猛然回头杀来，湘淮诸军往往不敢对阵，尽量避其锋芒。所以，捻军十分瞧不起湘淮军，以为远远不如僧格林沁的陈国瑞残部敢拼，因此，只是拖着湘淮打转。

一年多的“剿捻”，一个多月的追“剿”，几无任何成效。曾国藩哀叹：“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泉（即李昭寿——引者）万人……，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憾之至”。又说：“人皆言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余则谓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鲍、刘与之相遇，胜负亦在不可知之数”

他生怕自己再蹈僧格林沁的复辙，不得不再次改变“剿捻”策略。他想起开始时刘铭传建议防守沙河的策略。当时刘铭传让他以沙河为界，把捻军逐至沙河以南，以用骑兵不便在水路作战的条件，防守河道，加以歼灭。但当时兵力不足，未便采取。连屡遭挫折之后，他于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1866 年 7 月 25 日）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防河大计”。其意图是利用自然河道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分段防堵，达到消灭之目的。“防河大计”的内容是把他的“剿捻”部队与地方配合，分守黄河、运河、沙河与贾鲁河、淮河，把捻军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加以歼灭。关于运河防务，他与漕运总督吴棠、山东巡抚阎敬铭商定各段的分守计划，令潘鼎新、刘秉章两军相配合。黄河的防务，则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商

定了分守的河道地段。西线的沙河、贾鲁河防务，曾国藩调集鲍超、刘松山、张诗日、刘秉章、杨鼎勋 5 军，配合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防守。沙河、淮河一线则调刘铭传、张树珊几军与豫、皖地方配合防守。

同治五年六月（1866 年 7 月底）中旬，张宗禹一部在河南西华、上蔡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 7 日，大仗打了 6 次，捻军损失约 6000 人，这是自曾国藩率军北上以来的第一次大仗。曾国藩闻报十分高兴，打算利用“防河”之策，调集大队人马，把捻军歼灭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区。然而，由于湘淮各军分兵防守各区，战线太长，一时未能集中，张宗禹、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军已在河南许州、禹州一带会合。捻军看破了曾国藩的阴谋，于八月十六日（9 月 24 日）夜间对河南抚标营河防发动攻击，很快突破防军阵线，于开封城南越过壕防东去，进入山东。

曾国藩打算在贾鲁河以西歼灭捻军的计划没得实现，遂放弃西线河防，调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刘秉章、杨鼎勋各部去山东追堵捻军。

捻军突破曾国藩苦心设计的贾鲁河防线进入鲁西，曾国藩又调兵跟踪追击，一般人认为曾国藩又放弃了“河防大计”，改用追击堵截战术了，也就认为“河防”之策宣告失败。于是朝野内外又开始对曾国藩不满，他的敌对势力则借故大肆攻击。御史阿凌阿等多人上疏严参曾国藩“剿捻”无方，放纵“捻匪”，要求皇帝罢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收回钦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国藩与捻军作战年余，“捻匪”反而愈加“嚣张”，大有渡过黄河，攻打北京的势头。于是也连发上谕，严厉斥责他。曾国藩认为，这是自己带兵 10 余年来，又一次最险恶的政治形势即将到来。

时人集中拿他的“河防大计”作文章，他对此策作了深刻反思。他回顾前朝的“剿贼”方略，对付“流寇”最高明的办法莫过于堵截。所以，他坚信以自然河道封锁捻军骑兵的方略绝对正确。虽然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但不能因一次失利而全部否定此策，贾鲁河一次没能堵住捻军，不等于黄河、运河堵不住捻军。

对待皇帝严责的上谕他不能不表态，于是以身体欠佳为理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而自己并不准备离开战场，仍要以一“散员”身分留在营内，进一步落实他的“河防大计”。然而，由于其他诸方面的原因，使他终于没能留在“剿捻”军营，仍以全盘失败的结果回任两江。

对于曾国藩的“河防大计”，时人皆以为非，所谓“闻者皆笑其迂”。就连曾国藩钦差大臣之任挂帅“剿捻”的李鸿章也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然而当他自己与捻军对抗之后，方知道曾国藩此策的深意。他“剿捻”之初，放弃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想以大兵团在陆路与捻军对阵，歼灭捻军。他调动湘淮大军追击捻军，结果遭到大败，郭松林部先在湖北安陆被捻军打败；半月后张树珊部又在湖北德安被歼灭，张树珊被打死；不久，捻军又在安陆尹隆河大败刘铭传，不是鲍超赶到，刘军将全军覆灭；一个月后又在湖北蕲水歼灭彭毓橘部，打死统帅彭毓橘。从同治五年十二月到次年二月（1867 年 1 月至 3 月），两个月内打败了李鸿章的第一次陆路追“剿”的所有部队，打死屡立战功的湘淮大将彭毓橘和张树珊，重伤郭松林，几乎全歼淮军战斗力最强的刘铭传全

军。尹隆河一战，湘淮两军矛盾尖锐，鲍超的“霆军”全军遣散。

陆路追击堵截的惨败，使李鸿章不得不从新考虑自己的战略决策。恰在此时，接受失败教训的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认为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是唯一可以制捻军于死地的正确策略，共同向李鸿章建议采取之。尤其是刘铭传，他是第一个提出利用沙河阻击捻军的人，他也怪曾国藩后来不该弃守沙河，而调兵进入山东，给反对“河防”者造成口实。因此，刘铭传建议李鸿章采取“河防”之策，为李鸿章所接受。此时，捻军在湖北大败湘淮大军后，北走河南，向东挺进，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胶(州)、莱(阳)地区。李鸿章根据刘铭传的建议采取“倒守运河”，即把守军从运河东岸迁至西岸设防，把捻军堵在运河之东，聚歼于胶莱海边。此后，李鸿章拒绝任何建议，顶住“河防不可恃”的舆论压力，坚持“河防之策”，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马队无法施展特长，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首先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还军东救，同样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亦被清军歼灭于“河防”阵线之中。

捻军的最终失败，仍败于曾国藩制定的“河防大计”。所以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

四十五 暗箭伤人

曾国藩在沙河、贾鲁河一线“剿捻”不利，马上引来言官的群起攻击，皇上的严责之旨也随之披头盖脸地压过来。老于政治斗争的曾国藩明知其中另有原因，亦知这次难逃劫数。当时他曾迷罔不知，但不久他才明白：这是满汉矛盾的风浪再起，其导火线是曾国荃不识时务，中了湖广总督官文的暗箭。

曾国荃出山到湖北任巡抚，这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沙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极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他。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正不该让他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大观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到是事实，但言辞涉之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

麻烦。于是，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预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满洲权贵与湘、淮军阀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正在她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戏剧性地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了一招，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乘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拣了大便宜。

曾国藩满以为此事有了结果，九弟平安渡过险境了，然而他远没料到这仅仅是他步入险境的开始。

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皇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之原因了。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

左宗棠于 1866 年调任陕甘总督，镇压回民起义。

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分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并无让他留任“剿捻”钦差之意。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任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宣布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懍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快快南返，回任两江了。

还有史料说明，清政府当时曾有过彻底将他罢职的决定，郭嵩焘就透露过这个信息，并为他大鸣不平。在曾国藩遭到严旨诘责之时，另有一批湘系大员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

尽管官文不断放出暗箭，后来还是被曾国藩发现了。刘长佑被罢直隶总督而由官文接任，当刘长佑回籍路过南京时去见了曾国藩，刘向曾说，他被罢回籍，是官文“密片所请”。在刘长佑告诉他此话之先，曾国藩就有所警觉。他曾给郭嵩焘弟弟郭昆焘去信说：“近日厚（指杨载福，字厚庵）、霞（指刘蓉，号霞仙）、筠（指郭嵩焘，号筠仙），沅（指曾国荃，字沅甫）次第去位，而印（指刘长佑，号印渠）复继之”，而“官相（指官文）颇有署直隶之信”，“思之悚惕”。

实质上一个官文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对湘系的重大打击政策。他们认为湘系集团权力过大，遂利用曾国藩“剿捻”无力之机，借故加以打击。同时任用李鸿章淮系，一可以用新兴的淮军镇压捻军，再可使湘、淮对峙，便于控驭而已。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十月二十三日。

《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23页。

四十六 遗病难医

曾国藩的“北征”无功，清政府撤掉他的钦差大臣，补给一个体仁阁大学士头衔，于同治六年三月初六日（1867年4月10日）回到江宁，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在江督任上已有7年之久了。但这7年之中总在带兵打仗，没有给他好好治理地方的机会。现在，清政府把他从战场上赶回地方，应该是在三江地区建功立业之时了。在回任途中，他见到“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他心里明白，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太重了。当时捻军的活动范围在北方，三江地区的战火已经过去，但创伤犹在，他思考着回任后如何医治战疮，恢复生产，安顿民生。

曾国藩幼读儒家经典，立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如通常儒者一样，幻想着“三代”之世的出现。做上京官以后，知道“三代”的想法太空洞了，又想着进行一番努力，可望恢复清代前期康雍乾的“太平盛世”。但他没有料到，“盛世”未重现，却因政治腐败，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不寻常的历史把他推向镇压起义的统帅地位，仗一打就是十几年，使他幼年立下的理想和“太平盛世”的幻想，完全成了泡影。但是，对于他曾国藩来说，战争统帅的历史毕竟到头了，他要抖擞精神治理地方了。

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下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作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那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二十一日。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七日。

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那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也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忍裁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曾国藩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吏治难以下手整顿，地方秩序他也同样不敢“肃靖”，因为在三江两湖地方闹乱子的祸首也是湘淮官兵，尤其是被他裁撤的湘军官兵。

当时长江流域地方闹得最厉害的是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兄弟会。这是一个成员复杂的反清松散组织，参加者有破产农民，但更多的是社会流民、遣散士兵。由于他们并无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所以虽有反清性质，但也无目的地抢劫、杀人，成为危害地方的恶势力。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太平军、湘军中都有哥老会参加，而湘军被大量裁撤后，被裁掉的官兵无家可归，又都参加了哥老会。所以，当时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势力非常强大。

湘军后期，有两支军队曾发生哗变，一支是鲍超的“霆军”在金口哗变；另一支是成大吉部在镇压捻军时哗变。据说哗变的联络者和主要成员就是哥老会。鲍超的军队人数多，纪律坏，里面更容易混进流民和反清势力及土匪等，所以“霆军”里的哥老会成员最多。哥老会成员多是无业游民，凑在一起“吃大户”，湘军建军后期，人数急剧增加，大量无业游民也就混进湘军“吃皇粮”，于是，无业游民、湘军、哥老会，三者并无严格界线。当湘军解散后，湘军里的无业游民便又都参加哥老会。曾国荃的部队里哥老会成员也不少，因为湘军急需兵员，曾国荃明知是哥老会的人，也吸收参军，有的会员还被他保至一、二、三品武职候补官员。当时知道这一事实者，把曾国荃指为“哥老会首”。在裁撤湘军时，曾国荃拒不执行裁撤命令，清政府曾派官员对湘军施加压力，说再不裁撤就要派人到湘军中清查哥老会了。曾国藩也知道湘军里的哥老会力量，一是害怕清政府真来查究，同时也怕哥老会作乱，所以才使他痛下决心裁撤湘军，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湘军裁撤了，反而更增加了地方哥老会的力量。

当时哥老会在三江两湖四处聚众，抢劫官府，杀人越货，弄得地方秩序大坏，人心惶惶。曾国藩要“肃靖”地方，首先就想到镇压哥老会，但一下手时，抓到的几乎全是原来的湘军官兵。一是人数太多抓不尽，再是一抓一

《静能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十七日。

《静能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

审又都是湘军，就等于自己抓了自己的人，同样给反对派们制造了攻击湘军的口实，所以又迫他停止搜捕。

当湖南清查哥老会时，他写信说：对哥老会“湘邑不准擅杀一人，讼狱之权当操之邑候，局绅不得擅断一狱”。他的弟弟曾国满要在地方大力清查哥老会，曾国藩也写信制止，他说：“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还说：“大凡已被保为军官的哥老会，总须以礼貌待之，以诚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自悔，而贷其一死。”他还公然写信给湘乡县令说：“哥老会一案，弟有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严禁株累诬扳之风以靖民气。”

曾国藩不敢令地方官查究哥老会，其势力就越来越大，经过他的摸底，三江两湖的哥老会，数湖南最多，而湖南一省中，正好又是湘军招募的集中地湘乡、湘潭、长沙、善化、湘阴、宁乡、益阳最多，而其中又数他的老家湘乡县最集中。因为湘军从这里招募的人最多，遣散回籍者也就最多，哥老会在这里发展的人数也就最多。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曾国藩陷入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荫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

《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17页。

《曾文正公书札》，第31卷，第29页。

四十七 八京陛见

同治七年（1868年），任直隶总督不久的官文因阻击西陲军失败而被清政府罢去直隶总督，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充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一职在总督地位中是最重要的一席，曾国藩接旨后感到很不安，同赵烈文议论。他说，自己“北征”无功，回两江不久，政绩也不令自己满意，为什么清廷在此时反把此重要一席让给自己？这其中必另有原因，打算拜折辞谢，免得将来进退维谷。赵烈文也认为这般调动，违反常规。曾国藩又说，去年年终考察官员时，他所保奏和参劾的朝廷一律未动，说明朝廷不信任自己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任直隶总督？赵烈文猜不透其中缘由，但认为在“北征”回任的一年中，曾国藩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又加云骑尉世职，说明朝廷是信任的，也毕竟未泯去“剿长毛”和“剿捻”的功劳，看来由江督升直督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国藩心里疑虑重重，但又拿不出理由辞谢，只好安排上任。同治七年十一月八日（1868年12月21日），他冒着严冬酷寒，顶着北风，率带赵烈文等一般幕僚由江宁启行。他要赶在元旦前进入京师，因为凡晋为直隶总督的大臣，皇帝是要陛见的。

北行迟滞，曾国藩边走边深思：他离开京师已整整17年了，如今地方上兵荒马乱，不知京师景象如何？大清朝在如今的太后和小皇帝手中，不知是兴还是衰。这时他忆起数月前同赵烈文的一次谈话，那天他接到京中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北京作为一国之都气象却遭透了！街上乞丐成群，公开抢案不断发生，市民穷得吃上顿没下顿，有的妇女都没有裤子穿。恐怕大变乱不会久了！曾国藩向赵烈文征求意见。赵烈文回答：国家安定很久了，势必必要走向纷乱。而纷乱在下面发生，国家能有力量去制止；纷乱在上面发生将是中央政府先烂掉，以后国家土崩瓦解，这一天的到来不会超过50年了。这叫做“抽心一烂”、“根本颠仆”，再无可救药了。

当时曾国藩不相信赵烈文“抽心一烂”的说法，认为当今太后大权独揽，遇事能“威断”，奕訢“聪颖”，叔嫂“勤于政事”，为前代所无，这些却不是亡国的条件。但赵烈文却说，恭王虽聪颖，但不过是小聪明。他掌握时局，仰仗外人，曲为弥缝。至于国立何地，己立何处，如何立志，却全无理睬。尤其是“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并不是真正的大材料。而太后独断专行，手腕诡密，却造成大臣当面阿谀，背后欺蔽。总之，无论是太后还是奕訢都扭转不了清朝“抽心一烂”的结局。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69年1月25日），曾国藩到达京师。当晚由吏部接至北京东安门外金鱼胡同贤良寺寓居，并传达谕旨：“赏曾国藩紫禁城骑马，明日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感到殊荣和惶恐，出京17年，这次重来北京，已非昔日可比。但无论是年轻的太后、年少的皇帝，他都未曾见过，也不知他们会向自己提出什么问题。

翌日卯初，他便来至景运门外，由内廷官员引入，来至乾清门。此时有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迎候，把他引至军机处。正在寒暄，恭亲王奕訢在侍从的陪同下，大步来至军机处门外，大家一齐出迎。恭亲王

官文与1867年劾刘长佑去直督，自己接任。1868年西捻军渡黄河深入华北，突过直隶境达京师附近，官文堵击失败被罢直督。

对曾国藩久有推荐、依畀、保护之恩，于是赶紧趋前拜见，奕訢双手扶住，口称：“老中堂免礼！”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军机处。

奕訢极尽温渥，恳切称道：“这些年老中堂转战沙场，备尝艰辛，祖宗江山，实赖保卫，咸朝文武皆对老中堂崇敬感激！”时过不久，诸王爷及六部九卿皆至军机处，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这位名震当朝的一等侯爷，曾国藩热血沸腾，过去的辛酸委屈，一时化为乌有。

己正（上午10点），镇国将军奕山才把他从军机处引向两宫和皇帝听政之处养心殿。曾国藩叩拜了两宫和皇帝。之后便是两宫的问好，再后便是慈禧的问话，问的全是家常，如“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一路上安静吗？”曾国藩一句一句地回答，老想着问正经事，可偏偏就一句正经也没问，好些天背熟的词一句也没用上。

后来又是三次陛见，每次都是有一搭无一搭地问，漫不经心，不着边际。四次接见下来，曾国藩感慨良多。太后、皇帝“同治”天下，原来如此而已！皇帝做过8年，接见大臣竟一句不吭，简直是个摆设，不要说与12岁亲裁大政的康熙相比了，恐怕连前代多难之主，英年宾天的咸丰也难能相提并论了。慈安完全是一阁中妇人，不必多论。慈禧号称“专断”，四次陛见皆她一人发问，专断是专断了，但连续接见，所论何事？茫无头绪，仔细琢磨，亦不过直隶练兵之事，似乎因他能练湘军，所以调来直隶练兵拱卫京师而已。

陛见之外，朝廷还设盛宴招待他，宴上把他安排在汉大臣之首位，其荣耀风光自是人生之极了。接下去便是名目不断翻样的宴会，王爷专设之席、大学士专设之席、直隶京官席、江苏、湖南、湖北等省京官席、几科同年席，以及众多的旧友私席。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这是1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不曾有的。尤其是参加太皇、皇帝举行的春节大典、元宵大典，他更享受了人间之欢、天堂之乐，满汉全席、百全大宴，不亚于康熙、乾隆的“千叟之宴”。太后的“春帖子赏”、皇上的“元日御赐”，应有尽有，但他并无激动，只有悲凉：仿佛真的进入了《红楼梦》中的即将垮台的贾氏府第！

元宵节一过，他在北京再也呆不下去了，只觉通身无力，像一只泄气的皮球，再住下去怕真的支持不住。于是赶紧离京，奔向保定任所。一路巡视永定河水利设施，7天后到了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那天是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869年3月9日）。到保定同赵烈文谈他北京之行的体会，尤其是陛见和接触清政府核心人物的体会，认为赵烈文所见洞如观火。他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恭邪（指奕訢）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惟倭良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且直隶吏治形势之坏，有同于江、淮。清王朝就是一艘风雨飘摇的朽船，只会一天天沉没，再没有什么“中兴”可能了。前途暗淡，国运衰微，“中兴”之望破灭，使这位“中兴”名臣的身心一下子颓萎了。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剿捻”无功已弄得他心力交瘁。但那时似乎还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和力量支撑着，使他尚能勉为其难。但是，自从北京之行，陛见回归保定后，似乎他自己也如一枚腐心的萝卜，“根本颠扑”了。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吃药针灸全无作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涨，日夜

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发生教案，又把他推进民族斗争风浪的漩涡之中。

四十八 天津教案

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日趋频繁的“教案”，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很让清政府头疼。同治九年（1870 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此后教案发生的频率更加增高，规模也越来越大。

何以发生教案，说清楚其中原因不太容易，有民族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也有中外宗教与文化问题。总体上说，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侵略者的进入中国，西方宗教也与之俱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中法“西林教案”是导火线之一，结束这次战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对西方来华传教就有了明确条文。此后，西方的教会、医院、教堂、教会学校、教会慈善组织机构在中国就大规模开办起来。中外民族矛盾与中西思想文化的撞击交织、混合发生，随着反侵略斗争的高涨，反“洋教”运动也随之兴起。天津教案爆发前已发生了江苏“青浦教案”、江西“南昌教案”、贵州“贵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广西“西林教案”等，天津教案比以前发生的教案规模都大，后果也更严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纷至天津进行贸易和各种侵略活动，同时也开展教会活动，盖教堂、设教会、开育婴堂、办教会学校等。广大天津人民对西方的侵略活动和宗教文化活动都很仇视，民族冲突随时都会发生。

同治九年五月（1870 年 6 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婴儿突然死亡 30 多名。尸体外运时被市民发现，大家怀疑其中另有原因，都想弄个明白。正巧又有人风传说，天津周围各地不断发生幼儿被人以迷药迷倒拐走的事件，传说大都与教堂有关。

五月二十一日（6 月 19 日），一名唤作武兰珍的拐骗犯，被人抓住审问。徐犯在群众面前承认是把迷药放在熬制的红薯糖里，哄骗幼童，迷倒后拐卖。人们逼问迷药的来源，徐说系天主教民王三所授，王三是开药店的商人。

群众审知武兰珍迷拐幼孩与天主教联系起来，又自然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死亡大批婴儿联系起来，此事便一下子哄传开去。当时直隶旱情严重，许多地区庄稼全被旱死，颗粒无收。本就贫困的百姓遇上这样的年景大都背井离乡，外出乞讨。乡村无饭可讨，便都蜂拥而入天津城。天津城也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四乡饥民，欠收更使城里粮米昂贵，加上饥民涌入，使天津一城，饥民蜂拥，人心嚣浮，骚乱不安。群情本就如煮如沸，如今发生天主教育婴堂杀婴事件，如烈火烹油，立即爆发了群众性反“洋教”的斗争。

群众把武兰珍扭送至天津知府衙门，去见知府张光藻。张知反“洋教”皆无好结果，本不想问案，但是又见人情汹汹，若不问此案怕会立起事端，只得讯问武兰珍及一干证人。其中亲见法国育婴堂抛弃幼儿尸体的人说，幼儿尸体系法国育婴堂弃于义冢，胸膛尽开，心肝俱无，眼珠也被挖去。被告武兰珍供认教民王三授以迷药，拐出幼童交给育婴堂，由王三给洋银 5 元。张光藻知道，近来多传天主教堂迷拐幼孩，挖眼扒心以做药引；什么洋人专吃幼童心肝，求长生不老；洋人用中国幼童眼珠，以炼化水银等，皆系无稽之谈，或恐有人借此煽动民心，以达到某种目的。虽有人供出“亲眼见”，实际上不可信。但他还是答应带犯人去找洋人对证，并警告群众说，尚未结案的四川西阳教案，就是因为百姓与法国传教士闹冲突，死伤百姓 800 余名，闹出了大乱子，警告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随后，张光藻又约了天津道周家勋一同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让他们交出罪犯王三，而遭到拒绝。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张光藻、周家勋率带人证，押着犯人到育婴堂门前对质，并让武兰珍指出王三来。结果，育婴堂里并无王三其人，与王三亦无瓜葛。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张口结舌，天津府、道也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讪讪告退。

中国官员走后，围观群众与教堂人员发生口角，进而互殴。气愤的群众越聚越多，开始向教堂扔石头、垃圾，高声谩骂。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暴怒，立即派人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出兵镇压。崇厚不肯派兵，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和武装人员至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通令崇厚派洋枪队镇压。崇厚未经上级允准，不敢派兵。丰大业蛮横地拿出手枪，向崇厚射击，幸而未中。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到，丰大业一见刘杰，又向刘杰开枪，打伤刘杰的随从高升。

丰大业的狂傲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大家一拥而上，当场把丰大业与西蒙殴毙，随后冲进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打死打伤法国传教士多名，又将两堂点火烧毁。接着又冲击了法国领事馆、洋行，并拆毁了英国教堂和美国教堂，先后打死20名外国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俄等7国，立即向中方提出联合抗议，并调集近海各国军舰，进行战争威胁。法国驻北京公使罗淑亚更气急败坏地向清廷示威，扬言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攻陷天津，为各国“受害者复仇”。崇厚为逃脱责任，向清廷上奏，声称“愚民无知，莠民为乱，地方官失职”。清政府害怕与各国决裂，以总理衙门名誉向各国发出照会，保护各国在华利益，表示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教案，先将天津地方官交部议处，以期平定各国的情绪。但在法国公使的煽动下，各国公使仍然不肯罢休，进一步威胁说：各国军舰都已升火待发，进攻大沽口，中国必须给各国满意的行动。

清政府知道事态严重，不断向各国表示中国的诚意，并迅速作出决定：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接到清廷的命令，感到压力极大，他知道教案关系中外矛盾，处理不好，会立起纷争，洋人借机勒索，国人亦会滋事，贻害无穷。一年前在扬州发生的教案，已使他大伤脑筋：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8月），法国天主教教士金緘三在扬州三义阁所办的育婴堂死去幼婴14名，扬州士绅开会议论此事，调查到该堂数月之内死去婴儿40余名，“皆乳妈糟踏死”，因而发生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七月一日（8月18日），在扬州府参加院试的生员首先发起攻击教堂，不久大批群众参加，捣毁法国三义阁育婴堂，并将英国在扬州开设的“内地会”教堂焚毁。事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都思率武装人员70名，向扬州知府衙门寻衅，一直闹到两江总督曾国藩那里。曾国藩初办教案，尚未知如何处理之际，英国公使阿礼国便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照会。随后，麦都思率军舰4艘开到南门城外，扣押了中国的一只军舰，向曾国藩示威。

曾国藩与英、法两方谈判，对方提出严惩扬州地方官，赔偿所有损失，在教堂前立碑，申明保护传教士等苛刻要求。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英、法两国代表分毫不让，曾国藩只得全部接受了他们的要挟条件。英、法方面总算安抚下去了，而地方群众又不答应，以为曾国藩惧怕洋人，牺牲了中国的利益，于是纷纷指责。曾国藩害怕事态扩大，派人去扬州反复“开导”，并以令洋人不再开设育婴堂为条件，劝群众不要闹事。他费尽牛虎之力，方

使扬州教案渐趋平复 。

扬州教案已弄得他心力交瘁，现在又令他处理局势更为严重的天津教案，他怎不为之“惊恐万状”呢！

参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扬州府孙守、朱参将禀批”各件。

四十九 举棋难定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简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刻布等。

留书之后，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扶病登程。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定能对此案作出公正裁决，为天津人民主持正义。大家多还记得，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丰大业等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又叙述一遍。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以旁侠之举入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更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腐烂时从外向里烂，而不是通常的由里向外烂。

人群拥挤，天气闷热，幕僚见曾国藩虚汗直流，催着群众散开，轿夫加快脚步赶进城去。进城后，他谢绝道、府、县的邀请，带着随从住进了文庙。刚刚吃罢晚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来访了。曾国藩顾不得劳累，忙以礼相见。崇厚直属直隶总督管辖，不仅是举人出身，在曾国藩面前是地道的晚辈，所以总是殷勤恭敬，完全没了在百姓面前的骄横。崇厚小心地向曾国藩道苦衷：天津形势恶劣，府、道都已不管事了，全负担子压在他身上，而全城无不骂他是汉奸，法国人要找他算帐，清政府逼他解决纠纷。现在曾国藩到来。实际上只有他俩来主持这个烂摊子了。曾国藩不喜欢崇厚的媚外态度，但却需要他的帮助，天津的情况自己终不如崇厚熟悉。

崇厚又把教案发生的经过向曾国藩讲了一遍，但他的观点与士民官绅大不一样。他认为教案发生，纯属百姓无知起衅，迷拐幼童挖取心肝之说也纯属无稽之谈。天主教教义仁慈，收养的儿童不是弃婴便是孤儿，育婴堂为他们的存活和健康而辛劳，根本不会加害。死亡儿童都是流行病，医治无效而死。外国医道科学，根本不可能有吃心肝，吃眼珠的行为，尽是中国愚民猜忖和有人故意制造谣言，煽动反洋教情绪。崇厚还说，有些强盗混进群众里趁火打劫，教堂和被杀的洋人都曾被劫。

曾国藩为弄清事实真象，在听取崇厚等人介绍之后，又派人去育婴堂了

解情况，并提审了武兰珍等罪犯。

调查结果表明，育婴堂的儿童纯系无父无母、流浪街头的儿童，并无一人被拐进堂。儿童们都说堂里有饭吃、有衣穿，还学识字、唱歌。他们还说前一阶段不少儿童生病，育婴堂积极抢救、医治，有的来不及抢救就死了。人死时，传教士们用水给死者洗脸，用手把眼皮合上。从没听说挖眼珠、吃心肝的，只是有的动手术开刀医治，有的手术无效死去，有的经手术后及时治愈。

提审武兰珍的结果是，武犯与王三勾结，以拐卖幼童为业，纯属人口贩子，同教堂及育婴堂毫无关系，他们相继被捕后供认与教堂有关，是想借教堂之力逃避罪责，免受惩罚。

调查人员还说，参加反洋教的骨干是活动于京津一带的团伙，称做“水火会”。该团伙由来已久，多数是海河脚夫和铁匠、木匠等手艺人组成。近年来天津洋人聚集，教会开展活动，水火会则仇视洋人、洋教，使许多仇视洋人与洋教的天津市民和外地来津的流民也参加进来。他们遇有行动，便串联一起，蜂拥而上，这次打死丰大业，火烧教堂实为水火会带头掀起，而许多流民、强盗则趁火打劫。

经过多方了解，天津教案的情节基本清楚了，但是案情虽清楚曾国藩的心情却如千斤重锤。如何处理这个事关中外邦交、国际关系，事关中国官民关系，事关他个人名誉地位的复杂案件，却使他举棋不定，难上加难了。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他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国的祭祀习俗发生冲突，后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自己心目中的礼仪伦常大相径庭，这是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洪秀全就是拿了这一套组织民众，造成天下大乱的。所以，他在讨伐“长毛”时，便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各教相号召，反对异教进入中国的。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士民交待，这就更加困难了。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清议攻击崇厚卖国媚外，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广大群众的义愤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如果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或者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结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国人每

以此说煽动群众情绪，全国的教案里，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一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为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那一方都不好交待。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他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了，他也不是林则徐，咸丰的下场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真的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艰难，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简大员，走上了这个四面悬崖的绝途之上。

五十 委曲求全

同治九年六月十九日（1870年7月17日），曾国藩在天津会见了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罗受法兰西帝国的训令，一定要满意地处理好这次天津教案，一定要让中国朝廷屈服，并要他借此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曾国藩明知这次教案因法国而起，此案的结果如何，罗淑亚是关键人物。

在曾国藩眼里，罗淑亚训练有素，举止适度。但文雅的外表背后却如丰大业一样，掩饰不了看不起中国官员和主宰中国人的高傲心态。而在罗淑亚眼里，端坐在太师椅里的这个直隶总督、做过10几年湘军统帅的曾国藩，却与其身分极不相称的苍老和虚弱。然而在苍老、虚弱的背后却隐然有一种山崩不动、惊雷不闻的气度。罗淑亚以外交官温温之词，指责中国“暴民”戕害法国领事，焚毁教堂，杀死法国人的种种“罪行”，问曾国藩作何处置。而曾国藩也不亢不卑地指出事态的起因来自教堂虐杀中国幼童的传闻和丰大业首先向中国朝廷命官开枪而激起民愤。

双方口舌之争曾国藩毕竟胜于对手。但这并非口舌之争，二者所处地位太不平等了，一个是有恃无恐，压迫一个早已屈服国家的官员，一个是完全被动，等待对手裁决的代表。因此，曾国藩不再想进行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决定按照上谕的口径，表示严办杀人凶手，训诫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并对法国方面的损失酌量赔偿。罗淑亚则向曾国藩提出修复教堂等被毁建筑、缉拿凶手、惩办天津地方官、礼葬丰大业等条件。曾国藩听后，以为赔偿损失、缉拿凶手、礼葬领事丰大业都可做到，但对惩办地方官一条却难以接受。当时他一条也未表态，只说请示朝廷旨意再予答复。

总起来说，罗淑亚的态度不算激烈，所提条件皆在曾国藩意料之中，惩办官吏一条虽不太好办，或有回旋余地。不料两天以后，法国公使罗淑亚纠合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发来照会，指责曾国藩对他们提出的条件未作明确答复，实属故意拖延，毫无诚意。故此重申两国严正要求：中国必须赔偿损失费白银50万两；所有凶手必须立即正法；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总兵陈国瑞系暴乱之首，必须以命抵死难之教士修女。上述条件必须在10天内兑现。照会要挟：法国第三舰队已至红海，英国加尔各答舰队亦已启航。若不如期兑现，两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

曾国藩看了照会又气又惊，他认为英法公使无理已极。中国官员即使犯罪，也应由皇上量罪处置，何况天津地方官本无大错，总兵陈国瑞不过在五月二十三日群众焚教堂时立马桥头助威而已，并未参与行动。也无地方之责，更不犯死罪。若是按两国公使要求兑现，中国还有什么国际地位！于是，他让崇厚先以口头回绝，自己决定向英、法发出正式照会，予以驳斥。崇厚害怕曾国藩态度强硬，造成谈判决裂，便想以7国武力强大，战火立起相威胁，迫使曾国藩改变态度。然而曾国藩认为以中国官员抵洋人之命毫无道理，遂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0日）拒绝了法、英公使照会中的该条内容。

崇厚提出，若完全拒绝此条内容，洋人必不肯罢休，而因此一项使全局决裂，实因小失大。当务之急，只能委曲求全，不如把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亦算折衷之法。曾国藩也深怕决裂，遂以崇厚之说上奏，并以养病为由，把张、刘二人放回原籍，搪塞洋人，待事态缓和后再予招回，不失两全

之法。岂料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一定要对张、刘二人作出明确处理意见，总理衙门派大理寺卿成林来津，亲审张、刘。曾国藩无奈，只得把已经放走的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交成林押解进京。

惩办官员一事结束后，英、法两国又逼迫曾国藩“缉拿凶手”。七月十四日（8月10日），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来津向曾国藩透露，只要办好“缉凶”之事，张、刘二人之案可结”。于是，曾国藩只得派员四处“缉凶”。曾国藩的态度明朗后，天津人民再不对他抱有希望，当事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曾国藩先后逮捕80余人，其中真正参加反教行动的只有少数几人，余者都无法定案。案中被杀的教士人等共计20人，曾国藩必须屠杀20人抵命。但是，20人之数难以凑够，他只得严令搜捕，同时对坚不吐供者以重刑逼供。此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忙于战争，无力顾及天津教案，更无力分兵对付中国。清廷上下看到了这一形势，不少人变得强硬起来，要求皇帝乘普法战争机会，把法国人，甚至包括各国在华势力赶出中国。京、津民情此时更加“嚣浮”，掀起反侵略、反投降的风浪。清廷为了平息民愤，缓和舆论，也下令曾国藩，让他对法国人的“要挟、恫喝之语”，“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并下令调淮军郭松林等部至京津要隘“以壮声威”。但曾国藩却认为，调兵遣将以备战争可以，但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遂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即使这次趁普法战争之机，侥幸胜利，明年复来，那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所以，“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他还推论说：自道光以来，中外争端屡起，中国之失在于“无一定之至计”。这个“至计”便是“守定和议，绝无更改”。因此天津教案之处理，亦必“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他批驳那些趁普法战争之机，不再追查“凶手”的提议，“皆局外无识之浮议”。他决心不为这些“浮议”所摇动，坚持按原议办理。他自认“委曲求全”是中国“生民之福”，却不料因此而名誉尽毁，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

《曾文正公札》，第32卷，第56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3卷，第17页。

参见《曾文正公奏稿》，第29卷，第48页~49页。

五十一 津门名败

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折辱、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他惶恐痛苦地写道：“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引起“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诟署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连六七年不与曾国藩互通书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通过总理衙门转告他的规劝与义愤态度。前文提及同治三年金陵被攻破之时，曾国藩上奏称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积薪自焚而死”。浙江巡抚左宗棠得到情报，洪天贵福已逃出金陵，遂向皇帝上折，声称“伪幼主”已逃至湖州，与太平天国各将黄文金、杨辅清等会合，有众10余万，复借之为名，“号召贼党”。左宗棠的行为等于告发曾国藩的欺君之罪，当时曾国藩正被清廷诘问、众人抨击，左宗棠火上加油，因此引起曾国藩的不满，遂上疏反噬左宗棠放走了杭州陈炳文以下“十万长毛”。左宗棠又上疏申辩，由此使曾左二人失和，数年不通往还。这次看到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奏折，不便直接给曾国藩去信，便通过总理衙门转达了自己对他的意见，认为天津教案中的反洋教活动，不能与一般的“乱民”相提并论，而是由洋教欺压良善激起的群众义愤。因此，索赔本就不该同意，而索命更不能准。现在正是养民锋锐，修我戈矛之时，若无凛然之态，何以挫夷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

更让曾国藩受不了的是，被他上奏查办的天津道、府、县官员一下子成了众人尊敬、垂怜的贤吏。听说就要押他们去刑部受审了，天津官绅士子都去慰问，使其门庭若市。慰问者赞扬他们“爱民”、“清正”，敢于同洋人抗争，自然地就联系起曾国藩，曾国藩也自然成了害民、邪佞的卖国官僚。总之，当时从上到下，由远到近，前后左右是一片指责、抨击之声，真到了千夫所指、众口唾骂之地步。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痛苦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

《曾文正公书札》，第33卷，第8页。

《曾胡谈荟》，引自《国闻周报》，第6卷，第38期。

《曾胡谈荟》，引自《国闻周报》，第16卷，第38页。

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毕竟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当曾国藩在内外压迫、全国辱骂之下病情加重，难再支撑下去的时候，只得上奏请求另派大臣赴京协同办案。清政府同意了曾国藩之请，派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由苏州达天津需要相当时日（大约10天才能到达天津），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去法国赔礼道歉，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而丁日昌也赶到了。

此时，如过街老鼠般的曾国藩，希望清政府能替他解释，使他不至于难堪，能让他办完教案后回得了直隶总督之任。不料，慈禧太后为推卸“卖国”之责，避开舆论的直接攻击，竟然像道光帝一样故技重演，指责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于同治九年八月二日（1870年8月28日）下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之任，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无疑等于向国人公开宣布：天津教案办理之失误，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是曾的软弱无能，屈辱投降，才办成如此结果，清政府不满意这样的结果，才不得不中途撤换他。

然而，慈禧太后不过一时之聪明，终究掩盖不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对外屈辱妥协较曾国藩明目张胆多了，他接到去天津的命令后马上上疏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修教堂，严刑审讯在押之人，悬赏缉拿“凶犯”，直接向洋人表示道歉。京津人等见丁日昌如此奴像毕露，直骂他为“丁鬼子”，并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他在江苏巡抚位上的贪污丑行。丁日昌全然不予理采，仍然干他要干的“缉凶”、“抚洋”之事，并力劝曾国藩放宽心，安心养病，莫把“清议”和辱骂当回事。

李鸿章接办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判决并无大的改动，仅把原20名的死刑改为16名，4名缓期执行。而天津府、县官送达刑部后，也愈判愈重，刑部判张光藻、刘杰发遣，慈禧则钦判发往黑龙江极边效力赎罪。曾国藩听到反觉得判罪过重，亲为张、刘二人筹集白银1.5万两，以求稍作补救，借以挽回一点自己的名声，表示自己的愧疚之意。

五十二 刺马疑案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两江总督出缺，调曾国藩赴任，同时负责调查此案。

接到调任命令及马新贻被刺的消息，曾国藩异常吃惊。总督被刺，这在清朝开国 230 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随上谕寄来的文件中有江宁将军魁玉奏报的案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 年 8 月 22 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被一男予以短刀刺死。刺客并不逃跑，束手就擒，自称张文祥。该犯供词支离，难以定案。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对他比较了解。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与李鸿章、郭嵩焘同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进士，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知县。从咸丰三年（1853 年）开始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因战功历任知州、知府、道员，同治二年（1863 年）升为按察使。此时曾国藩坐镇安庆，与他接触甚多。同治三年（1864 年），马新贻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当时曾国藩已迁到南京，浙江军务由曾统辖，马即是他的一个属下。他曾专程至南京向曾国藩问计，给曾以精明强干之印象，在浙江巡抚任仿效曾国藩，奏减浮收，修筑海塘、复兴书院，颇具政绩。未满 3 年便升任闽浙总督。第二年（1868 年）曾国藩调任直督，马新贻即迁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那年他才 47 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总督。

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很不高兴。此人并无殊勋，又与湘淮无渊源关系。两江总督位高权重，让他接任，在曾国藩看来是朝廷对自己的有意贬低。然而，马新贻毕竟是大清总督，却不料转眼遭至杀身之祸。

曾国藩对此案甚感疑虑，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流浪汉会把戒备森严的封疆大吏一刀杀死？所杀地点正是清军刀兵林立的校场。以他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 17 年，以他经历的种种官场黑幕，他深知此案决非一般凶杀案件。其中的玄机是什么？为什么这几年清廷偏要他处理这等棘手之案？天津教案已弄得他身败名裂，再要钻进这不明不白的迷阵中，说不上会弄个什么结果出来。他接受了来天津的教训，不再想以弱病之身，再冒风险了。于是提笔在手，给朝廷上了病体不胜重任，乞收回成命，恳请另简大员，界以两江督篆。

然而，辞折很快被批转回来。清廷以坚决的词气，令曾国藩即赴两江之任，勿庸再辞。曾国藩只好再次赴任。

曾国藩被迫接任，只得召集幕僚商量对策。赵烈文认为：此案发生之奇，官场少见。而清廷对此案的处理，亦让人费解。案发后已近两月，却未见朝廷有催办的谕旨。天津教案发生，朝廷急如星火，一日一旨；而总督被刺，亦属大事，为何朝廷如此冷漠。

赵烈文的所提疑问很有见地，曾国藩和众幕僚都有同感。针对此情，大家再议行止。薛福成等提议：可“恭请陛见”，一是看看朝廷对此案的看法；二是摸摸此案的底细，试探两宫的态度，再作计议。

曾国藩采纳了幕僚的意见，一面奏请晋京陛见；一面继续窥测动静。清廷下旨允其人京陛见，曾国藩又以等待李鸿章来津交接为由，逗留天津许久而不动身。八月四日（8 月 30 日），接到令他赴任两江的上谕，直至九月二十三日（10 月 17 日）他才离开天津前往北京。这期间朝廷再没催他快行，

正如赵烈文所说，朝廷对马案的处理的确并不紧急，曾国藩在京牵延多时，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年底才到达南京，朝廷仍是不加催促，任其耽搁。

曾国藩在京师的日子，正值他的60寿辰，慈禧太后未接见前即为他庆祝一甲子大寿。皇上、太后亲为题辞、送匾，御赐蟒袍、如意等贺礼。军机处、湖南同乡、同年分别在法源寺、湖南会馆为他设盛宴祝寿。

祝寿之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他两次。同治帝照例未开口，慈安太后也未问话，仍只有慈禧问话，廖廖数语只问身体、病情等琐细之事。关于马新贻之案，慈禧只说了无关痛痒的两句话；一句是“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另一句是“马新贻办事甚好”。曾国藩还想尖起耳朵再听下文，但慈禧不再说下去，让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再次接见，曾国藩以为这次能认真说些实质的东西，谁知连马新贻的名字也不见提起，只问他何时启程而已。

在京期间还遇上了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又见到了慈禧太后，仍不见她再问马新贻之案，曾国藩只好离京南下。启程后，他反复琢磨慈禧太后的两句话，推测朝廷对刺马案的态度，使他认识到赵烈文的估计正确：朝廷对此案并不关心，没有要将案子查到水落石出的意思。然而，慈禧等人为什么会对此案持此态度？这本身却使曾国藩迷惑不解。总而言之，曾国藩认为不虚此行，总算弄清了朝廷的态度，他也放下心来了。这个案子处理得如何，只要别再自找麻烦，是不会有有多大问题的，再没有天津教案那般风险了。既然已受命处理此案，最终还得有个结案，于是他给驻扎南京的彭玉麟写了封信，让他先行秘密查访。

十月十五日（11月7日）曾国藩自京起程南下，闰十月二十日（12月12日）才抵达南京，此时，离马新贻被刺已经半年之久，朝廷令他接案调查的谕旨也已4个多月了。

参见张道贵、丁凤麟：《近世文史资料·张文祥刺马》，岳麓书社，1986年版。

五十三 疑讞难定

尽管朝廷不追不逼，曾国藩自己也想知道案中内幕，因为这个案子太奇了。然而，曾国藩接案后越审越奇，疑窦丛生，传闻蜂起，扑朔迷离，使他最终也不知其所以然。

在曾国藩迟迟未至江宁之前，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已会审多时，也已审出了一个结果来。曾国藩到任后即见到了那个供词，大意是：

张文祥，河南河阳（今孟县——引者）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贩卖毡帽至宁波，结识同乡罗法善，娶其女罗氏为妻，开小押店为生。咸丰十一年，入太平军李世贤部，转战皖、赣、闽、粤各地。兵败后曾投清军，因无保人未收，再回宁波，妻已为吴炳燮所有。由龙启云帮助，仍开小押店为生。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2月），浙江巡抚马新贻至宁波，张文祥递状控告吴炳燮霸占其妻，马以其妻改嫁吴而不准其状。马告之龙启云，龙说从前做海盗时，曾被马新贻派兵捕杀殆尽，怂恿张刺杀马新贻泄忿，张遂生杀马之意图。后张文祥之小店为马新贻勒令关闭，理由是违禁私开。使张更忿。同治八年八月，闻知马新贻调任两江，遂至南京。又知马新贻每月二十五日考课武弁，遂寻找机会刺马。直至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因二十五日下雨停课）才得手行凶。然而这个供词上报后，两宫认为尚有不明之处“不足以成信讞”。待曾国藩、兵部尚书郑敦谨到江宁后，再会同审理。

魁玉、张之万的这个奏报未被批准，曾国藩还得再行调查审理。

不久，彭玉麟、赵烈文、吴汝纶等人又访得了刺马案的多种传闻。

其一说：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今汝南）人，原籍河南光州，与其友曹二虎、石锦标都在捻军里，张文祥是个头目。马新贻为合肥知县时，办团练与捻军作战，在一次战斗中。马新贻兵败被张文祥等人活捉。张文祥等欲投清军，与马新贻结为兄弟，随之反正；张文祥的降军被编为山字营，张为营官。山字营随马新贻四处作战，屡立战功，使马不断升官。后升至安徽布政使时，曹二虎把妻子接至安徽省马新贻的官府居住。马见曹二虎之妻美貌，顿起歹心，设法骗奸，张文祥侦知好情后，告知二虎。张、曹二人反复商量如何处治时，马新贻先下手杀了曹二虎。他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即利用派曹去寿春镇领军火之机，使人密告该镇总兵徐周鹗说曹二虎“通捻”，徐捕杀之。张文祥逃脱，誓为二虎报仇，乃暗随马新贻，先后到浙江、福建、江宁，终于找到了杀他的机会。

其二说：马新贻是回人，信伊斯兰教，马父是山东菏泽回人之首，与甘肅回王素有联系。马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其军火多得回民资助，故而屡立战功，升迁也快。马新贻对回王感恩，一直想设法报答。马有一亲兵名徐义，原与张文祥同是李世贤部太平军战士，李世贤兵败后，徐义投降了清军，成为马新贻的亲兵，张文祥则在浙江宁波开小押店为生。一次，张经杭州见老友徐义，徐义密告他：马新贻与甘肃回部联络，回王定西北后要东下讨中原，江浙一带之天下将由马统辖，二人认为马新贻的背叛清朝行为是坏了良心。后来，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文祥的生计被断，联想马新贻

《清实录》，第296卷。

金天羽：《放楼续文言》。

私通回部、蓄谋造反的行为，就计划杀掉他，一是为国除害，二是泄己之愤。

由张之万、魁玉的提审到幕僚们听到的江宁城里的传闻，曾国藩得知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几个不同动机，一是漏网发逆，私通海盗，挟嫌泄愤；一是马新贻富贵背友，帷薄阴私，张文祥为友复仇；一是马新贻私通回王，阴谋反叛，又得罪张文祥，张以卫清室、泄私愤两动机合一而刺杀之。这些不同的说法相差甚远，以不同情节论案，张文祥或可为叛逆、或可为侠士、或可为报效朝廷的有功之人。

曾国藩面对这些扑朔迷离的不同案情，感到张文祥与马新贻同样是难以揭破的迷。他明知这个谜底不易揭破，可他毕竟又是揭破这个谜底的重要人物。他又试着继续揭下去，然而这个谜底的下一层却同湘军、同天津教案、同他自己连了起来，他终于惊得一身冷汗，不敢揭下去了。

原来张文祥供认，他曾在湘军鲍超部当兵，因作战勇敢而为鲍超所喜爱，被选为新兵营哨官。鲍超的“霆军”里有哥老会组织，他又是哥老会的一个头目。“霆军”在金口哗变时，就是哥老会所掀动，哗变后他逃至天目山躲进寺庙里。寺庙长老是一个隐身的天地会首领，仍指挥着山下的天地会活动，张文祥遂入其伙。后浙江巡抚在宁波、台州“剿匪”，捕杀了这伙天地会，张文祥受寺庙长老之托，杀马新贻为天地会会友报仇。刺马案一下子与湘军联系起来。

曾国藩又听说，马新贻被刺后，传教士反映强烈，镇江城里的传教士还为他搞悼念活动。很快，曾国藩又了解到以下非常的情节。

同治八年二月（1869年4月）末，马新贻就任两江总督后与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打得火热，在几次接触之后，一位名叫高龙肇（pán 音盘，皮衣束带或皮囊）的教父认出马新贻在与小刀会作战时负过伤，在董家渡医院治疗时曾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以后任浙江巡抚时，与法国天主教也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同治八年十一月（1869年12月），安庆发生教案，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来南京同马新贻交涉，马对罗极其友好，一切照法人的要求办理。事后与安徽巡抚英翰联衔布告，并勒石树碑保卫天主教，极力宣扬天主教的善行，劝人维护外教。在南京等地的天主教堂都有清兵保护，皆出于马新贻命令。同治九年三月（1870年4月），南京发生反洋教活动，头面人物便是陈国瑞。而且，不仅陈国瑞反洋教，江苏布政使梅启照也暗中支持陈国瑞。陈国瑞领人在大街小巷发布传单，攻击传教士残杀中国幼童的材料，都是在布政使署里印刷的。陈国瑞还带着南京的许多清兵，搞反洋教宣传活动。

因此，马新贻对陈国瑞、梅启照表示反感，并欲派兵捉拿陈国瑞。陈因此逃离南京，经扬州到天津，一路接纳不少反洋教的人士，一起在天津参加了反洋教的活动。天津教案发生，法国传教士及驻华公使所以提出惩办陈国瑞，就是因为他有反洋教的许多活动。但是，由于曾国藩的驳斥，陈国瑞才未被惩处。

于是，南京城里又流传着马新贻是被反洋教者所杀，或说是反洋教者与张文祥合谋而杀。

此外，社会又传说马新贻是江苏巡抚丁日昌所谋杀。原因是丁日昌之子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

参见孙衣言：《马端敏公神道碑》；高龙肇：《江南传教史》等。

任候补道员的丁蕙蘅与人争一妓女，致伤人命，马新贻判案，革去了丁蕙蘅的官衔，并令出款 1 万两白银以安置死者。丁日昌老羞成怒，便花 3000 两银子买下刺客，杀了马新贻，这个刺客便是张文祥。

刺马案越理头绪越多，没过多少天案子就牵扯了湘军、洋教士、丁日昌、陈国瑞。甚至还流传着马新贻是被七王爷醇亲王奕訢派人杀死，原因是马新贻支持洋教，醇王激烈反对洋教，故此杀之。还传说，没有醇王（或丁日昌）的内线联系，张文祥根本就无法进入马新贻由教场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枪林立之中，一刀杀了总督大人，制造出有清一代刺杀总督的奇案来。况且，张文祥供词中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说，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是醇王奕訢？还是丁日昌？龙启云？天地会首领？或者“良心”发现，报效清政府？

曾国藩与兵部尚书郑敦谨提审过张文祥几次，屡问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何意。张或供因龙启云诸人帮助，代友复仇；或供“马总督系回教中人，闻其与甘肃回首勾通，伊起意刺杀，实系报效”清廷。曾国藩见后知朝廷对此案并不重视，且亦难以审得水落石出，又事关回教、洋人、醇亲王及自己的湘军等，所以也不想深究下去。故而上奏说“业经熬审二十天之久，该犯屡次绝食，现已仅存一息，奄奄待毙，倘旦殒命转显幸逃显戮，自应迅速拟结”，仍照张之万、魁玉奏报所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上奏。实际上，他根本未加“熬审”，曾国藩已知情节复杂，讳莫如深，会审之时不过将人证 18 人点名一次而已，在奏报中对案中疑窦，不著只言片语。

朝廷接到曾国藩等人的奏报，也未作深究，便草草批准成案。于同治十年二月十五日（1871 年 4 月 4 日）将张文祥凌迟处死。

案结之时，朝野议论纷纷，皆说此案必别有隐情，不能宣于众者。参加会审的孙衣言和袁保庆“抗言”拒绝画押，要求对张文祥重新审定，以重刑审供，但被曾国藩拒绝，终于结案。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日记中也写道：“或谓必有指使之入，或有以帷薄事疑马公者。盖谓文祥奋不顾死，非深仇不至此也”。

案发不久，上海，南京等地便编出了“刺马”戏，将马新贻附会成一个忘友背主、勾结洋教、出卖朝廷的坏蛋；而把张文祥描写成一个大英雄。演戏多时，政府也没有人出面干预。而马新贻的身后事典却备极隆重，恩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在南京、安庆、杭州、菏泽建立专祠。这都是刺马案的怪现象，有人解释说，清政府本不想这么给马新贻以厚典，原因怕洋人干涉，造成外交上的麻烦；有人则说，当时甘肃、新疆的回事未平，而若不如此对待马新贻，又怕引起回民的不满，惹出麻烦。

总之，有清一代空前绝后的刺杀总督案草草结案了。可连结案的曾国藩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扑朔迷离，也就给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没被破解的疑案。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等。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

《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 4 卷。

五十四 秦派留学

曾国藩是清朝官员中较早上奏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其所以如此，一是为容闳所鼓动，再是急需人才办洋务。

前面提到，容闳在安庆投靠曾国藩，帮助他建设安庆内军械所。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建议他开办学校，培养能主持近代文化事业的新型人才，曾国藩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但当时正忙于镇压太平军，天天打仗，无暇顾及教育的事。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机器，开办工厂，制造军火，机器买回后，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办起了江南制造总局。随着大型兵工厂的设立，急需一大批具有近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如造船、炼钢、制造各业中都需要人才，这些人才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没有的。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向容闳请教办法，容建议他在江南制造局附近设立一所兵工学校，聘请一批外国人一边翻译西洋科技书籍，一边教授中国员工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这是曾国藩在容闳的帮助下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初步培养了一批新的科技人才，译出了第一批西方科技书籍。容闳后来曾兴奋地回忆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当时因忙于镇压捻军起义，容闳的“教育计划”仍未能被曾国藩全面落实。不久，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他的教育计划，由丁日昌上奏朝廷，其中主要是派遣留学生问题。有关派遣留学生之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都提到了，但这个奏折经总理衙门文祥上递，因文祥丁忧回籍，而没有下文。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容闳作为幕僚和翻译，随行处理天津教案。其间，容闳又多次与曾国藩商量派留学生之事，后到的丁日昌也与曾国藩谈及此事。曾国藩同意了容闳的主张，答应立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旨准。容闳听曾国藩此说“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庆幸自己多年的蓄愿终被清廷大员所采纳。同年冬天，清廷批准了曾国藩与李鸿章合奏的派员留学奏折。

同治十年七月（1871年8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再次联合上奏，阐明派员出国留学的意义，并拟定了具体章程12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与美国政府接洽，中国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由清政府支付一切经费。
2. 在上海设立“留学出洋局”，派员负责，选出幼童在局中培训，准备出国。
3. 出洋幼童年在12—13岁左右，先选派120名，分4年派出，留学期限15年。
4. 留学生学习专业由清政府决定，归国后也由政府具情录用。
5. 幼童出洋后听从中国方面约束，在学习洋文同时兼学中文。
6. 拨出留学经费白银120万两，于江海关按年分拨。

这个奏稿是曾国藩拟定的，李鸿章只是会衔上奏。曾国藩在奏稿中一再强调派遣留学是国家“徐图自强”的重要条件，不容迟疑。他说，如今我们办厂、制器皆取西洋之长，购之西洋之器，我们花了大笔银子先就“力有不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5页～126页。

《曾文正公奏稿》，第4卷，第945页。

逮”，而更重要的是全恃外人之器，其中奥理则不能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那是很危险的。

同治十一年一月（1872年2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再次联衔上奏了派遣幼童出洋的具体落实情况。任命陈兰斌、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中国留学生事务；幼童出国前在上海训练，由刘翰清负责；留学生年龄扩至12—20岁（批准时又改为12—16岁）。

曾国藩上奏派遣留学期间，即派员四处招生，但因当时风气未开，这项工作却极难进行。一般的幼童父母皆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甚至认为几万里的海路是难以通过的。

曾国藩派员到城镇和乡村动员，访问许多住户，宣传把孩子送出国受教育，经费全由政府负责，“有的人申请了，可是有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孩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一般知识分子也只把科举制度当作进身的正途，把读新学看成“不齿之事”，而更把出洋留学“斥为非类”。由于招生年龄极小，父母更不愿自己的幼子离开自己，何况出国前，幼童家长都得“具结”，约定“生死各安天命”，就更增加了父母的疑惧心理。

招生工作困难重重。尽管曾国藩派了不少官四处游说，报名者仍是不多，不得已，只能派容闳回家乡广东香山招生，又去香港学堂中招揽。第一批留学生大部分是容闳的同乡，再就是有特殊条件者，如邝荣光其父在澳门工作，见过世面，愿儿子去美国留学；唐廷枢和容闳是香港的同学，本人又从事近代工矿事业，思想比较开放，才送子唐国安赴美；李恩富的堂兄在上海经营茶叶生意，说服了他的家长。

近代著名的留学生，科学家詹天佑一家并不知有留学招生一事。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回家告诉其父詹兴洪，劝他送子出国留学，詹兴洪不干，希望儿子走科举正途。这位邻居却认为留学前途远大，主动说如果詹天佑愿意留学，就把女儿许配他。这样，詹天佑之父才愿具结送子留学，当时詹天佑只有12岁。

为了做好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曾国藩拨款在上海设立了“出洋预备学校”，设有正副校长，中西文教习。幼童在这里先受教育半年，学习简单的英文、中文，了解出国的各种知识。学校要求极其严格，学习不努力的还要进行体罚，第一批幼童在这里受训后，基本都完成了预备班的学业。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天，经过考试合格的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出洋，正式揭开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历史篇章的新页。遗憾的是，为第一批留学生作过努力的曾国藩却在数月前辞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尽管如此，中国留学史上毕竟留下他努力的印迹。

容闳提前赴美，安排食宿、读书等具体事务。曾国藩同他进行了长谈，谈到留学归国，中国有了各方面的人才，外国就不会再欺侮中国了。虽然中国派遣留学生不可能根本改变受侵略、受欺辱的国际地位，但毕竟有了中国自己的近代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一大批具有新型知识结构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群，对中国的维新、革命和文化。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些影响也是曾国藩等清朝官僚所始料未及的。

五十五 造铁甲舰

同治十年八月（1871年9月），秋高气爽，日丽江阔。曾国藩会集幕友、门生和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文士，兴致勃勃地踏上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军事检阅活动。阅兵之外，他要亲自坐一坐江南制造局新制的轮船，游览一下江南秋景，散散长期郁积在心里的闷气，同时视察江南制造总局。

八月十二日（9月26日），先就近检阅了江宁防军。第二天乘轮东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镇江、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十月七日（11月19日）到达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局各种机器和轮船，十五日（27日）改乘“测海”号轮船回江宁。

一路上曾国藩与容闳、徐寿、李善兰、华蘅芳主要谈了办洋务之事。他们介绍说，容闳去美国买的机器是“制器之器”（即母机），买回后交给李鸿章，李通过丁日昌买下上海一美国旗记铁厂，厂主科尔的技术很好，留厂做工程师，开始了江南制造局的成立与制造工作。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要在江南制造局设船坞造船，奏准了造船经费，并把工厂由虹口租界迁至高昌庙，扩大了工厂规模。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建设了船坞和炼钢厂。同治七年（1868年）造出第一艘兵轮“惠吉”号，下水后曾国藩乘该轮试航，表扬该轮“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同时让工厂继续努力，要造出“20余丈之大舰”。按曾国藩的要求，同治八年（1869年）又造出“操江”、“测海”两中轮船。这两只船比“惠吉”号进步在由明轮改成了暗轮，马力由392匹升高到400多匹，但其船体反而比“惠吉”号还要小些。“惠吉”是185尺，“操江”只有180尺，“测海”仅有175尺长，并没有达到曾国藩所要求的标准。

现在，曾国藩乘坐的“威靖”轮是同治九年（1870年）新制的。一边行驶，曾国藩一边与徐寿等诸匠师参观这只轮船，一边听他们介绍，该轮也是一艘暗轮，终于达到了曾国藩要求的20丈长度，是205尺，马力也比前三号大，为605匹，载重由前三号的600吨增加到1000吨，配炮也几乎增加了一倍，由8—9门增到15门。

曾国藩高兴地看到江南制造局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回想他在安庆制造的“黄鹄”号，更觉进步之大了，于是不断夸奖着徐寿等人。但是，他突然感到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一点也未变化，曾国藩用脚点了点舱板说：“从黄鹄号到威靖号，都是用木板制的。打起仗来，木板挡不住炮弹，也容易起火燃烧。而洋人能造出铁甲舰，我们为何造不出？”周围的人听了没敢回答他。

船到上海后，曾国藩由上海道兼制造局总办秦世泰陪同参观了制造局各厂，并一一参观了“测海”、“操江”各舰。再次同容闳、徐寿等人说，要他们尽快造出铁甲舰来，并说如果中国能有50号铁甲大舰，就敢同洋人在大海上争高下了。

第二天，曾国藩宴请制造局里的译员与各匠师，其中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科尔等。宴会上，曾国藩一一慰问外国人，感谢他们为江南制造局作出的努力。曾国藩许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所以宴会显得很轻松、热烈。傅兰雅等外国人由于一时高兴，竟向曾国藩提出他

对外国人、对外国传教士的看法。在坐的中国人都为此捏一把汗，生怕触动了曾国藩的伤心之事，惹起他的不愉快。但是，曾国藩却高兴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外国都该是一家，“大同”世界，天下都是兄弟，不该有侵略和欺辱。那稣教，天主教都劝人做善事，不做坏事，也是好教。真正的外国朋友、外国传教士只会帮助中国人，不会欺压中国人，那些仗势欺人的外国人和传教士，不能代表兄弟国家和真正的传教士。

曾国藩的回答博得在坐外人的热烈掌声，大家赞扬他的开明，认为比那些“清议派”要高明得多。并表示与中国朋友精诚团结，为制造局真诚效力。

曾国藩说，他向江南制造局容闳、徐寿他们下个死命令，要他们一定造出铁甲舰来，希望外国朋友们献智献力。美国人科尔当即表示可以造得出，他还表示论技术“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只要经费、材料能供应上。曾国藩听了非常高兴，举杯表示对他的谢意。

然而，当曾国藩进一步了解江南制造局的情况时，他的情绪又黯淡了。科尔、傅兰雅等人告诉他，江南制造局效率太低，浪费太大。他们说，局中工人1000多，设备也齐全，经费也充足，如果在外国，这样的条件，工作效率最少还能提高3倍。而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枪炮武器，成本又要比国外工厂多7成，造一支枪炮比买一支外国的枪炮用钱还要多得多。造轮船虽没有造枪炮这么明显的浪费，但不会比买船节省经费。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天还得走上买船的道路。曾国藩同他们探讨，中国的工厂为什么效率会这么低？浪费会这么大？他们干脆回答：这是个经营体制的问题。外国人办工厂，都是厂方自己经营管理，经费自己出，造出的产品，包括枪炮、弹药、军舰，都是作为商品按价出售，以盈利为目的，办厂者才有兴趣，也不会让工厂浪费，会极力提高效率。而中国正好相反，江南制造局全由公款生产，产品又全部直接调拨给军营、炮台，工厂收不回一文钱，也不用替谁负什么责任，质量好坏都能交差，更不要讲求盈利和效益。这个办厂的路子，决定了工厂的前景；这个体制不改变，工厂总有一天要停办。

曾国藩听了他们的话，脸色阴沉了。这个办工厂的体制，尤其是办军工厂的路子，怕是谁也变不了。军队要枪炮、轮船为朝廷打仗，国家不出钱办厂能由谁出？国家出钱办厂，产品又如何能拿出去卖？然而这么办下去，造武器不如买武器省钱，买的武器质量又好，那办这个工厂不是自找苦吃吗？然而中国不设厂自造武器，一切都靠买外国的，中国哪还有自强的一天！自强必得独立，造武器为的是抵抗外国侵略，但武器一定要向外国购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哪有既要准备同人打仗，又要花钱买对方的拳头、棍子的！

曾国藩越想越苦恼，几天来制造铁甲舰的兴奋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只觉得浑身乏力，赶紧乘轮回到了南京。

五十六 悒郁辞世

自上海返回南京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很悒郁，什么原因自己也想不清楚。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2年1月2日），由李鸿章、马新贻规划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经过5年的建设落成了。督衙在原洪秀全的天王府的基础上修建，其规模无法与先前的天王府相比，但比起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要阔绰、豪华多了。总督搬进新署（原于盐道衙门办公）应该是一件大的喜庆之事，庆祝、摆宴自不能少，但曾国藩却一点也提不起精神。贺宴上他只是反复说：“太奢了！天道忌奢！天道忌奢！”他再三嘱咐总管要在署东开出菜地来，种上蔬菜，他要亲自劳作，以抵几分奢靡。

江南的冬日虽温暖如春，但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恶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了，想着要交待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腐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子，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议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2000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待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10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坏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

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目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待，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闻问，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楨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近，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赶回直隶。同李鸿章长谈之后，也许是兴奋过度，他的旧病复发了，头昏眼花，耳鸣不止，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直到大年三十，江宁城的衙门、商号和有钱人家的大门口张灯结彩、楹柱上旧桃换新符，秦淮河更是热闹，红男绿女，画舫丝竹。或许是节日气氛的冲动，曾国藩才感到身体轻松了许多。大年初一早上，他接受了江宁文武的祝贺。第二天他又到退居江宁的老友吴廷栋家拜年，同吴廷栋兴致勃勃地谈经论道。

转眼就是元宵节了。曾国藩没有忘记，正月十四是道光皇帝宾天的日子，他永记道光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每年这一天都要为之烧香行礼。今天，他勉强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觉得十分疲倦，刚一坐下，眼前便浮现 23 年前那一天的情景来。那年自己是 39 岁，礼部右侍郎，二品大员。也是正月十四日，早晨起来正要赶赴穆相穆彰阿的家宴，部里忽传他去圆明园，说是皇上要立太子了。曾国藩听了大吃一惊，他知道皇帝立太子是什么意思，大清朝秘密立储，立太子即是太子登极，也就是皇帝龙驭上宾了。曾国藩还想最后同道光见上一面，赶紧备马前行，然而马车刚到圆明园，便听到一片哀哭之声，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皇帝了。道光驾崩，咸丰继位，接着是罢黜穆彰阿，清查穆党，他虽是穆的得意门生，但因穆在得意之时，门生很多，并未一一清算，所以没有牵连到他。然而，道光死后，穆彰阿被罢，咸丰不信任他，也无人替他说话，使他以后办事处处碰壁。每至事机不顺，尤其咸丰。慈禧不时对他进行冷遇、打击之时，他更加思念道光帝和穆彰阿。

一晃 23 年过去了，自己在疆场上、在官场上搏击、沉浮，救了大清王朝，官至极品，地位、名声都无以复加了。然而，他认为始终仍未取得朝廷如道光那般的信任。尤其在功成之后，他反觉愈被朝廷猜疑，众人谤议。最近的几年简直成了过街之鼠，人人喊打。孤立无助、冷寂萧瑟，使他感到冬日愈加阴寒、荒漠，万念俱灰。“剿捻”无功之时，他就想到辞官归隐，只是感到“无善退之法”，预料到以后官再作下去，将“日趋日下，徒为有识者所指摘”。天津教案之后，果然遭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弄得肝病、眼疾、肾虚、疝气、头晕病、失眠症一起发作。

自正月二十三日（3 月 2 日），肝疼加重，右脚麻木，又过 3 天，忽觉

舌根发硬，言语不便，吃了些药，似乎好转。起来写日记，记下了当时的自我感受，如正月二十九日写道：“余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安人间，惭愧何极。”二月初一日又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赦。”二月初二日，又觉病情加重，唤儿子曾纪泽至前，交待自己的丧事，儿子温语相慰。

二月初四日（3日12日）是他父亲曾麟书去世的日子，他早早起来在父亲的牌位前行祭，因病情加重，已不能下跪。匆匆祭罢，叫人扶他去签押房办公，但打开一叠公文，只见字迹模糊，看不清楚，勉强看了两件只好作罢。下午，曾国藩感到身子轻松了些，遂让曾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儿子阻而未止，扶他去了花园。慢慢走了一阵，忽然见他右足拖拽，纪泽问：“是鞋没穿好吗？”曾国藩说：“我觉脚麻。”话一出口便倒在儿子身上。曾纪泽赶忙扶抱，看看父亲，他大吃一惊：只见他张开着嘴，浑身抽搐。纪泽忙唤人把父亲抬进大厅，家人闻讯，纷纷赶至。医生也赶来，为他探脉诊视，连扎数针，仍不见开口说话，只说：“老中堂病势危险，赶快准备后事！”

至当晚戌时辞世。时年62虚岁。遗体先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两年后改葬湖南善化县伏龙山南麓。

五十七 大毀大譽

前人被后人评价，毀贬者有之，褒誉者有之，公正者有之，失当者有之。然而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后人评判有天地之别，誉者奉为精神偶像，敬拜推崇无以复加；而毀者指为千古罪人，切齿恨之唾之犹不满足。

全国解放的 40 余年，评价曾国藩者仅限于历史学界，见诸文字的评价趋于一致，即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屈辱投降的卖国贼、崇捍封建伦理的卫道士。可是到了本世纪 90 年代，死去一百多年的曾国藩忽然“复活”，历史公案全盘翻转，百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问世，连续印刷，市场畅销，在历史书受到冷遇的年代，实为不可思议。《曾国藩家书》版出、争购，也与时兴的“经济大潮”大不吻合。于是，严肃的政治、史学各界也被牵引着重新认识、评价曾国藩。从而出现了百余年不见的历史文化现象，有人称之为“曾国藩现象”，或称之为“曾国藩热”。

以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曾国藩尽管疑忌重重，但曾国藩毕竟对地主阶级政权赤心忠诚，替他们在疆场上冲杀，除掉了他们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以，清朝地主阶级视之为“中兴名臣”，尤其在他死后更把他树为忠诚报效的样板。除对他一生的活动全盘肯定，大加褒扬外，还追赐为大傅，予谥文正，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在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宣诏国史馆立传。他不仅死时得到了算是最高的褒奖，而且在以后的 40 余年里，被统治阶级抬得越来越高，成为他们树立仿效的偶像。包括后来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对曾国藩的推崇几乎是至高无尚的。他们的思想、行为、政术、学术虽与曾国藩有小异之处，但他们都是极力学习、继承他的那一套。正如清末学者夏震武所说：“合肥（指李鸿章）、南皮（指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指曾国藩）”，同时指出不光是李、张二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夏震武的评论不无过当之处，然而大体描述了曾国藩死后的 40 余年，清朝统治阶级对他至高的评价，也说明曾国藩的思想、行为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之深。

应该指出，以往我们史学界的评论，往往只引摘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蒋介石等人对曾国藩推崇的内容，从而证明这些人同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他们一脉相承，曾国藩则是其鼻祖，是反动买办阶级的创始人。似乎除此之外，再无人说他好话，尤其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就一定认为他是卖国贼、刽子手。而 1995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之谜》（张辉主编）赫然以《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作为正文第一个标题。本书的最大特点和用功之处，也是其功劳，是把曾国藩死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他的评论、态度梳理编辑在一起，为人们全面了解、公正评论曾国藩其人提供了参照，从而根本打破了数十年来评论曾国藩的偏颇态度和一言堂格局。

尤其是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位阶级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物，对曾国藩的态度却那样一致。本来他们的相同评论也不奇怪，好比说开水可以解渴，白糖是甜的，3 个比 2 个多，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因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不同而会有不同认识。自然，对人的评价要复杂一些，一些问题可以因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但客观的功罪、优劣、长短也不应该因立场不同而看法不同。因此，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对曾国藩的看法也

就不能不有许多相同之处，有大量一致的评论。只是有某些原因，我们没有把毛泽东的评论公布于世罢了。

正是积于以往长时间文化思想的压抑，在新时期政治思想活跃的今天，才出现了“曾国藩热”。人们已不再偏执于他镇压农民起义之事，更多地注重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建树，从而掀起了研究发掘的热潮。同时以他的思想道德作标准，在反思着某些重要问题。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以往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不限于曾国藩，许多问题也都偏激偏颇，（《曾国藩之谜》）的编者举的是范文澜对曾国藩全盘“责毁”的例子。实际上何止范文澜，在数十年中，几乎所有评论曾国藩的作者和著述，都是全盘否定的，都尽量发掘他的反动材料，把他定为秦桧般的最坏的历史人物。自然范文澜“责毁”曾国藩比后来者要早，而且作为鼎鼎有名的历史学家，说起话来就权威，带有定论性质。诸如刽子手、卖国贼、曾剃头、卫道士（道是大逆不道）等，自范文澜已加定论了，反动透顶，无以复加。以后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大抵是本着范文澜的定论而进行的。

就是这样，曾国藩被全盘否定大抵都因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原因。远比范文澜还早的时候，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人就斥骂曾国藩为“汉奸”。孙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孙中山等人闹辛亥革命，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号召汉人起来打倒“满清”，此即谓“民族”革命。而曾国藩以一汉人身分，帮助“满清”王朝镇压了汉人太平军，孙中山等人就骂他是“汉奸”。同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十分称扬，将自己比之为“洪秀全第二”，所以如此，其意在决心推翻清朝政府。

孙中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决心和意义自然功在千秋，勿庸置疑。但因此而骂曾国藩为“汉奸”，其错误的称谓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能成立，他的“民族主义便成了大汉族主义”，退回到“反清复明”、“反满复汉”的落后口号和范畴中。以后孙中山不断提高认识，多次重新解释“民族主义”，终于将这个主义充实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然而，他在错误称谓中给曾国藩定下的“汉奸”定义却没能及时改过，也算是曾国藩的很大不幸了。

辛亥革命中的一位“排满斗士”章太炎对曾国藩也大加挞伐，以“元凶”、“民贼”论讫。其所以如此，概出于孙中山等前之狭隘民族主义，章氏激烈“排满”，自然以曾国藩保满，故骂之曰“民贼”，即汉民族之贼。

孙、章等革命党攻击曾国藩的言论，不待后人论正误，当时的梁启超即驳辩说：“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有史以来，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说他的“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为“三并不朽”。认为凡有志“澄清天下”的人，要达其志，必须把曾国藩的言论从头到尾看上几遍，且“不可不日三复”。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曾国藩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很久即为多人所知，只是因为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极少见诸文字。本世纪80年代，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引证了毛泽东20年代时“独服曾文

孙中山：《重订致公堂新章》，转引自《曾国藩之谜》，第370页。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论私德》等文。

正”的态度（见该书第28页），应该说对许多人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尽管说是“早期”的认识，有某些不成熟的成分。实际上亦非如此，毛泽东实受曾国藩较多，较大影响，渗透他的思想中，体现于诸多方面，而且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亦是如此。

曾国藩的德行、功业、言论、治学、为人与做事等多方面都为后世所推崇，在湖南影响更大，湖南人教子与教学，多以曾国藩为楷模、为圣哲，以湖南出一曾国藩而骄傲。作为湖南人，曾在曾国藩的籍地湘乡读过书的青年毛泽东，同样非常推崇曾国藩。曾国藩的许多著作，毛泽东都曾认真读过，曾国藩的学习方法、读书路径，毛泽东都模仿走过。他曾把曾国藩治学方法的许多言论奉为金玉良言，以曾的言论作为检查自己、鞭策自己的标尺。例如他检讨自己学习不重视课堂的系统知识，一味追求个人兴趣时，曾说：“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泽东写此信时系1915年，当时他已是22岁的青年了。这样的年龄，尤其对毛泽东这样的成熟早的伟人来说，已有了自己的成见，不能说太盲目了。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精神境界、经世之学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这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大量记载。毛泽东在这些方面评论曾国藩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这里毛泽东是说，著名的人物也有“办事”之人，即只求功业，没有思想理论的人，也有“传教”之人，即有思想、有理论，传播而影响后世的人。他认为诸葛、范仲淹是前者，孔孟等是后者，而曾国藩则是既建事业又有思想理论的代表，要比左宗棠有思想有理论。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评价之高。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那段话是在论断“大本大源”时说的。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之完满乎？”毛泽东写此信时是1917年8月。这年4月，他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已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等新思想，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有了救国救民的大志向。这封信中就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可见，毛泽东当时正是出于寻求救国救民的根本道理与道路，打算推翻旧世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毛泽东：《讲堂录》，转引自《曾国藩之谜》第7页~8页。

毛泽东：《致黎锦熙宿》，1917年8月23日。

界、建立新中国之际，大量研究、比较中国前代的有影响的人物，提到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四位，其中以“大本大源”论，“独服”曾国藩一人。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大源”是什么？他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宣有大气大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瞳（yì，音谊，天阴沉）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是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创造出一种能根本打动全国人民心灵的思想、能根本号召“万夫走集”的理论，从而率领亿万人民去革命，去创造一个“富强幸福之国家”。此时他推崇曾国藩得“大本大源”，就不再是青年人的忽发奇想，而是以曾为范本，进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了。

自然，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是以保卫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号召大众围歼洪秀全的“异教异理”，对此，毛泽东是清楚的。他要建立的“大本大源”不再是照搬曾氏的“大本大源”，但这个“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尚在探索之中。不久，毛泽东便找到了这个“大本大源”，即马列主义的理论。然而这个理论也不是从条文中照搬，其中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曾国藩的东西他也吸收、借鉴了不少。有人举例说，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有着渊源和借鉴关系，似不无道理。《爱民歌》词共 560 字，摘之如下：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第一扎营不贪赖，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嚎哭不安居。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和。

另外，毛泽东的许多军事思想、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原则等，都受曾国藩不少启迪，从曾国藩的军事论述中找到印证。如曾国藩“人胜于器”军事的思想，“灵活变通”的军事原则，“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等战术理论，毛泽东都认真研究、反复实践了。

总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列主义者之前的事情，但曾国藩的诸多方面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

曾国藩被推崇曾是一个时代潮流。在毛泽东及其师友们研究、模仿曾国藩时，蒋介石也是那个潮流中的一员，是一个努力学习曾国藩，用他的思想行为作指导，公开将他奉为宗师的有影响的人物。蒋氏推崇曾国藩并无多少神秘之处，亦为大众所周知，不过以往的认识似乎有些问题。那是说，因为蒋介石反动、反共、反人民、打内战，所以才找个也反动，镇压农民起义的

曾国藩去学习，学习他怎么反动，怎么屠杀革命人士。这便是革命学革命、反动学坏蛋的“一脉相承”论。其实，这说法未免把复杂事物过于简单化了。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也同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坚实的儒学文化基础，他尤对王阳明的理学研究较深。由于当时潮流的推动，他也自然把曾国藩作为近世成功的儒者去学习。一种定论的说法是，蒋介石一生学问，最重要的是母亲严格地引导他学习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和他自己选择的曾国藩精神（见《蒋总统秘录》），才能够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成为孙中山依重的“股肱”人物。长期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战斗生活多么紧张，他都把伦理学、曾文正当作“日课”来学习，按照曾国藩一整套学习、自省等方法去进行。对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曾国藩是个身体力行的典范，蒋介石完全按照这个范例的样子去做去实行。他用这套思想精神要求自己、教育子女、治理军队、推行政治路线。蒋介石也曾论过曾国藩打败洪秀全之事，他的结论是：曾国藩的学问、精神胜过洪秀全。所以，他训练军队也是照曾国藩的那一套去做，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他读得烂熟，还进行了补编。不仅自读自效，还用来训练军官、教育士兵。他言必称曾、胡，说：“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人们评论：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以曾胡为盗贼，以洪杨为神圣；今蒋介石政府“求治兵之本计，通令军将，通读公书（指曾文正公的著作）”。总之，蒋介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敌对一方高度评价、极力效法曾国藩的代表人物，他学习曾国藩那一套用在打内战上，违背了历史潮流，最终走上了可耻的失败道路。

回顾曾国藩死后百余年的历史，先是清政府及其弟子、亲友的歌功颂德，说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深造道德”，“仁爱备至”，“世之完人”。辛亥革命运动中，曾国藩遭到了“排满革命派”的激烈抨击，“汉奸”、“民贼”是当时时尚的评语。然而在曾国藩倍受攻击的年代，更多的青年大力效仿他，同时出现了另一股时代潮流。民国以后，人们深入到伦理道德方面来评价曾国藩，同时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代表者和集大成者。本世纪中期到 80 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表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

彭国栋：《蒋介石先生嘉言类抄》，商务印书馆，第 397 页。

何貽鍊：《曾国藩评传》，1937 年版，第 622 页。

五十八 近代新儒

中国的儒学文化有过三期发展的历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在“百家争鸣”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产生，终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然而，当佛教东来，佛学风弥，道教也乘时而兴，儒学文化受到了严峻挑战。正统儒学家们经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学文化出现了第二期发展的历史。

近代以后，随着炮舰、鸦片烟枪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涌入中国，中国传统与儒学思想受到更大的冲击和挑战，这对统治阶级和儒家学术来说，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是“天崩地解”的巨变。

这时，坚船利炮的武装入侵，科学文化的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袭来，连近代农民大起义都打起西方宗教文化的旗号，儒家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

犹如宋明儒家那样，中国传统儒家在西学风袭之下也作出了自我反省和回应。他们深刻反省了随封建统治的没落，儒林士风的鄙薄，学风的空泛，“外王”内容的贫乏在西方科学相对之下的苍白无力。他们回应方式也有类于宋明儒家，即牢牢护持着中国传统儒学的生命和根基，以博深的涵容吸收、改造西方文化，给趋于僵化的经学注进新的生命，“通经致用”、学习西方、民族自救成了近代儒家的新的文化取向，上启林则徐、魏源、中经曾国藩、张之洞，下至康有为等，都是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他们是当代新儒家，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真正儒家传统第三期发展时期之前的过渡人物。

新儒家都有一个反省的过程，都经过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都有一种自危、自卫的使命感。所以造成他们的鲜明特点是“内圣”之功更加强烈、更加深沉，而“外王”之功有了更加充实的内容，使传统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避免了空泛的弱点，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到其鲜明的特点。

儒家的内省要求是强烈的，以自我修身为出发点，要求个人道德至高无上，达到“超越自我”的地步，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与佛学的“静观我心”根本相通。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末世的衰颓、堕落，造成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沉沦。这在传统儒家看来，不是个枝节问题，而是儒家根本传统的丧失、“大生命”的丧失。所以新儒家要护持儒家的生命之源，再造和发扬其根本传统，首先对个人道德要求更加严格，通过自身严格修养，为士人创造一个光辉的榜样，以影响社会。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绝对按儒家的要求自我刻苦修身的。自从有了上述意识，认唐鉴、倭仁为师开始，终其一生，在自我修身方面无一时停止，达到刻骨铭心之地步。唐、倭告诫他，个人的善恶与天下的治乱息息相通，“天理昭彰，善恶有示”，对于统治者更是如此。他“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可心、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前文已提到，他连自己在梦中出现的私心杂欲，醒后都要严格反省，从不放过。

一部《曾国藩日记》页页皆记着他自克自砺的情况，数不胜数。他经常以“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八德”自勉，有一事与之不符，他就要痛骂自己。例如他到了年迈官高之时，心力不足，做不好事，就写日

记检讨说：“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多日不治一事，愧惊无已！”他本来要求家庭成员就很严格，一次听人说魁时若一家四代一品，妇女们都不穿绸缎，马上反省自己对家庭要求不严，以为“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他如此对待自己，还终日惶恐，怕有自己检查不到之处，就经常让朋友、幕僚和亲人们给他提意见，谁能指出，他都高兴。他说：“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他讨厌说了不做，重视“道德实践”，这便是传统儒家道德论中的“诚”字。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

。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私，就是至虚，就是自觉实践道德。曾国藩道德修养是达到很高程度的，他死后清政府以“文正”谥号，以后被几代崇尚道德者推崇，如今形成研究曾国藩的热潮，他个人道德的高尚，要求自己的严格刻苦是重要原因。

曾国藩的“齐家”，即对家庭的治理，对家庭成员的要求亦如律己一般严格。流传百余年的《曾国藩家书》有写给家人的书信1458篇，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齐家”。后世流传，被公众认为“治家之宝”，其中内容丰富，不胜枚举。被后世归纳出的典章式的内容有所谓“八本堂”、“八字规”、“三不信”，加上他种种“齐家”的范例，被后人誉为“治家的理论体系”，“治家的优秀教科书”。

所谓“八本堂”是：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所谓“八字规”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三不信”是：“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外还有：“勤俭孝友”四字；考查自家妻女的“衣食粗细”四个方面；为家庭立下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总起来说，是将做人的美德，一一向家庭成员灌输，并严格让他们去做，这些要求如果真正做到了，他们家庭成员无疑也都成圣成贤了。

通观其家庭教育，不离孝悌、忠信、勤俭、廉正等信条。这些信条是传统儒家数千年的规制，但流传久远，随着统治腐败，风气败坏，成了只说不动的“口头禅”，甚或连说也不说，干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曾国藩以一个儒家复兴伦理道德的责任感，要求、治理他的家庭，他身体力行，不厌其烦，始终如一，因之被后人推为治家教子的典范。他曾说，自己做官30余年，官至极品，“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教育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说不论大官小农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要他们不要脱离生产劳动，男的勤耕垄亩，女的勤做女红。曾国藩穿的衣服鞋子，除在官场上穿官服之外，平日穿戴尽是自家妇女所缝制，他将此作为考课她们的家政项目。

曾国藩这么做并不仅为一己之家，而是为的振兴儒风，扭转整个社会风气。他常说，要树立正气，挽回颓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此

即魁玉，为江宁将军。

《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2页。

参见《曾国藩之谜》，第九章“传统家教”。

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把这“一二贤臣”称作“种子”，好比一颗好种子，种到地里生根成树，花开结籽，种子绵延，遍地开花，逐步造成一个理想的社会风气来。为此，他从自己扩到自己的家庭，再推之亲友和社会。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多，虽没能改变封建末期的社会颓风，却造就了一代儒学宗师，让后人不断效仿他，时至今日仍有其一定意义。

新儒家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的实践性，即强调“外王”，亦即重视“治国平天下”的侧面。近代新儒家们反省宋明理学家仅讲性命自省之学，结果忽视了“外王”的方面，把儒学弄得空泛无物，使宋、明两代亡于异族。因此，都不约而同地在“通经致用”上下功夫。曾国藩于此表现也很突出。他不仅强调儒家道德伦理方面的实践，更重视儒学的经世功能。薛福成曾说：“盖自公始于朝，即侃侃言天下大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矩”。他的理学导师唐鉴教育他学问共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门，而他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说的“经济”一门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涉及治理国家的各门学科。他曾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总之，作为近代新儒，以“内圣”、“外王”为纲要，以“经世致用”为原则，达到“匡世救时”之目的，无论古今中外，凡能学到的，凡对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教育诸方面有实际价值的学问，他都认真学习，把各门、各家的学问统统溶入儒学的本源之中，使之丰富、使之有新的生命力。他曾检讨自己平生之“耻”，其中“一耻”是对古经古史皆有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后来认真向周围的科学工作者学习，大体上掌握了当时有关天文方面的常识，“算学”方面，仍是空白，可见他对实用科学也是相当重视的。

有趣的是，曾国藩对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仁”和“礼”的理解，则更重视“礼”的方面。他明知孔子“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而他却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正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他为何强调“礼”而不把儒家最重视的“仁”放在首位呢？原来他把“礼”等同于“经世之术”，强调了儒学传统应走向与社会大实践的密切结合上。他对“礼”在经学上的地位、“礼”是古代经世之学的渊源方面，考证、论述甚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概而言之：“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

《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第70页。

薛福成：《庸庵文编》，第3卷。

《湘乡曾氏文献》，第6册，第3369页~3370页。

《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

《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

总之，曾国藩生于清代末叶，在“内忧外患”的扰攘下，他身为“中兴名臣”和“儒学大师”，把挽救清王朝的覆灭和儒学的衰微结合起来，体现了近代儒家深刻的危机意识、反省意识以及强调“经世致用”，学习西方的开放和改革特点。

